

新旗

第七期

半月刊 實售價幣三百元

內戰擴大以後

振聲

全面內戰終於打起來了，不管發動者的「信誓旦旦」，不管人民大眾的奔走呼號，牠終於打起來了。現在看來，事情是很明白的，過去一年的談判與調解，在發動者方面都不過是一種備戰的烟幕，拖延時間的手段。中共，尤其是一般老百姓，事實上上了當，中了美國與執政黨聯合設定的狡計。

現在事情太明白了，美國扯下了牠和平神的假面具，統治者也最後丟下了牠鐵拳上的羊皮手套，砲口代替了唇舌，議場移轉到了戰場。沒有一個和平主義者再能保住他可憐的幻想，也沒有一個幻想家再能看到玫瑰色的和平景象。善心的人們若有所悟地喊出了「人民自己解決」的口號，被騙了的延安也大叫着「獨起鎗來」了。

「獨起鎗來」，到了無奈何的時候也只得這樣幹，最頑固的反動派是祇懂得在鎗口上鎮教的；不過對方的力量太大了，牠背後站着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光是鎗無法取勝於內戰。同時鎗終究不能解決政治問題。爲了人民大眾的利益，甚至爲了中共的利益，要想有力地反對統治者所強加於我人身上的內戰，都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政治立場。政治立場雖然是個「抽象的」東西，但有時侯抽象的立場却能使大地強過那具體的鎗炮。

一些能從思想上取捨一種態度的人，自然可以從「民主與反民主」之類的標準來決定是非，放棄「中立」；但戰爭終究不是幾個少數知識份子打的。而且，即使是知識份子，也不能僅受幾句空洞口號的影響。要使一方面的戰爭成爲進步，要使幾萬萬人擁護這個戰爭，因而獲得勝利，那末這戰爭必須有個進步的政綱，實行這個政綱，由此來保障幾

萬人的利益。

內戰與對外戰爭不同，誰勝誰負，更多地決定於誰的政綱革命，誰的政綱反動，誰的政績優良，誰的政績腐敗。

中共目前的政綱與政績，無疑是較爲進步的；但要想在力量如此懸殊的戰爭中取得勝利，這樣的政綱政績顯然還不够得很，甚至有許多錯誤地方，會在客觀上幫助對方的勝利。

那一些是不够而必需改進的？例如：半吊子的土地改革必須代以徹底的土地革命。

那一些是錯誤而必須改變的？例如：官僚外交式的談判必須停止；政治上無原則的買賣，有如改組政府或「聯合政府」的磋商，必須結束；「利用馬歇爾的幻想必須拋棄」。

不過最重要的，中共必須立即改變牠的全部基本立場，必須立即丟開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放棄階級合作政策，重新站在無產階級與廣大城鄉貧民的

第七期目錄

內戰擴大以後的新勝利	振聲
馬歇爾元帥的悲劇	劉默
從工人立場看外匯新匯率	舒嚴
印度革命悲劇	關因
威爾斯逝世	唐盛
大戰留下的創傷	E. Wood
硬殺與軟綁	木君
論「中間派」(上)	鳳岡
選舉和示威(法國通信)	朱海聲
一篇值得學習的追悼文(讀者論壇)	守敬
無產階級領導革命(讀者通信)	華世明

新旗社
香港西灣河
太古船塢李振聲

立場上，徹底發展階級鬥爭，堂堂正正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名義之下，進行深刻的社會革命。

放棄了依賴美國調解的幻想，同時放棄了與執政黨組織『聯合政府』的念頭，牠應該集中一切力量，去為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而奮鬥，讓全體人民自己來解決當前的一切問題。

祇有這樣，工農大眾才能承認中共是他們自己的黨。祇有這樣，全體民眾才能認識共產黨不是為一黨的私利而爭，乃是為真正的民主而戰。祇有這樣，中共以及一切被壓迫的老百姓，才能經受得住統治者『平亂』的鎮壓，並由此走向勝利。我們希望一切真誠的共產主義者，能够考慮我們的建議。

馬歇爾元帥的新勝利 劉默

馬歇爾元帥奉命來華，調處國共衝突，奔走十個月，終於自認失敗了。有人說：『馬歇爾贏得了世界戰爭，但贏不到中國的和平。』

真是這樣的嗎？

我們可不這樣想。馬歇爾在世界戰場上是勝利的，在中國戰場上也同樣是勝利的。馬歇爾沒有失敗。他這次的失敗便是他的勝利。

怎麼說失敗便是勝利呢？一句話，馬歇爾到中國來自始就不曾想造成民主的和平。也許真想造成一種『和平』的，但那不是我們所要的和平，也就是說，不是民主的和平。他想造成的乃是美國經由國民黨在中國施行的一種獨裁的和平，即不容許人民大眾以及反對黨派說話，批評或『作亂』的一種『和平』。他要的和乎是綏靖，是鎮壓，是平定，是……，只不是民主的和平。

十個月來，馬歇爾元帥，亦即杜魯門總統，亦

即華爾街的巨頭們，在中國所成就的可不小呢。他使美國民主義政策蒙上了仁慈和平的面具，他使國民黨軍隊的戰略地位大大地改善；他替國民黨加速練成了幾十師美化部隊；他相當穩定了國民黨治下的經濟危機；他很巧妙地使內戰的責任放到共產黨身上。

成亂了這些之後，如今是『失敗』的時候了。『不歡喜失敗』的將軍於是坦然承認了自己的失敗，發表了失敗的文告，文告上還還署著一位悲天憫人的司徒大使。這樣增加了力量，讓人們更加感覺到中共的『大亂』，同時更加感激這二位慈祥老人的美意。

馬歇爾元帥是以『失敗』來完成其勝利的。他過去的成功是替美國與國民黨爭取了十個月的備戰時間，今天的失敗則是昭告了備戰的完成。因此馬歇爾的失敗證明，實際上是華盛頓經過他的前行政謀長對國民黨所下的進攻命令，他命令國民黨進攻共產黨，亦即進攻蘇聯在中國的前哨。

中國的全面內戰果然打起來了，但這位『和平老人』並不以『辱了使命』而『憤然歸國』，有似一般天真的中國人所想像的。他還留在中國，而且悠然地住在廬山，做著我們『最高當局』的貴賓，詩人似地欣賞著我們中國人對中國人的血肉飛舞。有誰還願意拿『救主』等等肉麻稱呼奉送給這位老人嗎？有誰還對這位元帥的好戰派幻想嗎？更有誰還企圖把他和美帝國主義的好戰派分開來嗎？如果在事態如此明白了的今天，居然還有人保持此種態度，那是再不能讓人原諒了，我們祇能稱他們做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不過，為使人們將來不再發生新的幻想起見，我們現在就得指出：馬歇爾或代以他人的美國再度『調處』，完全是有可能的。美國並不能讓中國的

內戰無限制地打下去，而且，可能發生影響的因素又太多了。假如一，國軍未能在較短期內圓滿地完成馬元帥給定的計劃；二，戰爭形勢或者竟於國軍不利；三，內戰遲延而美國國內市場又迅速地遭到了飽和點，以致美國不得不注意市場資格的中國；四，內戰引起了蘇聯與英國的積極抗議；五，以很高代價業已換來了美國在中國所必需的一切具有戰略意義的點與線；六，中國國內廣大民眾反戰運動之繼續高漲，甚至影響到士兵的厭戰情緒；……祇叫發生了上述那一個有利或不於於美國的情勢，都會叫馬歇爾元帥再度熱心起來，替我們中國老百姓『調處國共』之戰的。

總之，除非美蘇之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快打起來，則美國對中國的內戰，一定還要採取時而『調處』時而『不管』的態度。我們中國老百姓的態度這裏倒是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的，即無論如何不應相信美國對華政策的『美意』。

從工人立場看外匯新匯率

舒 蔚

八月十九日開始，外匯官價從二〇二〇元法幣對一元美金，忽然一躍而為三三五〇元法幣對一元美金了。幾個月來比較平靜的物價又波動起來了。

行政院長宋子文說明此次調整外匯率的理由，說是現在法幣對外的購買力高，對內的購買力低，是很不好的，此次匯率調整以後可使國內國外幣值得到合理的調和。他希望新匯率實施以後能得到下列幾種良好結果：（一）鼓勵輸出，減少輸入；（二）激發僑民匯款回國；（三）扶助國內生產事業。

我們試看看，要合理調和國內外的幣值，要得到上述那三種結果，是否除了抬高外匯（即法幣

貶值)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呢?現在用的抬高外匯方法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呢?

不錯,現在法幣對外購買力高,對內購買力低,是事實,也是造成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要調和這兩種購買力,有兩種辦法:一是『貶值』,即降低法幣對內的購買力,以遷就對內的購買力,如目前所開始施行的;一是『增值』,即抬高法幣對內的購買力,以遷就對外的購買力,這是人們不會採用的。

在某種情形之下,貶值自然是一種解決方法,例如對於某一國家經濟,輸出是比輸入更重要的,要在世界市場上與他國的輸出競爭,則自國貨幣的強能能够鼓勵輸入。但中國情形不同,在中國經濟上,幾種農產品輸出并不佔十分重要位置。戰後,中國需要的是工業的建設,而機器及其他建設材料都須從外國輸入。法幣貶值,對於輸出上補助很有限,而輸入才則立刻大受其虧了。

有人問道:中國固然需要機器及其他建設材料輸入,可是跟着這些東西,外國製成品也要輸入來,同國貨競爭,如最近幾個月所見的情形呀?結果舊的經濟基礎都要崩潰了,還談甚麼新建設?

我們回答:中國不是獨立的國家麼?不是關稅能够自主的麼?不是外國政府管理的麼?我們需要的東西,可以減低稅率,甚至免稅;我們不需要的東西,可以抬高稅率,甚至禁止進口,又可以不供給外國。如此,那些能够同國貨競爭的製成品是不會跟着機會輸入來的,中國自己的工業是不會感受威脅的。

又有人問道:法幣貶值是一紙命令能够做到的,但法幣增值何容易!必須中國已經走上建設軌道,經濟開始復興,然後才應該得上法幣穩定,然後才能談得上法幣增值。現在增值既不可能,不是

既有貶值一條道路麼?

我們回答:增值固然不是一紙命令可以做到,但并非不能開始去做的。法幣在國內的購買力何以日低一日呢?不是爲了通貨膨脹麼?通貨爲甚麼膨脹呢?大部分是爲了軍費支出。對外戰爭停止一年了,世界各國都沒有戰爭了,惟有中國還在養着幾百萬軍隊,還在內戰,而且大規模的全面內戰,每日消耗無算的生命和物資,生命不值錢,物資則必需補充呀!現在除了鈔票印刷機之外沒有別的補充物資方法。所以祖國內戰停止,軍備裁減,通貨就減少或停止膨脹的,因之物價也會降下來,即是法幣在國內的購買力可以漸漸抬高了。可見增值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又有人問道:你們的辦法是要依靠一個『好政府』來應行的,惟有『好政府』才能保持國家獨立,關稅自主,外匯管理,才能消弭內戰,裁減軍備,停止鈔票,降低物價。總之惟有『好政府』才能使法幣增值,這個『好政府』,如美國『時代雜誌』所稱的,是不能施行你的辦法的。如此,現行的貶值辦法不是唯一可行的辦法麼?

我們回答:在『壞政府』之下,不惟外匯問題不能好好解決,一切問題都不能好好解決的。增值既不可能,但貶值果真能解決問題麼?即果真能如宋院長所期望的,合理調和國內國外幣值,因而得到那三種良好的結果麼?明眼人都知道是不能够的。八月二十日文匯報記某經濟權威說,說此次貶更外匯匯率,對於工商業底危機,不過『打了一記強心針』,打不能根除危機底病源。事實上,這一記強心針即使發生了效力,勉強調和了國內和國外的幣值,但祇要通貨繼續膨脹,法幣底國內購買力又要降低的,即不久之後國內和國外的幣值又是不能合理調和的。而且今後通貨膨脹還要更加迅速

,因爲匯率一變更物價更變漲得快了,——不僅前來的美國貨變漲價,連自己的國貨和土產都要漲價,衣食住行件件都要漲價。這是匯率變更後第二天我們在市場所親見的。外匯抬高既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又使目前人民生活更陷於苦難。

這是我們工人首先關心的問題。上海吳市長代表政府向我們保證:『衣食住行四項決不漲價』。吳市長說的是理論,他認爲這四項大部分不是舶來品,與外匯無關,他勸告工商之家,願『大局』勿乘機抬價。但實際上,外國貨貴了,中國貨,無論原料是外國來的不是,都要跟着貴的。『米市』已經從六萬元跳至七萬五千元了。至於勸資本家『願全大局』,無異於向老嫗再宣貞節。

『依照生活消費指數計算工資』,這是最後工人鬥爭所得的最大勝利品。在這資方反攻的形勢中,七月份上海工潮,因解雇工人而引起,已佔百分之四七了。現在匯率變更以後,資方還要加緊向工人進攻的,首先要進攻『生活消費指數計算工資制』。或者明白進攻,或者在編製指數時出花樣。我們必須爲保衛這最大的勝利品而鬥爭。

印度革命悲劇

蘭因

印度吸引了注意力。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在加爾各答及其他城市互相殘殺,死傷的,據說有幾千人至萬餘人。有人說,這是一場悲劇。

可是這還不是印度革命悲劇。現在大家都注意宗教的衝突。但另一種更根本的衝突,或者在醜態中,或者已經爆發了,但尚未引人注意或被人故意隱瞞着。那就是階級的衝突。

印度廣大羣衆久矣在鬥爭中了。羣衆鬥爭不僅在鄉村,而且在城市,不僅在城市工人,而且在海

軍兵十。饑餓的人羣曾舉行廣大的示威，孟買「賤民」起來反抗，將近一百五十萬鐵路工人要同盟罷工，海軍兵士竟公開開槍。這一切是印度局勢底基本因素，是現在中國及其他東方國所沒有的。

這些因素決定了英國帝國主義最近的「恩典」，即讓印度人自己組織政府；又決定了印度資產階級的國民大會黨接受這個「恩典」。印度人自己組織政府麼？——這是一個半世紀以來所沒有的事情。英國本身雖然在此大戰戰爭中削弱了，但非下層羣衆如此蓬勃反抗，決不肯飲賜這個「恩典」的。

然而這個「恩典」本身畢竟是一種騙局：印度人自己組織政府，但國防，外交，交通等等大權仍須操在英國手中。印度政府不過是這個「東印度公司」底實辦團罷了。尤其量，也不過是非律賓「獨立」政府底地位。

印度資產階級不且非律賓資產階級，以前是不能滿意這種「獨立」的。可是現在，在廣大羣衆翻起之前，甘地，尼赫魯，阿柴特及其他國民大會黨領袖都急忙接受這種「獨立」了。

殖民地資產階級妥協成性，尤其當工農羣衆走到牠的頭頭時候。這是我們熟知的經驗。

印度需要真實的獨立，不需要非律賓式的獨立。工農底地位以及整個印度底經濟，在那兒受英國操縱的印度人政府之下是沒有改善希望的。印度必帶有完全獨立自主的政府，但惟有工農羣衆組織的政府才能是完全獨立自主的政府。印度工農羣衆有力層組織這個政府，現在欠缺的是覺悟，是自己的黨。印度已有真能代表工農利益的黨，可是力量還小，還不能領導羣衆去與國民大會黨或回教同盟相對立。

印度革命再向前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之下，將滅掉宗教人權，等該間的差異，將團結一

切被剝削者去對抗一切剝削者（無論是外國的或本國的），將走上勝利的道路了。反之，如果工農羣衆繼續信任資產階級領導，幻想經過這種「恩典」可以達到真正的獨立，那是一定要失望的，一定要重演中國革命悲劇的。

中國工農應以鮮血換來的經驗貢獻於印度兄弟羣之前。

威爾斯逝世

唐 威

威爾斯死了。他的文學，他的歷史學，他的思想，以及他的爲人，當這盜棺時候，國外和國內已經有好多人在紛紛議論了。我們這裏要說起他生時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他死前幾個月做的事情，爲國人所不知道的。

那就是他曾致書紐倫堡戰犯法庭，要求徹查一九三六——三七年莫斯科幾次黨獄諸被告與納粹戰犯之間的關係。

這事，須得從頭說起。

距今十年前，發生了一件震動世界的事情，即是莫斯科舉行了一次大審判，被告齊諾維埃夫，加明尼夫及其他老布爾雪維克領袖爲了勾結納粹陰謀出賣蘇聯罪名被判決死刑或長期徒刑了；不久之後，舉行了第二次審判，以拉狄克和畢亞塔可夫爲首，另一批老布爾雪維克派領袖，爲了同一罪名，又被判刑了；不久之後，舉行第三次審判，以布哈林和賴可夫爲首，第三批老布爾雪維克派領袖，爲了同一罪名，又被判刑了；不久之後，紅軍將領，以杜哈舍夫斯基爲首，也爲了同一罪名，受軍法審判，處死了。這一切審判案中，不難地以托洛茨基爲中心受審。雖然當時托洛茨基逃往國外沒有到庭受審。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托洛茨基

終於被莫斯科派遣的鬼子刺殺了。

這幾次審判震動了全世界。十月革命元勳，幾乎全體變成了法西斯走狗，——這難道是可能的麼？可是檢察官起訴書中說得很有憑據。一九三七年一月的起訴書說道：「本案偵查結果確能托洛茨基曾與德國國家社會黨一個領袖談判，意圖聯合鬥爭。反對蘇聯！」後面又說道：「托洛茨基所稱之協定，其原則，當彼與希特勒代表人赫斯談話時，業已擬定且通過矣。」不僅檢察官這般起訴，連被告自己，尤其畢亞塔可夫，也供認托洛茨基確與納粹黨商訂了進攻蘇聯的協定。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各國覺悟的無產階級以及一切有正義感的人，都不肯相信莫斯科審判案中檢察官起訴書和被告供辭是合於事實的。這些有正義感的人組織了「委員會」，以有名的哲學家約翰·杜威爲主席，來調查這些案件。「委員會」一面審問被告托洛茨基，一面請蘇聯駐美國和墨西哥的官憲提出證據。那些官憲拒絕了，但托洛茨基接受審問，從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直至十七日共在墨西哥審問了八日。結果，「委員會」判決了：「吾人因此斷言莫斯科諸審判案皆係假案。吾人因此斷言托洛茨基及亞達夫二人無罪。」「委員會」全部報告分印「托洛茨基案」及「無罪」兩書，由「哈潑兄弟公司」出版。

無論誰，凡讀過這兩本書的，感要不愧成見，都可確定莫斯科判決所根據的罪名是無中生有的，是羅織的了。可是沒有讀過這兩本書的人還很多，大多數人還是將信將疑的，還等特更明白的證據。這證據來得比一般預料的還更快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的德國完全失敗了。納粹黨領袖，以戈林爲首，連赫斯在內，都做了階下囚，在納倫堡國際戰犯法庭受審判，德國國家黨

案，這秘密的檔案在內，都交付這個法庭去使用。於是凡會關心過莫斯科審判案的人，都期待紐倫堡法庭把十年前那幾個震動世界的案件在得水落石出。因為托洛茨基和納粹的『協定』，若是實在的，總可以在檔案中找證據；此外，赫斯本人正在受審，法庭也可以問他呀！

於是，由於威爾斯——我們向他的在天之靈致敬——發起，英國許多文化界和政治界人物（其中有幾個國會議員）聯名函請紐倫堡法庭，『爲了歷史真相』，容許托洛茨基妻律師來出庭訊問赫斯；而且若有任何文件與托洛茨基和納粹領袖『陰謀』有關的，必須在法庭公佈。

接着英國之後，美國政治家，文學家，大學教授，工會運血者，約百人，以諾曼·托馬斯和馬太伏爾爲首，也聯名要求紐倫堡法庭徹查此案，雖然未曾要求容許托洛茨基妻律師出庭。

托洛茨基妻娜塔里亞·塞道瓦自己已經過她的律師阿爾伯爾·戈德曼致書紐倫堡法庭庭長羅倫斯爵士，要求出庭訊問赫斯和證人和檢委員。律師說：『托洛茨基夫人和我都認爲杜威委員會的斷案是確實無疑的，但爲了說服那些尚不信莫斯科審判案爲組織的人，我們仍願訊問納粹戰犯，尤其赫斯，仍願要求現在管制德國諸國家有納粹檔案中尋覓任何與此陰謀有關的文件。』

第四國際各國支部，由英國支部發起，比，法，荷等支部，都致請本國社會名流聯名向紐倫堡法庭提出同一要求了。

第四國際美國支部沒有參加這個運動，因爲據他公開的聲明，他并非對此問題沒有興趣，而是爲了不能完全信任紐倫堡法庭。這個法庭是帝國主義法官們和蘇聯法官們所組成的，法庭行事沒有受人監督。這些法官也可以組織大案，同莫斯科法庭法

官一般，倘若他們之間意見是一致的。赫斯和其他納粹領袖操縱着他們手裏，祇要能不利於無產階級革命，審判者和被審判者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過去曾發生一件同類的事情。當大敗期間，羅斯福與史大林合作時候，美國駐蘇大使台維斯寫了一本『莫斯科使命記』，得到美國政府准許出版并攝成電影，其中就譴責莫斯科審判案諸被告爲『納粹走狗』。

然而美國支部是過慮了的。時代不同了，帝國主義國家和蘇聯之間如此衝突，已不能共同施行一個羅織再來沾污老布爾維克派命令了。但法官們也不願顧全『歷史真相』。他們乾脆不理會威爾斯及其他諸人底要求，更加不理會托洛茨基妻律師底要求。

現在紐倫堡法庭審問終結了，各被告祇等候宣判了。但是在漫長的幾個月審判期間，檢察官（連蘇聯檢察官在內）未曾拿出一個文件，一點證據，關於『托洛茨基和納粹黨的陰謀』，也未會訊問赫斯一句話，關於這個『陰謀』，也未會訊問赫斯。這就是威爾斯先生所要的『歷史真相』，他得到了真相而死了。闡明這真相的，除了杜威，就要數他了。他若是不朽的，則這件事情將是造成他不朽的一個最大因素！

於托洛茨基遇難第六週年

大戰留下的創傷

Evelyn Atwood

正當巴黎和會準備着第三次世界大戰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底清曉才向世人公佈哩。

此次大戰中，人力（軍人和非軍人）損失爲：二千二百萬人死亡，三千四百萬人受傷，二千五百

萬人無家可歸，——共八千一百萬人。這種損失，用美金來估計，共值一萬萬萬元；城市，房屋，工廠，鐵路等損失價值尚未計算在內。

戰後，饑餓和疾病普遍全球。歐洲三萬萬人中，就有一半的人在饑餓線上掙扎着。德奧匈法意比南捷波希阿諸國，羣衆在餓死之中。英國，一個『勝利』的國，糧食有儲又減少了，麵包採取配給制了。蘇聯，糧食底缺乏，比官方承認的更加嚴重。印度有一千五百萬人，中國有二千七百萬萬人，在等待餓死。

廣大區域的人口幾乎全靠善後救濟總署發給的糧食爲生，有些地方每人所得減少至九百五十卡糧里，即納粹配給布恒瓦德和貝爾森集中營囚犯的數額。

許多城市，一歲內嬰孩底死亡率爲百分之二〇。今天歐洲有後天不足的小孩二千萬人，十三萬萬人，亞洲此類的小孩子還更多些。

疾病和饑餓是形影相隨的。今天，結核病和性病如火燎原。波蘭一國，死於結核病的人約有戰前四倍；大學生中，百分之二一七有活動性的結核病。性病是跟隨佔領軍來的。美軍佔領軍中，性病流行程度隨被佔領國窮困程度爲比例。駐歐美軍害梅毒和淋病的，初停戰時祇有百分之七·五，今天則增加到百分之二六了。有些國家，如挪威，雖無美國或其他國佔領軍，性病仍很流行，政府仍須努力去克服牠。

在日本，美國佔領軍兵士抱怨不得復原，便酗酒，盜竊，強姦日女，毆打日人，來發洩憤怒。

饑餓，疾病，死亡以及道德墮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果。但是與巴黎和會所準備的未來的大戰比較起來，上述那些後果又如同小丑之見大巫了。

唐譯自『戰士』週報

硬殺與軟綁

新旗 第七期 6

木君

同在七月中旬，同一個特殊勢力，在不同的兩個地方，用了不同的兩種方法，對付了中國民主同盟的三個領袖。

人們用手槍在昆明打死了李公樸聞一多，又在北平用汽車請走了孫中原。前者是硬幹的，是鐵與血的事件，所以震驚了全中國，甚至波動了全世界；後者是軟做的，是撲朔迷離的，所以不會引起同樣反響，甚至為許多人所忽視。

其實前後二者，不過是一個制度的兩種手法，一塊盾牌的兩面。「硬幹」固然可惡，「軟做」却是尤其可怕的。殺人見血是慘事，但誰能說殺人不見血不更慘些？一顆子彈穿進了血肉之軀，被射擊的人倒了，事情清清楚楚；一邊是卑劣無恥的兇手，另一邊是求仁得仁的烈士。人們的感情也容易安排的：痛惡殺人犯，同情犧牲者。就被害人所代表的思想事業言，一兩個人的血往往能換得來更多的代價。可是「軟做」方法的情形就不同了，也是兇手對被害人的射擊，但他所用的手槍非但無聲，而且無形。給擊中了的人並不流血，身體還是好好的，頂多不過「神經失常」，可是他一樣地倒下來了，精神上倒下來了，甚至被毀滅了。放射這支無聲無形槍的人不算兇手，而是「導師」「保姆」或「教育者」，而那個被射中的人呢？自然也不是烈士，而是「懺悔者」「改宗者」或者「叛徒」了。這時候人們的感情是如此的：不痛惡兇手，却儘情地鄙視那個被害者，連帶甚至也鄙視那個被害者所代表的思想事業。

如此說來，「軟做」不是比「硬幹」好得多，高明得多，有效得多嗎？所以實在說，硬幹早已是過時的辦法了，早已不是「科學的」「特務制度的正宗」。有時還偶一用之者，那不過是佔有次要地位罷了，或者，滑「軟做」方法之窮而已。

我們曾經在另外一篇文章裏說起過「軟做」，即「再教育」的內容，這裏要借孫中原案做個實例，讓讀者多多欣賞一下這個現代特務制度的高妙藝術。

孫中原案就報紙上的消息看，牠的發展經過如下：
一、「七月十八日民盟北平市委孫中原在南池子街被綁失蹤。」
二、「十九日民盟華北負責人張東蓀，劉清揚聯名致函李主任，熊市長，要求營救孫中原。」

三、「二十九日」，「據政府高級官員二十七日告合衆社記者稱，孫中原失蹤一案，實係其本人主動，孫氏現由政府保護監視。因渠最近曾作反共言論，深

恐共黨加以不利，故請求政府予以保護……又稱：孫氏現患神經失常症，正由醫士診視中，據渠告醫士稱，渠渴望與政治絕緣，俾專心辦理實業。」

四、卅一日申報駐平記者電：「報載孫中原刻在東城什坊院五十四號休息，記者今日上午十時按址去找，見一位穿黃十基褲的中年人出來開門，要求見孫中原，他說：「孫先生洗澡去了」，問何時回來，各：「孫先生還要去看病」，問害的什麼病，說是腸胃病。據說這個地方不是孫中原的家，而是他的朋友的住處，問這個朋友姓什麼，那位先生說不知道。」

五、同日據中央社記者說，他曾晤及孫中原，據說孫中原「身體頗健」，又說他並未被綁，實係「七月十八日行至東安門附近，忽遇十年未見老友發世來，於傾談時突然病發暈倒，乃由其次女送往什坊院五十四號自宅。」

六、同日，北平世界日報公佈一封孫中原給李主任的信，說：「因病後苦惱，復因家事萬端，一時氣憤，避居友人家中於養……願於近期返籍，今後繼續實業，決不作非法行為……」

七、八月一日，孫中原專機飛西安轉蓉，行前留書張東蓀，聲明退出民盟，並指民盟為「共黨尾巴」。

八、同日據文匯報訊：「聞孫中原已於一日晨避居西苑某處，對外宣傳則為返回成都，并自即日起脫離民盟。」

九、八月五日，「民盟華北支部負責人張東蓀氏特電蔣主席，要求保護孫氏安全」，請電令川省當局遴選各黨派無黨派人士證明其確為安全與自由；
十、八月二十日，文匯報南京電，「民盟北平市委孫中原，自八月自由後，正被監視於成都孫氏私宅，傳會受刑，已手足麻木，不能行動。生命安全殊為可慮。」

僅僅上面捫引的一些公開消息，已經達到了自相矛盾的極致：忽爾「自請政府保護」，忽爾「遇見十年未見老友，由其送往自宅休息」，又忽爾是「一時氣憤，避居友人家中」。一個中報的記者說他「患病去見醫生」，同一天的中央社記者却見他「身體頗健」。更可笑的，孫中原忽然「自動」到朋友家去養了幾天病，為什麼要寫信給「李主任」表示「今後決不作非法行為」？更為什麼要煩勞行營用「專機」將此「病人」送赴成都？這種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宣傳，實所謂是欲蓋彌彰。

美國的新聞記者見了這些前後的報道弄得莫衷其妙，既能說是「謎」，也許是中國式特有的謎，其實這何嘗是謎呢？拆穿「西洋鏡」，特務制度這樣「無形手鎗」在作祟吧了。

我們沒有興趣從這消息中細找矛盾，藉以揭破牠們的虛偽與欺騙。我們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這些矛盾太清楚，毋需乎找。我們也毋需採取法學家或實證主義者的態度，從這些矛盾中找「證據」，藉以證明這個「事件」究竟是誰幹的。我們不願意這樣做，因為在最近一二十年山成千成萬「孫中原」用生命來證明了的事，再不必找什麼證據了。我們可以斷定，憑事件的本身就可以斷定，這是中國現統治者所直轄的特務機關的傑作。

我們感興趣的是下面這個問題：

特務機關究竟用什麼方法完成牠的傑作？牠有什麼法術，能使一個政敵在短短幾小時內「神經失常」，「灰心政治」，「認罪自過」，「留書退盟」，並且「專機回籍」呢？

我們知道，特務的第一步是所謂「調查統計」，那就是尾隨，釘梢，綁架，無論對於什麼人，根據一個密告或簡單被特務認為形迹可疑，就放一只「眼睛」在他身上，調查他的關係，記錄他的往來，然後在一個時期，當特務們認為「統計」已經完畢時，就來一個「一網打盡」，把全數被「調查」到的人統統牽了來（有時也有亂牽一個的）。牽的時候是秘密的，「行動」的人不穿制服，不佩證章，不拿拘票，不說明機關，就這麼簡單地將你「幹」去了。

第二步是審問，即所謂「疲勞審問」，或者所謂「輪番審問」。「幹」了來的人立刻有人跟你「談話」，調着班談，每班一人或二三人，每班延長二小時，一班接着班，不讓你有一刻休息。用種種問題：從你的家常談到國事，從組織談到理論；用種種方法：從利誘到威嚇，從軟騙到硬敲，從送煙送茶吃大菜一直到老虎凳，衝冷水；從利誘到種種角色：從朋友親人似的「好好先生」一直到滿臉殺氣的打手；這樣地談話，這樣地審問，毫不間斷地，從早晨到晚上，從黑夜到黎明，六小時，十二小時，二十四小時，四十八小時，九十六小時：總之，一直跟你談過去，纏下去，他們是以進行勞，疲勞難支，有似「牛頭山」上滾下來的「滑車」，而你呢，給弄得心力交瘁，疲勞難支，感覺麻痺，神經破裂，最後如果不是發起瘋來，一定會萬事灰心，任人壓榨，有似那個被殺死的「高龍」。

被如此審問的「犯人」，很多會合第一個「遭遇戰」中就完全敗下陣來的，他繳出了武器，滿足了人們的要求：「招供機關」與「登報悔過」。

但也有許多人熬下來了，那末暫時把你「優待」起來（把你絕對地孤立起來，使你同家屬，同外界，甚至同相等的犯人，更甚至同任何書本隔絕），特務們一方面對外欺騙你「投降」的謊言，另一方面隔一個相當日子，再來「疲勞」你一次，或叫你出去，毫沒來由地，弄幾個粗小只狠狠地揍你一頓，接着又是「優待」，又是孤放。如此下去，二月不成則二月，二月不成則四月甚至一年，二月，……最後總有一天解除你精神上的末道防線。如果你這樣還不倒下來，那末會有一天，往往是在夜間，請你出去，花費一顆「國家」的子彈！沒有罪狀，沒有宣判，自然毋需乎通知家屬，你便從此「失蹤」了。

孫中原大抵在第一次「疲勞」中就「神經失常」，就「悔過認罪」，就「留書退盟」的；不過更可能，孫中原還不會「倒下來」，他致「李主任」與張東蓀的書信都是特務偽造的，所以還不讓他自由，還要用「專機押解」赴蓉。孫中原事件是一個例，一個小小的例；但是特務們的全盤的面目已可以看出來了。是多麼的惡毒，陰險，「違反人道」與「侮辱理性」呀，但牠偏偏是「禮義廉恥」的真實內容！

人們注意李公樸與聞一多的慘死，提出了抗議，舉行了追悼，並且要求徹查；對於孫中原事件却漠然地讓牠過去了，除了張東蓀的一個電報之外，我們不見有任何抗議與評論。其實這是錯的。

反對特務，首先要反對那「欺傲」的特務！

提審法的嚴格實行，人身的一切實保障，一切政黨合法存在，一切罪犯必須由法院審理，這是我們必須以自己的力量首先加以爭取的。

不過在為反對特務而從事鬥爭的時候，我們不願人們陷入一種錯誤的見解，彷彿特務制度只是現當局中幾個反動的「頭面分子」所發明所主持的，只叫去掉了這幾個人，就可以根絕特務了。這是一種錯誤。

中國的特務制度並不是某幾個「頭面分子」所創造，甚至還不是本國自造的。特務制度這門「科學」，與其他的一切科學一樣，是從外國學來的。從納粹的德國，從法西斯的意大利，甚至從歷各以後的更大的林統治下的蘇聯，我們的執政黨學來了；不過抄襲加上了獨創，舶來的加上了中國固有的，以致一二十年來，中國的一切科學遭到了摧殘，萎縮着，奄奄無生氣，唯有這門特務與警察的「科學」，發揚光大着，治中西文明於一爐，竟是青出於藍了。

發生特務制度的社會基礎是不同的。他意的特務制建築在獨行反動的資本主義身上，而目前蘇聯的特務則為了那墮落的工人國家的官僚階級的利益。但牠們乃是社會矛盾達到了最尖銳，被壓下去的革命尚在威脅，統治階級下層羣

業十分恐懼時的產物，却是一株。

中國大資產階級在二十年前利用了農業革命，中途又屠殺了農業，出賣了革命，因而獲得了政權。這種形勢和廣大農業始終立於最不可靠的地位，使牠自始終陷於矛盾威脅與恐懼之中，因而使牠向外國輸入了特務制度這一科學。

既然中國階級存在的條件決定了特種制度的存在，那末從現統治的機構中單獨挖去獨特種制度，可見絕不可能的。統治階級與特種制度是「共生共榮」「同生共死」的，牠祇能在種情形下倒台，即統治階級整個倒台的時候，才能用改良方法來去，祇能用革命方法來推倒。

論壇

一篇值得學習的

哀悼文

守敬

在這動亂時代，人的死亡好像也比平時加頻繁。才聽說遺名入去世，又聽說那位領袖。當一位名人或派領袖死亡的消息傳出，照製有一番宣傳烘染贊揚死者操守如何堅定，人如何高尚，學識如何淵博，風度如何可欽，幾乎有一種風氣。本早相識的，也必須前去弔祭，表示自己與名人類曾有往還；本是不悲痛的，必須作詩作賦，以示自家確有哀思。

死的人的氣愈大，排場也就愈熱鬧，有的輓詩輓聯和甚紀念文字也就愈多。有時由紙被寫了出來，更占滿篇幅。其中雖不無由衷作，但大都帶有膾炙味，讀之能發人感觸者極。我的經驗與如身所以一向對於這類文字總是頗多看。看也大致看看死者的生平而已。

但是奇怪得很。最近於無意中我卻讀到一篇極好的哀悼章，那就是本刊前期的「敬悼行知

論「中間派」(七)

由來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便有一部分人感覺到共產黨所走的都不是路，他想尋找一條中間道兒。他們想找一條既不靠階級與地主的，也不是天與貧農的，他們要一條首先哀「全體國民」與廣大小生產者的利益的這中間產生鄧演達的第三黨，這是中國此番革命中最早的「中間派」。

結果，如大家所知，第三黨並沒有什麼發展。鄧演達死後，有幾個領袖回國民黨去做官了，有幾個堅持着的，便躲香港做亡命客，跟中國的實際發展，甚至跟中國的任何一部農業，都脫離了關係。第三條道路沒有走，走不成的緣故倒不是因為此路不通，而是因為這條道路上給中國共產黨走去了。中國共產黨自從在武漢，接着又在廣州失敗後，不久便把工作與努力的，心從城市轉到鄉村，從工人轉到農民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脫離了城市與工人，全力從事於農民軍事鬥爭之後，事實上已經從工人革命路轉入了農民革命的路，從二的路邊路轉進了中間道路從馬克思主義的（雖然也是應用得錯誤的）路走上了鄧演達的道路。

第三黨在組織上是失敗的，但在政治上却成功。中國共產黨繼承了牠的路。至於共產黨呢？組織上成功了，政治上楚失敗的，中國共產主義的天運動從一九三〇年以來，簡已不再存在。祇有極少數從共產黨分裂出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支撐着這頂帳。中國托派在組織上的可比第三黨好得一點。此種表現於政治舞台上的興衰榮辱，完全反贈中國革命失敗以來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牠反映着中國無產階級之完退出政治舞台，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地主之不穩定的統治，又映着農民大眾在反革命統治下的繼續抗爭任何一個政派的命運，絕不能分享着牠所代表的那個階級共同命運的。

過去中國二十箇歷史，主要是一方面資產階級與地主，和另一方面農民之間的爭鬥，表現在組織上，便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那一段歷史是沈悶糾結與無出路。為什麼無出路呢？因為，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由於出生的歷史條件使然，她對外帝國主義相結託，對外和封建殘餘的地主勢力相聯合，不能徹底解決（至不能部分解決）中國當前最切迫的土地問題與民族獨立問題，因此她就沒有希望爭取廣大農民到自己面來。另一方面，農民，在內階級分化與缺乏城市無產階級政治領導的情形下，無法成功一個決定的羣的力量，去推翻資產階級地主的統治，結果，形成了「也解決不了誰」的局勢，形成了無出路「死」。

必須有個第三重出來才行呢，人們從來就祇感覺着。

一九三二年春兩上海抗日戰爭與不久之後的蘭建「人民政府」，都是第三人的嘗試，但因事情祇限於少數上層軍人結果祇曇花一現罷了。

到了一九三四前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情形有了改變：日本帝國主義的略愈加兇暴，「甯附友邦不事家奴」的當處態度更加明顯；同時，那時韓國的經濟來了一次相當可觀轉機，這適合首先使得

先生」一文。兩篇文章雖和普通的英文迥然不同，在讀稿中含着批評，然而却正因為這個原故能够表現了英文作的真誠，非普通一味讚揚的況可比，由此評的融融，才能反映出讚揚的有力當我讀到該文歷歷應應同情憤激迫者的車跡來襯托陶行知先生終身同情被迫者的精神那一，我感動得眼淚不禁匯而出了。

從思想一說來說，杜威、陶行知思想我的思想，是南轅轍；就是從行動上來講，像若飛葉挺秦博古諸士的一生為革命奮鬥的事跡也應該更能使我感動。可是人們忘掉葉秦諸志死難的文字中，我沒有遇着一篇能够像這樣使感動的。這是什麼故呢？一個字：「誠」。惟誠可以動人。我到三國演義上孔明哭周瑜的事。東吳的將士看見孔明哭周瑜哭得那樣哀慟，由得也隨着唏噓起來，心裏甚至對於平時批評的孔明和周瑜不和的謠言也懷疑起來。孔明雖為周瑜所忌，但是最能得周瑜的却仍是孔明。爲了權漢宗的責任艱巨而如今失去了最有能力的同署，孔明的哀慟不但是虛偽，而且超乎尋常。明的真誠態度不但感動當時的在側者，他那篇交卷至能在兩千年的讀者心弦上引起共鳴。

我記得當葉秦諸志一遇難的時候，新甘報曾刊載有名學家的悼詩，有相當的地位發載同一文學家題後詩一首。那感憤詩尚可一，但那悼詩却毫無意義，因為那既無真實的感情就要說是字句的堆。三男君悼陶行知先生的文，雖對陶行知做了惡毒的批評，但惟有這篇文字真正指出了陶先生精神可貴處。看哪，你看他躲在曠息杜威的史門徒一時非常之多而真正足爲杜威傳人的只有先生一人啊！

城市的一部分中小產階級，學生，一部分的工人又踏進了政治舞台。他們以三者姿態出現了，組織在救國會中。這可說中國二十年來第二次出現的當可觀的「中間派」。

抗戰發生，在期的民衆與齊與國民黨軍政統的一時聲地之下，各個小黨都相當活躍起來了。牠們在表面上都獲得「合法存在」。但因國共二黨抗戰口號之下的聯合，國民黨抗日而獲得了比較廣大的民衆擁護，共黨則因放棄階級鬥爭而蒙受了些資產階級的批評。在此情形下，「中間派」的社會基礎簡直愈愈小了。以後這些派別雖然露了面，聲勢（如救國會）却反而比前更小。這原是自然的，牠們的存在是為了完成抗戰，既「抗戰」了，他便祇帶着擁護的分兒了。

「中間派」的出現要等到抗戰後期。那時候國民黨完全投靠在美國懷裏國共關係復趨惡化，抗戰初期的民主偽飾愈拋棄，戰爭的反動性質愈加露，過重的與不平等的戰爭負擔，激起了極其廣大的一層民衆，尤其是帶中小資產階級羣衆，對國民黨制極度不滿。這個新的環刺激着國共以外的諸小政黨，使他們組成了「民主同盟」，形成了一個規模比從來更大的「中間派」。

勝利以後，「民主同盟」接收大員的貪婪無恥，復員「機噐」的橫暴反動，「強之一」之兌現爲斐列演第二，「和平」夢之化爲殘酷的內戰，再加上通貨膨脹，物價飛騰，飢荒遍野，貪污橫行，而政府則一味對外諂媚，對高壓，沒有一個改弦的辦法也絲毫沒有改善的企圖。這種情形，使得更多的人，甚至大資產階級中某些部分，也都對國民黨政府滿起來，附和着民主的呼聲，於是中間派的民主同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並且，類似性質的團體：上海民衆團體聯合會，民主建國會良主促進會，爭和平大同盟；等等，竟像後春筍似地發生出來了。史派的政治運動達到了一個鼎盛時代。

社會基礎

既然中間派是據一個歷史的結果，是中國目前政治形勢的客觀產物，牠存在着，同時起着作用，那末對牠漠視是不可的。我們必須研究這中間派，究其立場，其作用及其前途然後對牠採取一個正確的態度。

從何着手呢？權的基礎。不過看上面的歷史明中，我們已略略提到過這基礎，那便是介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工人農工之數衆多的中等階級如果歷歷出來，便如危復亮生（一位中間派的理論家）所說的：「民衆之家，手工業者，小商人，商業從業員，知識份子，小生，富農，中農（自耕農及一部分佃農）」（見七月十四日又應報「何謂中間派？」）。我們不想討論者這些人物構成了中間派的社會基礎；但研究在中國目前政變關係與關係中，這些人物能否造二個中間性的堅強的政治組織。

要做這樣的研宄先讓我們看看國共兩黨的社基礎是什麼？

國民黨代表什麼階級？這問題乃二十年來中國政治上與理論上的聚訟之的。這問題的答覆，以及由種種答覆所作出的政策，關係着中國的政治，以至當決定了中國的最近史。當千年前，中國國民黨還祇局限於廣州一隅共產黨正想和牠合作革命的時，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初次爲問題發生了爭論。一方

回想起幾年前我在某中校教國文，課本出了胡適之翻譯的篇杜威的演講。表面上看來罵胡適之的頭頭是道，層層有理。我照着杜威的意把演講譯講解之後，問學生看出什麼破綻來。杜威的思想連學生大學教授也要受它麻醉，心會讓中學生看出綻來；大家當然說毫無破綻，於是我就硬把那篇演講中被綻指出來讓學生重新舉，他們才了然於腦哲學的經驗真理的狹隘腐爛可

靠。又回想起輩前我偶然有一次和陶行知接洽的機會，陶先生先發了我一點不好的印象，使我覺得有點悶氣。本莊威的教育法是要用啓示方法實際經驗來訓練學生使用自己的頭腦，好讓直捷認識真理。抱這樣義的人照理是會十分謙虛的，所以會給人以頑固自足的印象呢？問題關鍵大體正由於他先有了唯經驗可靠的信念。我們討論一個問題，我表這個問題需要研究改良的地方很多，陶先生却為何已有方案，只要拿去實施就得，看有實用有無毛病，學理上的研究是多餘的。啊，這不是論主義的頑固嗎！（也許因為先生具有樸素的格，說話了截，使我誤會了他）

照這樣，威和陶行知的思想既和我的想不同，何以三男科陶兩先生使我非常感動呢？那是由作者沒有「預科陶兩先生的思想錯誤而掩護陶兩人中可資的素質。儘管杜威先生不了了解革命的必然和要，但他能由人道主義始終為人壓迫人的狀況反對戰爭的殘酷。儘管他和托次基有意見上的較，但他一旦覺得俄國清黨審陰謀共黨的嫌疑却敢挺身出來調查該事件之真相，不願有礙於勞動的危險。陶行知先告為人，正如他改「為」行知」一事所先也。儘管本著自己認識去實行。儘管他的教育理想未必正確，小先倘未必能够達到掃除文盲普及育

面，以史大林為首，國民黨是「民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農民，工人的四級聯盟」，另一方面，以托洛次基為首，則為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他和世界上所有的資產階級政黨一樣，是包含許多工廠小資產階級黨的。前一見解在第三國際中占上風，因此也成了中共的氏見解。將這見解實行出來，便是共產黨加國民黨，服從其紀律，信奉其主義，聽從其指揮，結果，袁知通，共產黨者及工農大眾拚死拚活，血流汗，將這「四階級聯盟」捧上了政權之後，資產階級「獨裁的鋒利面目就立刻顯出來了，將其他「三階級」殺倒在血泊之中。

資產階級經過國黨掌握了全國政權，問題則原已解決了，但人們還是以新方式爭論着。史大林及其中間的從者說：「民族黨」一階級聯盟，「一階級聯盟」一就上政權却變序「封建殘餘」，真是開所未聞！不過他們自有一說的，他們說國民黨鼓足表示着資產階級之叛變並與封建殘餘的投降，故勝利後的國民黨成為「封建殘餘」了。

托洛次基及其中一派的意見認為：國民黨資產階級與軍閥地主的妥協，並不能表示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封建化」或地主，在目前這個時代與環境中地主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祇許資產階級領導地主，所以任何資產階級與主的聯合政權，祇能說是資產階級的。

根據前一見解，民黨雖然反動了，但中國資產階級仍舊革命的，或仍舊可以革命的；但據後一見解，則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就整個階級來說，已經隨民黨的反動而反動了，袖手不能起任何真實的作用，來促進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解決了。

自西五年，中共全盤努力就是要靠農力量顛倒國民黨的「封建殘餘」。據八年，中共所採取的一切政策（聯合敵對階級合作），以及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則根據於「資產階級革命性」。一個認識，兩種應用，而結果都是加深革命的勢力，革資產階級的統治。

抗戰使中國的經濟發生了二大變化。第一財富集中地集中在極少數官僚的資本的手中，他們把持了全部金融機關，由此制了國家的整個經濟命脈；第二，世界財政資本，亦即美國財政資本，更加深入地打進了中國的經濟構，使中國的金融資本成為牠的一環，成為牠在中國的代表。

這時了，國民黨構，使中國的金融資本成為牠的一環，成為牠在中國的代表。『封建地主，買辦，僚』，如此國民黨已不代表資產階級了。因為依照他們的意，祇有「民族資產階級」才是資產階級，辦僚是屬於另一範疇的。但我們知道，在目前中國，不買辦與官僚，便是那些大地主，也都是金資產階級一身兼做的。所以是金融資本兼併着土地，藉佔着官位；是金融資本操縱着中的經濟，控制着中國的政治構成了國民黨的主要的社會基礎。難道金融資本家不屬於資產階級嗎？難我們能說國民黨是一個「封建的」政黨嗎？按照抽象的理論說，「我們的」金融資產階級誠然不是「民族資產階級」。但我們要問：國有多少民族資產階級不帶有辦性的？有幾個「民族資本家」不在尋找僚資本的合作？有幾個「民族資本家」能對金融資產階級獨攬起來？簡直沒有，即使有，也是鳳毛麟角。

在帝國主義的財資本時代，官僚的獨佔資本排擠自由的民間企業是一個意的事實，是註定了的

的目的(教育普及與否首先與社會制度有甚關係)，但是他始終照着自己的認識努力不。他雖未能徹底了中國社會癥結所在，但對於爲不滿的却敢說敢，屢觸當局忌諱。

由於三男的文章，我聯想到目前流行輿場風氣。如果計其啓發行事實，則社會上可罷一填人。但是誰知道計文其啓不可盡信。不許文裏的作風竟死於社會，從普通社會中『前進』集團。『死於』的個個好，就是活著中凡與者播子者，不爲全人。對名人則極力讚揚美，對領袖則『附和』。革命份子既失其精神，則改革力就必然大大降。就拿陶行知先生來說，陶先生然指出現行教育制度中許多缺點，嘆息教育不能普及，窮人不能讀書，但他始終有明確指出教育以不能普及及是出於社會制度，反而過分高調『小先生制度』的功，社會學的優點，使人們想實現社會制度下『小先生制度』和『社會大』能够把教育辦好。陶先生教育思想在這點上然是有毛病的。但固他是『星』戰士，於是『一切』都變成無可非議的了。

思想的偉大和批評既然如此感，無怪『同傾向』的思想亦得混淆不分。哲論論者不覺代替了辯論的唯物論。舉例來說罷，最有名在文學家郭沫若先，最時髦的左傾哲學家艾思充先生至中共領袖澤東先生一切機會都要大講向『大眾教育』，『少數』如何教育『大眾』，如何提『大眾理論水準』。『少數』只有『大眾』，如何提『大眾理論水準』。在『書本』上的理論探討都是空談。他們忘記了『大眾』的『動』有局限性，表面性，不適合科學方法的分檢討，是難免要包含錯誤的。如果『不談』加『深』研究，一味強調向『大眾』學習結果必然會做了『大眾』的『尸』。最近我確見幾個『大眾』

命運，我們不能叫自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回來，不能叫殖民地的中國自外於資本的合併過程，這個過程以其殖民地的方式在中國完成着；本國資產階級以世界財政資本代理人資格，躲着落小企業，集中資金全部，施展反動的經濟行爲，行着野蠻的政治壓迫。這樣的資產階級是反動的，但『實』處此，中國却並沒有一個較不反對資產階級了，因之，也不能有一個較國屬更不反動的資產階級了。中小規模的工商家，即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縱使對這金融資產階級着千般幽怨，也只得屈膝承的。縱令有一時期的反抗，但遇到緊要關頭，即遇到有關於資產階級與農大眾的利益衝突時候，他立即拜倒在官僚買辦的金融資產階級前，團集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了。

這故事不過的十年中，已經表現了太多次，以致我們不再相信目前的出派能造出一個奇蹟，把『民族資產階級』與天生軟弱病醫好，讓他們在地主官僚買辦及其政黨面前終立不屈。現在讓我們來看資產階級的階級基礎。

對於這問題，出派的施復亮先生給了我們一箭答覆：『她始終自命爲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言外之音，施先生對於個『自命』未能盡同，但又說明異見。究竟共產黨的『自命』是否與事實相符？我們得自己來研究。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國共產黨確實可稱得『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雖然他的政策着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但具其基礎，政治意識，政策傾向，以及主的行動說，他之代表無產階級是不可否認的。

革命失敗後，正我們上面所說，共產黨實際是逐漸離開工人，走向農民了等到她轉到陝北，提出聯合戰線，粉飾民主主義以後，共產黨實際已公開否認了自己是一階級的政黨。毛澤東和施復亮的見解一樣，認爲中是『被掩蔽的社會』，兩頭尖而中間粗的，共產黨就是要代這個廣大的中間層的，所以拋棄了階級爭，提倡階級合作，放棄革命主張改良，否定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努力要發展私人的民族的資本主義。共產黨和施復亮先生一舉，把自己的政策緊緊地扣住在民族企業家。小地主，富農，中農的身上，緊緊地扣在這中間層身；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得了廣大的發展，爭取了普遍的同情，甚還得了美國自由派記者與國一部分民主派資產階級的愛；同時也因此，他失去了所以爲共產黨的基礎——無產階級與農大眾。

中國共產黨今日階級基礎是以股資的自耕農，『兼顧』着佃農與小地主的利益，同時又以改良政綱吸引小商人，手工業者知識份子等類人物，甚至還企圖吸引『民族企業家』。這個階級基礎恰恰就是施復亮先生說的廣大的中間階層，也正此造成了施先生所說，共產黨『優越與弱點』。如此說來，中間自以爲可能擁有的社會基礎原來最上層傾向於國民黨，中層趨附於共產黨，中間派終於會墮落在半空中的。

『中國革命史』譯稿人到，暫停一期從下期起接發第三章『新覺醒』。對於留心中國第二次革命史的讀者，我們敬致歉忱。

編譯部

選舉和示威 (法蘭訊)

朱海聲

統的人，問他國民黨明明毫無談判誠意，以我方看不出來，蓋其在委屈求全。他們給我回答是『因為人民致希望和平』。中國人民一就希望和平，確是真理，但是向國民黨委屈求全是二希望以給人民以和平呢？事實告訴我們，中共愈屈求全，愈使柔伏，國民黨就氣焰愈高，反動愈甚，和平愈無希望。這就是做民衆尾巴的結果。

其實中共精神上的腐化，早已不止是思檢討鬆懈了。官僚和缺乏思想檢討互爲因果，中共內部甚至造成頹廢的虛偽現象。不但欺騙別；甚至欺騙自己。其原因不外無勇氣正視現實只一味盲從領袖。領袖未嘗者不敢言，領袖已道窮敢道，領袖所警者吾不可以加毀，領袖所排擊者吾不可以親近。一話，連自己也不相信，但爲宣傳却必須拿上騙。一句話，連自己也沒有，但因爲人家說它乎『辯證法』只得依樣葫蘆例如中共的失守長春明明是由於力不能保，偏有妻說是爲謀大局和自動放棄。前些年紅軍自江堤圍出走，明明是爲實力懸殊太甚，不得不放棄果，以謀保存一分武力，偏有人要說是『以爲進』，好像說『退爲進』就合乎辯證法則，宋得已放棄果就就俗是。俗雖俗，却比那玄虛的以退爲進』更能出事實，革命家如果不敢正現實決不會走上勝道路的。

記者，守敬先生投來這篇文章雖稱讀社友三昇前期悼陶行知先生一文，說了其一中一段，感動得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們仍不避淺之嫌把來發表了，因爲文章從陶先生底底主義談到了中共現有的哲學，我們認爲是有見地的。我們主張以真名譯實物，我們重正視和理解，守敬先生此內所說的一切我們都可同意的。

明日黃花之。

到巴黎後觀察法局勢，覺得是很緊張的。各級都動員起來了，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政治興趣，都在討論着法國應走甚麼路，都漸漸有了決心，爲自的政治主張，或可說，爲自的階級利益，而參加實際的鬥爭。這個局勢，雖不能認稱爲革命局勢，一種開革命不遠了。

千頭萬緒從何處說起呢？我想拿最近一個月內發生的兩件大事做中心，說一法國階級鬥爭的現態。這就是本月二日的僑憲會議選舉和本月二十日巴黎工人工人示威。

制憲會議選舉，你們早已從通信社報告知了；各黨所得票數百分比，們也應當知道的。這些，我都不說了。我說的是各方面關於選舉結果的數量。

『人民共和運動 (RFR)』(這是戰爭發生字有的黨)以及一般右派都離勝利，因爲這個黨經此選舉從第三黨一躍至第一黨地位了，在上次的憲會議中佔第一黨地位的共產則退居於第二黨。『人民共和運動』領袖即外交部長比多爾 (Bideau)，代替前會黨古森 (Goussier)，做了臨時總統。不愜法國資產階級理，號開報紙轉載的英美諸國言論是這般看法的。『人民共和運動』是天主教黨，同日意大利選舉恰好也天主教黨得了勝利，佔了第一位置，於是人們把荷蘭，比時，甚至西葡二國天主教黨所佔位置聯繫起來，遂覺得這個勝利帶有國際性，至少是西歐諸國所共同的。

但法國共產黨自承失敗，『人道報』根據產黨所得選票的絕對數，使『維護共產黨的選民，比上次選舉時增加了。這證明暫時選舉共產黨人并未曾因失望而離開，如派報紙所說的，反而有新的走來擁護。

我的觀察則不同。我們對於議會制度并無幻想但亦不像無政府黨人或工團主義者那樣把議會看作一文不值。議會中黨爭力量的對峙固然不能忠實反映社會外真實的階級力量對比但在社會危機期間，每次議會選舉各黨票數消長是對於象徵意義的。國自從露出希特勒軍隊以後，連此次共舉行過三次全國性的選舉。試拿三次選舉票數及其百分比來比較一下。但須說明的是，即如下：(一)看做屬於共產黨單位的，而是以各黨所代表的階級爲單位的。我把社會黨 (SF) 和共產黨 (C) 看做屬於共產黨階級營壘的黨派，把共和運動及其他右傾各黨則做屬於資產階級反動營壘的黨。表中票數和百分比都是同一營壘各黨所得之總和；

讀者 無產階級領導

革命

華崗

編輯先生：

看到了新，我不禁有幾句話要說。不曉的
政治經濟常識缺乏，我的話祇是一些直覺吧。
我覺得新旗有顯與人不問：

(一)「物物(反動派的當然除外)」，「擊
現實，太偏於極，新旗抱有『不娶哭，不娶，
只要理解』的偉；

(二)「物物漫罵一通後，便無下文，」人
沈悶，新旗則指示人們一條路走。

不過對於旗的基本態度，我却有一點懷疑。
我覺得物太偏工人了，他在任何問題上都着地
指出了工人階級領導，但據我看來，中國的人
階級在知識上不及學生，在數量上大大的不及民
，為什麼祇有物配領導民主運動和革命運動？
我的知識很淺，問的問題很幼稚，但我自有
許多朋友確實這個疑問，所以提出來請你答。

世明先生：

華世明上

七月廿八日

來信說的兩點感想，自然使我們高。
我們不想新旗比一般進步刊物好，不過們
對目前現狀願簡單作感情的漫罵，必須處
企圖理解，尋求根由，藉以得出正確的辦，
那倒是實。我們認為感情不是壞東西但
必須建立在正確的理上才有用，同時正的
理解，又必須隨着正確的辦法才有結果。我
們與感傷主義無緣，我們與梁空的研究無。
目前的一龍步刊物，大多數是民主派的民

選舉	社會黨和共產黨共舉數及其百分比	人民共和運動及其他反動黨派所得票數及其百分比
第一次制憲會選舉 (一九四五年月) 全民投票表決法 (一九四六年月)	九, 五〇六, 一七三 49.5%	九, 五九〇, 九五〇 50%
第二次制憲會選舉 (一九四六年月)	九, 二八〇, 二八六 47.0%	一〇, 四五〇, 八八三 53.0%
從上表可以看出個工人政黨總票數是第一次多，以後都少了些。但從百分看來少得明顯些；	九個月前佔百分之四；五，九個月後佔百分之四了。不錯，票拿共產黨來看，票數和百分比都有相	那些剛加入政治舞台後階層。法國一向有名的沒有份，如汪德省，加爾瓦多，艾杜諾省，伊爾與
在內，共產黨損失了少的票數，北方薩區，里昂，亞，龍河口及其他無產階級力地區，共產黨票數	也風有減少而沒有增的。反之，資產階級警學則幾和百分比都漸漸增加。不進去投社會黨和共產黨	的票的，改投這些右的票，而且新加入政治舞台的後農民區域也大多投他們的。
法國資產階級黨政治勢力底加強可以從「人民和運動」增長底迅速看出。一九四五年九月各	地方參議會選舉時，僉三千席中祇能獲得二百三四席，即不到百分之十；可同年十月，制憲會議	五百八十五個議員中他已獲得一百四十三人，即差不多百分之二五了。(社會黨共產黨議員則合共二
百九十九人，即過半數上。)九個月後，「人民共運動」就代替共產黨為全國第一大黨，得到將近六	百萬的選舉票和一百零多個議員。	為甚麼這兩個黨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重對社會如此變化而不利于產階級的呢？主要是
因為社會黨和共產黨錯誤錯，辜負了工人以及一般小資產階級之期望。法國遭慘敗之後，傳統的	資產階級政黨都破產了不僱工人，連小資產階級都不信任資產階級領導，借英軍隊回來「解放」	法國的較高案，在國眾象之中并無強大而堅固的基。城市小資產階級於解放切切或者抱觀望態度，或
者積極站在工人方面，因為工人有兩個強大的政黨，有一個「總工會」CGT，其中組織了五百	萬工人。小資產階級揀選舉工人政黨，使之在制憲中佔據多數地位，使共產黨為全國第一大黨，使	社會黨為第二大黨。更這二黨得着勝利之後做些甚麼呢？他們做的不是革命，不長改變法國現存的社會
制度，而是要維持這個會制度。他們未曾提出一個出資資本主義範圍外的要求。事實上，法國共產黨是	最堅決主張恢復法國資本主義秩序的，而法國社會黨黨可能助他。感謝他們苛的政治，法國資產	

主派的特之二是不懂得社會的生理學與理學，換句話說，他們不能或不願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學。所以他們雖然大聲疾呼，聲現實，但他們所反對的時常祇是一鱗一爪的現象，祇是聲言頭痛時候的一些呻吟，祇能找到病源而不能下藥治療，所以他們的論常是感性的呼喊的，而非理智的與分析。當主派的第個特徵是他們以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作基礎的，因此，他們和目前的統治階級，即和右的金權資產階級與地主們很多血脈相通之處，也因此，他們除了攻擊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呼喊之外，不能進一步提出真正有力和有效的鬥爭辦法來，即不能提出徹底的階級鬥的辦法來。

我們以能堅持『只有理解』的信守因為我們接現代最進步一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我們所能『指小人們一條路走』，因為我們是工人階級與同情工人階級分子的一團體，所以能所顧忌地指出鬥爭的方法。

不過雖如此，在目前這階段上，假使民主派的情的呼喊也是需要的，因為喚的民衆會在他們的呼喊中醒來，會由此去論理解，更由去尋找辦法。

關於入階級的領導問題，新旗上許多在任何文與任何地方都說到的，專門這問題的有第『期』上的『工人與政治』，牠這問題說得很明白，希望你能够翻出來仔細看。我祇告訴你一點：我們之所以確信革命能成功，是研究了近百年世界各國革命，資本主義會的特點以及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才加以確的。這裏絕無一點感情作用在。

階級才能修復其完全損壞了的國家機構，才能重建軍隊（用美國配備，由維希督指揮），才能恢復其警察和特務組織，才能發展其新的政黨使迎合小資產階級底傳統和成見。他方面他們又反對工人改善生活條件的要求。整個產黨以及牠的在政府中的部（空軍部，勞工部，復興部，工業生產部，國務部）都藉口必需增加生產而反對工資『解凍』，——即許增加工資。（法國工人工竟在凍結於四千至五千佛郎之間，祇够應付最低的生活之半數。）直至此制憲會議前後，共產黨才宣佈也贊成增加工資了。共產黨如此支持法國本土主義，以致美國共和黨反對討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也能說：『法國共產黨復與法國的樹，并沒有一點社會黨或人共和運動向前進些，更左些。』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階級失實消極，而資產階級改別黨的收，雖有甚麼可怕的熱？此次選舉共產黨從第一減降為第二黨，而人民共和黨從第三黨昇為第一黨，難道真麼不能解釋的麼？

可是如上面表裏字所指示，階級力量對比雖改變，仍是有限的。法國大政黨和工會仍保有強大的力量。工人和小產階級一般消極和失望固然革命前途的暗影，但此次選舉仍令人樂觀的光明投射出來，那就是另『工人政黨』國際主義共產黨（P.U.I.）走上政治舞台。

『國際主義共產黨』是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已十多年歷史了，一向是人數雖而忠實於工人利益的正統的馬克思列寧派的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起牠即表明列寧的革命的失敗主義立場，到了希特勒軍隊侵入法國後牠即號召起來抵抗，牠參加和領導黨抵抗希特勒的運動，牠的機關報『真理』是法蘭西後第一張出版的密報紙，牠的黨員給希特勒從殺死了好多。總書記希克（Carole Hix）死於布瓦華克集中營內。其他要領袖，邁希列，格根，昆特令克，蘇占，克勞，先後死於希特勒太保之手。赫斯特別為達爾手下的法斯黨徒所殺。『解放』後，黨政府不承認這個工人政黨法有在，不許牠的機關報『真理』登記。高案下台後，機起的古森政仍堅堅持這個決定。直至法國會黨一部分黨員起來抗議，美國，英國等工人團體代為請小之後，到今年四月十五日，即此次選舉之前一個半月，這個黨才正式取得公開地位了。

國際主義共產黨經取得公開，即參加選舉，空國上一個選舉區內提出候選名單，所得票數如下表：

- 巴黎第區 四,六七七票
- 巴黎第區 三,〇三九票
- 巴黎第區 四,五八八票
- 非尼斯第區 四,六一八票
- 季隆省 三,七五一票
- 伊色爾 三,六九〇票
- 瑪因省 一,八九一號
- 悲得洞 一,八九一號
- 龍河省一區 四,九四九票

我們這，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存着兩個主要的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即人階級），其他階級如地主與小資產階級（包括城市貧民鄉村農民），則是過去社會的殘餘，不管他數量上有多大，總是趨於沒落，或不能起立作用。在資本主義初期，社會上的主要動者是地主貴族，同時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組織力量都不大，所以代表地主的進步力量是資產階級。是牠，率領了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農民與小市民，去和地主貴族作戰。這初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級構成。漸地，尤其到了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在世的最大部分掌握了統治權，地主的地位削弱了，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若牠的剝削壓迫，主要的反動勢力變成資產階級了。這階級誰能率領廣大的羣衆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呢？當然祇有工人階級，因為小資產階級複雜呢，自相矛盾，起不了獨立作用祇能被領導不能領導人的。

那末國的反動軍兵是誰呢？有人說帝國主義，又說是封建殘餘，其實都不對帝國主義不是直接統治中國的，牠經過代理人來統治，而封建殘餘却已經失去這代理人了。自從一七二七年以來，中國的政權完全於資產階級手中，這個資產階級政府無論從政綱，政策方針，關係來說，都祇能說是代表金融寡頭資產階級利益的。牠外與帝國主義內與羣衆力締結着解不開的血緣關係。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可能對「發生惡劣，表示反對；但二者之間的距離極小，妥協極易，因為根結蒂，他們終究是一家人呀」要想這些中小型資產階級領導「最

洛特與倫省
薩伏衣

九七〇票
四九三票
共 四，九一五票

這票數在全國票中的百分比還是很有限制的，約佔百分之〇·二三。但在幕前法國局勢中，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一來，表明法國政治舞台上有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即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政黨，來干涉了。在幕前的運動中，這個黨散發幾百份傳單，將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綱提出於人民面前，在巴黎及其他城市設立了巨大的木板，張貼黨的標語和圖畫，又參加了三次公開會議，與敵黨熱烈辯論。這種種工作和鼓動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一來，這四萬多票中，又有巴黎就佔據一萬五千票以上，其餘省份也是工業建設的居多，例如龍河省就是昂城所在地，李隆省就是波爾城所在地。這是表明，一部分失望了的工人來投這黨的票了。

但是議會選舉決不能忠實反映國中階級對立的對立。革命黨派在議會中的百分比總是比牠在議會外的力量低得多的。際主義共產黨是法國一切黨中唯一提出無產階級革命政綱。牠認為在法國是如何根本推翻資本主義度問題，而不是在這制度風氣改良問題。牠參加羣衆自願民主權利的一切鬥爭，但牠認爲必須把主鬥爭看做爲無產階級革命綱領鬥爭的一個部分，才有革命意義，——總之，牠現在在法國採取的階級，正是一九一七年布爾雪維黨在俄國採取的路線。牠參加制憲會議的選舉，但牠尤其關心議會外實進行的階級鬥爭。

羣衆實際的階級爭進行着，不願也不能完全失議會主義孔道內，如共產黨社會黨領袖們所期望的。本月二十日巴黎人的大示威就是一個證明。

原來反動派在二十二日選舉勝利之後過分興奮了他們獲得議會勝利還不夠，想在議會外摧毀工人的力量。戴高樂下令一向戒嚴，此時又說請了。偵說，要水一個「強硬的」組織一個「強硬的」政。這話，在那些動資產階級青年中間得到了響應，他們於十八日夜裏，即選舉臨時總統之前夜，亦即巴黎陷落的紀念日圍集了好多人，舉行示威，懸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所在的多丹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時候，把這機關的窗子打破了，鑽法，把其中圖書的書拿出來焚燒，一面喊着「戴高樂重掌政權！」「送托勒到柴堆上去！」「托勒（*Tollu*）就是法國共產黨總書記。這時已在深夜，街上沒有工人，因此沒發生甚麼衝突，這些「金色車」做完了他們的工作之後，「警察就很客氣地把他們遣散了。

第二天選舉總統，法國共產黨議員提出了抗議同時巴黎總工會和共產黨聯號召於二十一日舉行一個示威；得到社會黨全國總工會和其他工人團體贊助，這示威遂於下午散工以前個鐘頭開始了。這是「解放」以巴黎最大的示威，據說戰前年也未曾有那麼多人示威。戴參加的有六十萬人。羣衆叫喊的口號有「吊死法西斯！」「工人階級高萬歲！」「肅清反動分子！」「增加工資百分之二五！」「向暴力作戰！」「打倒戴高樂！」「記勒執掌政權！」等等。後二號分明是回答十八日夜裏的反動口號的。

緊縮的圖案反對金融買賣資產階級的反動論調是也。

學生固然比某些「民族」資本家急進些，不過學生也你得知，學生本身是不統一，在社會上不是個階級，而是多階級（中多數是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出身）的一個團，所以他們可以對某些問題來一個共同行動，但等運動深化，利益一明顯，學生本身就分化了；數向右，少數向左。因此，學生不能領導革命的，雖然他們可能領導一次示威或一次請願。

餘下賡有農民了。誠如你所謂，農民數多，生苦，但毛病和學生一樣，他們不是一個階級。農民中有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中農，貧農，佃農，雇農。這些類別的農，各以其利益之相近而接近城市中的相當階級。在反對地主時，他們可能形成一戰線，因中國農村階級分化之烈，這戰線很快會破裂的。破裂出來的貧農與僱農雖然佔大多數，然是革命的一個偉大力量，但一因貧農之小有者根性，二因農民的分散性與各後性，所單憑他們的量決不能有效地打擊資產階級。現在我們就不能不想到中國的工人階級。雖然工人數少，知識低，但因為這個階級集中在全國治經濟命脈的點與線，最有關，在社會生產中所佔的地位最重要，小有產的成見與思想保存得最少，從生活上領悟階級主義的必要容易，對資產階級的罪惡知道最清楚，既，要反對資產階級反動統治，即反對帝國主義代理人與封建殘餘的保護人，就非由他領導不可了。

舊日的革命歌曲，可是這些雷，共產黨早已廢除了，早已「馬賽歌」和其他的革命歌曲中，唱得最多的，馬國歌」以及舊時共產主義年團的「當心歌」，命開始了，這是一切饑餓的人們身之日！」

門情緒，是共產黨和社會黨團一向壓迫着的，這日有了機會噴洩出來了。羣衆自然號召此次示威，卻不能控製來。共產黨樂隊仍舊吹奏「賽歌」，共產黨工作止「打倒戴高樂」和「托勒望政權」兩個口號，共產黨又羣衆叫喊：「要普爾口號。可是這些努力終不能搖巴黎工人的階級鬥爭精神。

門情緒的表現，不僅出於反動意料之外，而且出於共產黨身意料之外。共產黨了，爲的適應羣衆這種情緒，免得羣衆完全脫離他的影響，次日，巴黎工會領袖召集各工會書記開會，明白布：「我們已到反守爲攻的時候了。我們必須記得現下過日子。我們必須鬥爭，必須得如何保持獨立，才能達我們的要求。」關於張「廢除職業的軍隊，代以兩軍，裁減警察預算，沒收非利潤，等等」。共產上層的政策。有人說：「領袖太容易受欺於二黨政府的騙了。有人提出：「府」口號，而且說：「這不尊重部長聯合的，必須有廣大民主羣衆的行動。」繼續以前的路線，他們不過利用那示威來向新總統索取更多內閣位置罷了。談到了他們要求的內閣的位置，又空泛允許將來要增加工資，共產黨便收回了這「增加人聯合政府了。

人提出的增加工資要求。總書記托勒在今年三月開的工會上明白宣布：「生產於生產，罷工是要幫助托勒斯，增加工資祇能增加物價，造成通貨膨脹罷了。三天，共產黨才拋棄了這種態度，而贊助工人的增加工資要求。這顯然是爲了取悅選舉完了，共產黨又收回增加工資的要求了。但是「全國總會」仍然堅持着這個的共產黨人和政府裏的共產黨有了衝突。究竟是誰有衝突呢？還是兩副面孔，則我是始終維護工人的增加工資要求的，他提出了「依回生活費計算工資」口號。中的口號。

兩個機會主式的工人政黨雖然過過了革命時機，領導無產階級去同資產階級共相於資產階級政權之下，但革命前能仍然保持着。選舉中國際主義共產黨之出現，示，二三次「聯合政府」試驗敗將引起工人懷疑和反對，「這一切都告訴我們是有可能再掀起一次革命的但願「國際主義共產黨」能速發展，成爲法國無那時不懂工人能更堅決，更有鬥精神，而且小資產階級也「更不動搖，更有信心

新旗

第八期

半月刊 實售價幣三百元

政府問題應如何解決？

三男

『壞政府』不能再存在下去。事實擺着，便是執政者自己也知道得濟濟楚楚。如此這般的政府，不但在野的黨派反對牠，老百姓怨恨牠，就是做牠靠山的美國，對牠也頗不滿意。反動的執政派即使不怕在野黨派的反對，不管老百姓的怨恨，可是為了敷衍美國，也不得不表示政府現狀的必須改變。

如何改變這『壞政府』呢？現在有三種意見：一、擴大現政府；二、組織聯合政府；三、召集全權普選的國民大會。第一種意見是國民黨主張的；第二種屬於共產黨及民主同盟；第三種是少數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即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所主張，我們從來也抱着這個見解。

『請客式的』擴大政府，就是說，『壞政府』原封不動，但請在野黨的幾位領袖加入進去，擔任幾個不重要的部長。這辦法之無關於民主，無補於國事之解決，那是太清楚了，中共與民主同盟的刊物上已經批評得十分痛快，十分足夠，毋需我們再說；總之，這是一種虛假的掩飾，反動的偽裝，其作用僅能替『壞政府』遮醜，叫不滿的大眾受騙，結果是於民主絲毫無益，於革命大大地有害。

現在一般進步人士都寄託全部希望於聯合政府。具體說，都贊成根據政協決議，把目前政府改組。究竟如此改組出來的政府能有多大力量，我們祇好看政協對這問題如何規定好了。政協的決議主要有如下四點：第一，承認『以現政府為基礎』；第二，『國民黨人占國府委員名額之半』；第三，國府主席只叫有五分之二府委的支持，便可推翻國府委員會的決議；第四，行政院政務委員會中不足

三分之一的大概由國民黨以外人士担任。這四點已很清楚地說明了人們所希望的那個聯合政府的真相：『壞政府』基礎不變，議政機關由『壞政府黨』占三分之二，行政機關由『壞政府黨』占三分之一以上，同時國府主席仍保有獨裁權力。此外，還有一層必須明白：在那半數與三分之一的加入政府，非國民黨人中，包括那個業已被『壞政府』收買的青年黨，上層某些份子已在動搖的民主同盟，還有王雲五式的『社會賢達』。如此說來，表面上是『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一』，實際上還要大得多。我們能希望這樣的聯合政府做出奇蹟來嗎？我們能說牠比『請客式的』改組政府好些，甚至比目前的『壞政府』好些嗎？

如果這樣的聯合政府成功，事情不但不會比現在好些，甚至還會壞些，因為：本質上仍舊照樣地壞，而表面上却『民主』起來了。一塊爛臭肉，加上些鮮豔的偽色，那是大大地害人的。

第八期目錄

政府問題應如何解決？	三男
關於勞協事件	振聲
十月革命道路	蘭因
論『中間派』(下)	風岡
從田賦說到土地革命(讀者論壇)	大同
保甲制度壓榨下的農民(熱帶通信)	益輝
人生觀與社會主義(讀者通信)	曹保珍
中立與是非(讀者通信)	管佩秋
中國革命悲劇	Harold R. Isaacs

發行處 新旗社
香港西灣河
太古船塢李振聲

不過有人說：這樣的聯合政府果然不好，但由此阻止了內戰，不是值得的嗎？其實這樣的聯合政府還是阻止不了內戰的，充其量，不過是換一種方式的拖而已。要想以這樣的聯合政府來阻止內戰，祇有在一個情形中可以實現，那就是共產黨願以少數黨員加入政府的代價，片面地解除了自己的武裝。共產黨是否會如此做呢？多半不會的。不過即使這樣做了，那末唯一結果，將是中國之更加速趨民主，這是「聯合政府」之較目前的「壞政府」更壞。因為，不管我們對內戰以及由黨派控制軍隊二事採取何種態度，可是在目前情形中，共產黨武力對於國民黨政府多少起着解毒劑與防腐劑的作用，却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所以像政協會所決定的聯合政府，如果真的實現了的話，實在是一無好處的，唯一的作用，只是替「壞政府」做一番粉飾工作，癩漢民衆真正爲民主與革命的鬥爭吧了。

——那末較好的聯合政府何如？如果聯合政府不以國民黨政府爲基礎，如果國府委員會員額的分配於中共及民盟有利，豈不好嗎？至少，不比目前的「壞政府」好嗎？——我們聽到了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要解答這個疑問，我們祇好指出這一點好了：不到最後關頭，統治黨祇肯給「議案式」的聯合政府；到最後關頭，革命黨便不應該接受任何方式的聯合政府。如果接受「議案式」的聯合政府是幫統治黨派的忙；那末當危急時候，統治階級爲了自己的存在而願意讓出大部分官職的時候，在野黨若接受了這樣的聯合政府，則幫了政府黨以更大的忙。所以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遺教之一，便是：在任何條件中，都不要參加統治階級的政府。第二國際的墮落一部分由於拋棄了這個教訓，第三國際的成

產則以其聯合政府策略而得到了最後完成。

最近世界各國的歷史上充滿着這種聯合政府的悲慘例子，也充滿着這種政府的教訓；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在一九三六年前後的法西兩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參加了資產階級的政府，結果都幫助了統治階級渡過關頭，以便事後讓資產階級建立獨裁；目前的法國，意大利以及城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也都成立着聯合政府；可是事實證明，都已到相當程度內，幫忙穩定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如果這局面繼續下去，中間沒有一個真正革命工人政黨起來奪取全部政權，建立工農政府，則此種國家的聯合政府，遲早都要讓位於資產階級的獨裁，甚至法西斯式的獨裁的。

英國的現政府表面上完全屬於工黨，但事實上却也是一個聯合政府；工人政黨占據着政權的表面，資產階級則握孔政府的實權。阿特里政府和過去兩次的麥唐納政府一樣，其作用不過等工人羣衆較爲平靜的時候，把政權交還給保守黨吧了。

如此說來，聯合政府不過是統治階級及其黨派在危機時候的一個應急武器，還不清楚明白嗎？這樣的武器於統治階級有起死回生之效，但於要求徹底改革的在野黨及其所代表的民衆，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中國共產黨如果真的爲了中國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真的爲了中國革命任務的解決，不是爲了少數幾個領袖的出處，就必須拋去聯合政府的口號。

以上所說，乃是與革命利益而言的；假使以爲革命的名義不「正大」，那末我們還可以從「法律與人民」的立場來討論這個問題。共產黨，或者民主同盟，不管牠的主張與政綱如何與人民的利益相符，但總只佔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國民黨的政府是壞的，因為牠違反了人民的意志與利益，所以須得

代替，但用什麼方法來代替呢？唯一的辦法，就得徵詢一下全體人民的意見，這才合乎人民的利益，這才合乎民主的法律。如果照政協的辦法，或用更好的辦法，由幾個政黨的領袖協商結果，安排好一個新的政府，那不過是黨派政府，說得壞些，是「分贖政府」，決不是全體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在人民眼中也不會是好的。

因此，無論從實質的革命利益說，或從形式的民主立場說，聯合政府沒有什麼不得的，與國民黨擬行的所謂「擴大政府」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所以解決政權問題，我們認爲：必須由平等直接不記名的普選方法產生全權的國民大會，由牠來解決一切問題，包括政權問題在內。祇有這樣，我們認爲，才可以新起爐灶，根本與壞政府絕緣，依據全體人民的意志建立起一個好政府來。

不過說到這裏，我們又聽見了兩個反對意見：一，在一切權力都押在壞政府手裏的時候，如何能依最民主的方法產生出真能代表民意的政府？二，在現政府之下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即令選出了這樣理想的會議，不暫時延長了壞政府的生命嗎？爲什麼不可以先改組了壞政府，然後再進行普選呢？

在回答這兩個疑問之前，我們先得做如下聲明：我們毫不懷疑現政府將盡其一切可能來阻礙這種國民大會的選舉。同時，退一步說，即使這樣理想的國民大會的實現出來了，如果國內各階級力量的真實對比沒有變更，牠也只能做壞政府的裝飾品的。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贊成易見成效的改組政府或聯合政府，而如此堅決地主張國民大會呢？最簡單的回答，就是：爲了革命的利益，但是爲什麼聯合政府違反革命利益而國民大會符合這個利益呢？一句話：前者是既成政權上層份子的拉攏，是妥協的辦法；而後者則是喚起全體民衆，起來解決自身問題，

是奉獻新的道路。不管這道路上存在着多麼大的障礙，但其基本的精神與方向，却總是革命的，徹底的，是自下而上的。但是爲什麼非自下而上不可呢？又是一句話：如果不讓龐大的人民大眾直接起來參加政治，中國的僵局是決計不能打開的。中國目前一切問題中的問題，可以歸納到如何讓最廣大的人民起來，而人民參加政治的現成公式，就是全權普遍的國民大會。因此我們主張個國民大會。

然後我們可以解答那兩個反對意見了：第一、讓政府大權在握，自然有力且不讓老百姓根據自己的意志投票；但只叫平等直接無記名的普選，只叫人們享了法定的選舉權，只叫他們被喚起了對政治的關心，那末政府的任何干涉，都將是給民衆一次政治教育，一次革命訓練，其效力，其效果，要大大地超過什麼聯合政府的。如果強暴民意，包辦壟斷地選出了一個國民大會，這自然無補於國事的解決，但在這一虛偽選舉的整個過程中，被強暴的民衆對政府的認識却更加清楚了，幻想也就更少了。第二、先改組了政府，或先組織了聯合政府之後再進行國民大會的選舉。這對於選舉的進行上是否能有較多民主，是一個大疑問。（多半是不會的，因爲上面說過，這樣政府的實權仍舊操在執政黨的手裏。）可是這樣一來，却有一個大毛病，便是：在野黨分租了執政政府的責任，以致在爲國民大會的產生而作的鬥爭中，緩和了人民大眾對執政黨的仇恨。這不是「暫時」延長，倒是永久延長了執政黨的生命了。

責任分明是頂頂要緊的，誰若想產生一個全權的國民大會來代替現政府，清算現政府，那他就絕對的不該分租現政府的絲毫責任。所以爲了國民大會的民主選舉的保證，我們可以想盡一切方法，唯獨不能參加政府。

我們自然不能對一切現實問題閉起眼睛。爲使民衆的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得以產生，爲使產生前減少國家人民的損失，又爲使產生後能真有權力解決問題，組織在各個民衆團體裏，爲下列的先決條件的實現而鬥爭：一、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二、各黨派合法存在；三、立即實現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光自由；四、立即取消特務制度，保障人身安全；五、立即撤換美國在華的駐軍；六、立即取消保甲制與警備制；七、立即組織兵士委員會，予現役兵士以投票權；八、立即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使工人有時間與精力參加政治；九、立即沒收土地地稅貧農，使最大多數的農民能飽肚皮來過問政治……

此外，我們還主張由各個民衆的團體，如工會、農會及兵士委員會等，選派代表，組織選舉監視團，監視各個地方（不分國民黨區或共產黨區）的民主選舉。

祇有羣有組織的人民力量，才能實現這些先決條件；祇有實現了這些條件，才能產生真正普選的國民大會；也祇有實現了這些條件，才能促使選出來的國民大會賦有全權，藉以解決一切問題。

關於勞協事件

振聲

中國勞動協行總分會，於一月前被國民黨特務組成的所謂「市工會」會同警察「接收」了。此事發生，引起了中國一切進步分子與各工會的抗議，而且也引起了國際工人組織的抗議。

我們也願意在這些抗議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因爲這是執政黨反動派反對一個工人組織的暴行，我們在任何鬥爭與任何情形中都要站在工人一邊的。

不過我們參加這個抗議，並不表示在政見上與中國勞動協會一致。站在工人階級鬥爭的利益上，我們必須公開地說明這一點。

勞協是一個較近的組織，但牠的負責人朱學範等等，本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國民黨的官僚，趁國民黨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作用的。在反革命加深的幾年中，他們一直是黃色工會的領袖，屢次被政府派作「工人代表」，出國去參加一些國際的勞工會議。在鬥爭中，他們總是表面上站在工人方面，而實際上站在資本家方面，解決一些勞資糾紛。因此，十幾年來國民黨所從事由朱學範等在執行的「工人運動」，非但得不到工人的擁護，而且獲得了他們的消極的仇視。

這是事實。這事實不但說明了朱學範個人的經歷，而且也說明了整個中國改良主義工人運動的命運。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之下，祇能以最慘酷的手段來榨取工人階級；否則，牠便無法生存了。因此，中國改良主義的運動從來不能發展，也因此，國民黨的工人運動從來祇是特務與流氓控制的別名。

但中國勞動協會却是一個特殊現象。牠雖然仍在朱學範以及國民黨系黨人的控制之下，但作風是不同的。牠確實替工人做些事，給工人辦些福利事業，領着一些工人的鬥爭，並且創立許多工人的組織，因此，牠也確實獲得不少工人的擁護。中國勞動協會在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上，第一次造成了個相當有力的改良主義運動。

這應該如何解釋呢？

第一、我們知道，勞動協會是美國的二次改良主義工會——美國勞動聯合會與產業組織大會——捐款創辦的。牠的一切經費，一切事業，都靠着這筆巨額美金的捐款，這就是說，都靠着美國改良主

王先生說這是中共要走的道路。

(二)十月革命，——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王先生說共產黨不要走這條道路，不過中國「客觀的條件卻在發展着」。王先生從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說明中國有走上這個前途之可能。尤其在軍事方面，他說：「士兵一聲擡槍，中國的十月革命馬上出現。」

(三)政治協商道路。——即各黨派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王先生說，這「是當前中國極理想而又極藝術的前進之路」。他毫不躊躇地希望中國不要走前面兩條道路，祇要走第三條道路。

好多年以來第一次，我們在公開的論壇上聽說了：中國能走十月革命道路。更奇怪的，是說這話的人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同情的人。而是有名的半政府報總主筆。中共及其同情者則是堅決否認能走這條道路的。全部的「新民主主義論」證明甚麼呢，倘若不是證明中國不能走十月革命道路？

但是王先生認為中共祇要走南北朝道路，而不要走政治協商道路，——那是冤枉了中共的。中共把武裝隊伍撤退到江淮以北去，乃是不得已的辦法，牠原是要經「政治協商道路，與國民黨聯合執政來建設新中國的。

從毛澤東到重慶起至今一年了，這一年政治協商得到了甚麼結果呢？甚麼都沒有結果，除了證明這條道路走不通。所以國民黨當權者一天比一天更加堅持他們的一黨專政道路，國內戰爭不可避免，南北朝局勢也不能長保了。共產黨應當毅然決然走上十月革命道路，應當拋棄政治協商能解決問題的幻想。可是牠至今還沒有這個決心。

連王雲生都說中國客觀條件已在發展着十月革命道路了。現在祇缺少一個羣衆的革命黨，能在主觀上堅決走上十月革命道路。

共的聯合支持之下，勞動協會所代表的改良運動還是很快速到了極限；中國的資本主義太貧弱了，她負擔不起這個改良的重担，資產階級憤怒了，大叫「中國工人的工資高過了美國工人的」，聲言「六個月以內就要同歸於盡」，人們紛紛以鬧廠歇業等等來要挾了。於是勞動的主人——朱學範，立刻露出了他本來的面目，高呼止步，力言勞資合作的重要，他又故調重彈，到處去鎮撫工人的罷工。自從本年七月以來，勞動對工人的鬥爭即使不出於直接干涉，也總是消滅勞動工人的。

可是資產階級及其國民黨却連這樣的勞動也不顧地繼續存在，配合着全面內戰，趁着整個的反民主高潮，他們在勞動的初期活動地向這個改良主義的組織進攻了。這就發生了前月間重慶勞協事件。對於這件國民黨的暴行，我們說過，我們自然堅決反對。

不過趁着這個事件，我們要再一次地提醒工友們：中國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是無法存在與發展的。勞協證明得清清楚楚，即使有美國的幫助，即使在國民黨官的直接控制之下，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府還是不能讓牠存在。中國工人階級若想得到解放，甚至祇爲了生活改善，都必須經由不妥協的階級鬥爭。朱學範及其勞動的道路走不通，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道路也是走不通。

十月革命道路

蘭 因

最近，大公報總主筆王雲生先生，在新創刊的「觀察」雜誌上發表「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文章。據他們的判斷，中國時局有下面三個前途：

(一)南北朝，——即以江淮爲界劃分中國爲南北朝，南朝歸國民黨統治，北朝歸共產黨統治。

義工會的幫助，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目前這點改良主義運動，乃是美國的改良主義的分支，是牠在中國的代表人。不錯，這筆捐款全都是美國工人弟兄們的汗血錢，他們的捐助自然完全由於無產階級超出國家的階級愛，我們工人應該十分感謝的。不過這就是直接捐款的工人說的；倘使美國工會的高級領袖說，就執行華爾街政策的國務院說，這筆對華捐款，多半是用心良深的，他們希望在中國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改良主義勢力，以便和中共共產主義的工人運動對抗。美國這些工運專家與目光遠大的外交家是知道的：要使中國不赤，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在中國工人階級中造成一個強大的改良派。國民黨無此力量，也無此見識，中國一般的資產階級自然更談不上，於是美國直接來投資了。

第二、國民黨中某幾個專門負責「工人運動」的中統系的官僚，預見到戰後工人運動的興起，中共勢力之膨脹，於是決心利用美國的帮助，扶植一個改良主義運動，以便控制整個工人階級。

第三、中共由於其階級合作的政策，及其聯絡民族資產階級的企圖，再加上十多年來的脫離城市，在工人階級中沒有力量，所以也就擁護着勞動，與朱學範合作。

這三種情形造成了今日中國勞動協會的聲勢。勞動協會的種種活動開始於抗戰首都的重慶，但長成了工人階級堡壘的上海。一年來，上海的工人鬥爭，造成了勞動的羣衆基礎。在這些鬥爭中，勞動，雖然本着牠一貫的妥協態度，本質上總站在資本家方面，但她爲了在羣衆中獲取初步信仰，總算領導了好些鬥爭，並且組織了許多工會。結果，朱學範及其勞動協會，確實在上海工人的心目中有了地位了。

但即使在美国工會，國民黨一部分官僚以及中

論「中間派」(下)

鳳岡

政策與前途

浙江慈谿縣東鄉，洪塘鎮，莊橋鎮，駱駝鎮，洋畝鎮等地方，四面是桃四明山圍繞着，風景優美，像是一個桃花源，別有天地。一般人民大都是務農為業，從前稱為富饒之區，人民的生活可

能過得下去。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以來，這個四明山下的桃花源，變成炮火瀾漫的游擊區，今天和平軍打來，明天共產黨三五縱隊打去，後天又是國民黨的宋部隊與共產黨三五縱隊火併，輾轉擾亂，勒索搜刮，弄得一般農民難過日腳。

耕 益

這裏的農民對抗戰是冷淡的，對軍隊是惡感的，不僅對馮軒和平軍是恨入骨髓，就是對國民黨的宋部隊亦是恨恨至極。比較有好感的要算對共產黨的三五縱隊，後來三五縱隊發抗幣，刮削

過甚，農民對牠的好感亦漸漸變為惡感了。

和乎以後，農民們希望着能過戰前一樣的生活，能透透連年戰爭所受痛苦的氣，可是農民生活沒有得到一點子改善，反而變本加厲的受到壓迫，日日呻吟在苛捐雜稅田租高利貸及保甲制度的壓榨之下。

『抗戰勝利』了，政府大發慈悲，頒佈三十四年度免徵田賦一年，但是追加補收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的田賦，每畝徵收穀二十八斤，而且縣政府和鎮公所還徵收公糧穀(俗稱積穀)，其數量每畝竟達一百十斤左右；再加以業主的租穀每畝要收一百餘斤；於是三十四年度農民收穫的穀，都被政府和保甲鎮公所以及地主們所吞刮盡了。

三十五年度實行『二五減租』和『停徵積穀』，這是勝利後政府支付給農民的一張支票，歷年來

那末怎樣產生出目前聲勢相當浩大的中間派的政治運動來呢？難道沒有社會基礎嗎？不，牠是有社會基礎的。我們說牠「終於會懸掛在半空中」者，祇因這個社會基礎雖能造成一個廣泛的政治運動，却不能凝成一個堅強的政治力量之故。目前中間派這個相當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祇因為下面這三個暫時湊成的條件：一、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在政治上初步覺醒，開始尋找出路，他們已開始左傾，但他們的反抗尚限制在和平與合法的範圍內；二、工人階級開始抬頭，但在政治上尚未發音，尚未有一個正式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其鬥爭尚未構成對有產階級的嚴重威脅；三、中國共產黨遠離着城市，同時主張階級合作，倡言改良，向『民族資產階級』伸出友好的嚴重威脅；這三個條件造成了一個合法和平的國民黨運動，這運動恰恰投合了一些不滿意國民黨統治的中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至一部分不在位的國民黨的軍人政客。

可是很顯然，這樣的條件是易變的，暫時性的。運動如果中途夭折，那末稍一前進，情形就會兩樣的，中間派的社會基礎就很快會縮小起來，牠的政治運動很快就會分崩離析，而『民族資產階級』將首先從這個運動中退開去。

我們說中間派的領袖『民族資產階級』將首先脫離中間派的運動，那是很少與民主派人士的操守或氣節有關的。這是階級關係，是階級鬥爭，個人的性格在此地起着不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雖然對於民主派某些個別的战斗士表示着尊敬，却必須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的弱點。由於我們在上文所指出的這個階級的地位使然，牠之參加到中間派的民主運動中來，與其說是領導這個運動，倒毋寧說是來控制這個運動，利用這個運動的。他們所以要這樣幹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們被處於金融官僚買辦的集團之外，不得不用略為姿態來要挾一下吧了。將來，他們或者控制不了這個運動，或者業已利用了牠而得到了相當讓步，那末這個『民族資產階級』都會與國民黨立即妥協的。

中間派的人士會覺得我們這估計太洩氣，太不尊重『民族資產階級』嗎？那末他們的政治意見便是我們這估計的最好證明。依施復亮先生說，他們的基本立場如下：

一、對內方面：『一切政策必須能照顧到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尤其不能超過今天民族資本家所能接受的程度；』二、對外方面：『支持聯合國；』三、行動方面：『應當是和平的改良的。』

這短短三點已經說得太明白了：絕對『不能超過今天民族資本家所能接受的程度』，換句話說，『民族資本家』的利益至高無上，一切應該為了『民族資本家』。再換句話說，中間派的廣大羣衆，應該替民族資本家爭取利益，保障利益。如身不能遵守這一條『政綱』呢？『民族資本家』就要請他的『敵人』國民黨來鎮壓了。

對外方面，中間派在美蘇之間不作左右袒，他們主張『支持聯合國』，聯合國是什麼？一句話，是美

受大小地主們剝削和保甲制的壓榨，農民們拿到這張美麗的支票，自然是特別興奮，額手相慶，以為從此可以過溫飽生活。『勝利』給我們的幸福呀！

可是事實不是這樣，『二五減租』仍舊不能名副其實的實行，大小地主們握有種種權力上的便利，居高臨下，來威脅欺騙農民，他們利用土地私有權的權力，恫嚇佃農收回佃權，留待自己僱人耕種，否則，另訂新約，租額不減；還有增加租額，現在每畝租頭有二百六十斤，有二百八十斤，甚至有三百斤計算的（佃農每畝早稻只能收穫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晚稻亦僅如此，每畝早晚稻平均收穫可得三百五十斤，而早晚稻二次都照二五減租，以二百六十斤租頭計算，則每畝須繳租款一百九十五斤；若照二百八十斤租頭計算，則每畝須繳租款二百十斤；以三百斤租頭計算，則每畝須繳租二百二十五斤）。租頭越大繳租數越多，這樣名義上所謂『二五減租』，實際上是一張空頭支票罷了。

至於停徵公糧穀（積穀），更是滑稽之至。積穀停徵了，其他捐款又像雨後春筍似的提出來了。例如：什麼『文化穀』呀！『事業捐』呀！『房警捐』呀！『戶口捐』呀！『壯丁捐』呀！『縣牛購』呀！『軍米捐』及其他臨時捐等不勝枚舉。這樣的苛捐雜稅，農民每畝共得繳納一百餘斤，這與繳納公糧穀沒有兩樣，不過把公糧穀化整為零罷了。

其尤甚者，莫如把分類雜捐收去之後，再要農民追繳公糧穀，使農民忍無可忍，激成農民之忿恨，致引起八月十日駭聞農民的反抗鬥爭。茲把八月十二日，甯波時事公報登載駭聞鎮公所和警察派出所壓迫農民強索公糧穀的經過事實抄錄於後：

（十日）慈谿縣駭聞鎮公所事務員翁冠勳，於下午十二時，帶同武裝警察四名，向第一保灣塘農民強收畝款。當由農民方雲章

國準備進攻蘇聯的一個輿論員攪鬧吧了。支持聯合國即等於支持美國。支持聯合國即等於反對蘇聯。行動方面之公開標出『和平，改良』，令人想起了甘地先生，他是絕對反對暴力的。如果他所領導的羣衆越出了『和平鬥爭』的範圍，他老人家甯可對敵人『懺悔』，投降，而不肯作『暴徒』的俘虜。國民黨是否比英帝國主義更尊重『和平』些，『民族資本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心裏是雪亮的。

目前中間派運動尚未形成階段，廣大羣衆遠感是激於國民黨的反動腐敗，含糊地憧憬着民主的前途。但是領導者的『民族資產階級』却是十分清醒的，他們趕緊定了範圍：『民族資本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支持聯合國』，『和平，改良』。

興起後的中間派羣衆，一旦踏上了真實的鬥爭道路，能否遵守着領導者的範圍呢？絕對不會。羣衆鬥爭有其自己的邏輯；或者在萌芽狀態就被『自己』的領導者會同敵人將牠擄去了，或者一直發展下去，首先越出領導層給設下的圈子，然後逐步左傾，不斷深化，一直走到現代社會的革命極限，即打擊私產制度，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中國目前的中間派也逃不出這兩個前途：或者，被上層『民族資產階級』所出賣，中間派羣衆的政治運動在硬壓與軟騙之下給撲滅下去；或者，中間派的羣衆在向右急進的路上，逐層拾棄其上面的妥協分子，以致最後剩着塊塊勞苦小資產者大眾，他們圍集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實行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建立工農政權，以此根本解決中國的各個難題。可是無論循前一或後一道路發展，中間派要想以一個政治力量獨立地長期存在，都於此證明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種力量的政治形態

中間派這一不可避免的分化，在政治組織上，是否一定趨於國民黨與共產黨呢？這是不一定的。中間派的上層右翼雖然在政治的方向上與國民黨同路，但若革命勢力澎湃起來，國民黨這個原有的政治組織在民眾眼中難得太醜惡了的時候，那末一些『民族企業家』，會同了國民黨中的『民主派』，很可能組織一個新的『民主』政黨，有似日本的民政黨與政友會，改組為『自由黨』與『進步黨』一樣。

下層左翼方面，很可能轉到共產黨去，同時也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政黨，以城市小資產階級爲其主要基礎，藉以善後那些反國民黨的廣大羣衆。不過無論前一情形或後一情形實現出來，結果還是一樣：解決不了問題，打不開中國所陷入的僵局。爲什麼？因爲就階級基礎說，中國共產黨或類似的組織就是中間派，都仍是中國農民小資產階級大眾。這些羣衆和大資產階級與地主之間的鬥爭，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早就表現着了，不管牠具有多麼進步的意義，但總是沉悶，糾結與無出路的。目前的僵局正是那個鬥爭的結果，而我們今天的任務正是要打開僵局的。

所以必須有個新的力量出來，同時必須有個新的政治組織出來領導牠的鬥爭。這個新力量就是無產階級，這個新的組織便是一個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工人黨。

爲什麼祇有無產階級才是新的力量？爲什麼祇有牠才能打開中國的僵局？說起來話長，我們祇能簡單地從兩方面解釋這個問題。第一、由於無產階級的地位與性質使然。因爲在中國各階級中，祇有牠，與帝

、方阿定、張世材、張同餘四人，以公糧穀已奉令一律停徵，不允繳納，並索閱公文。該事務員遂惱羞成怒。迨午後四時，復率領武裝警察十名，警偵緝隊便衣偵探十名，荷槍實彈，驟動洶洶，將佃戶翁方周張五家包圍，被拘去方雲章，張世材，張同餘三人，一路拳足交加，帶至賚院鎮警察派出所。當晚，各農民工作完畢歸家，聞悉此事，俱趕至派出所，願與被拘三人同處罰。當晚，已激動全鎮農民公憤，擁黃鎮長翁寶麟，民政幹事何某，暨農會幹事鄭壽章、朱志芳等，強逼馮育，非法徵收。派出所警長恐激成眾怒，誑騙眾衆，謂被拘之人，概可釋放。眾衆信以為真，始各散去。詎料該鎮公所及派出所，於昨晨（十一日）三時，將農民方雲章、張世材，張同餘三人帶走，不知去向。昨日上午，農民推代表來甬，托朱鼎陶律師撰狀，向慈谿縣政府及司法處暨六區專署呈請擴充。

又訊，賚院鎮公所暨莊橋警察所，賚院鎮派出所，於本年陰歷六月廿四日，曾派武裝警察多名，防備農民方阿珍、張華耕、翁阿榮、張同餘、周華成等六人至鎮公所，當予拘禁。旋有該鎮農會幹事鄭壽章，為見好於鎮公所派出所，勸諭各人須繳納公糧穀。當將六人負責保出。越日，三人合繳三百斤，張華耕繳八十二斤，周華成繳七十四斤，除掣給用某收據一紙外（派出所所出），而三百斤無收據，待次日午後，鎮長翁寶麟，民政幹事何某及農會幹事鄭壽章朱志芳等，又帶同武裝警察多名再往第一保灣塘地方，挨戶勒迫農民出立筆據，共二十九張。該項筆據無徵收機關名銜，亦無斤兩記載，概寫新穀量如數歸還字樣，顯有弊費

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地主完全沒有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瓜葛，完全與他們立於反對地位；祇有他，與城鄉下層小資產階級沒有利益衝突，能够領導他們的鬥爭直到最後；祇有他，控制着全國的生產與運輸，也就是控制着全國與線上的經濟命脈，祇有他，本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隊伍異常集中；祇有他，憑生活知道了資本主義的罪惡，社會主義的必然。第二、由於中國革命的任務使然。因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與解決土地問題；但要解決這兩個任務，首先要用工人農政權來代替那帝國主義及地主階級的資產階級政府。誰能為工農政權而鬥爭呢？當然祇有無產階級。

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自然是革命的力量，但他們本身即是複雜與龐大的一羣，缺乏上述無產階級所具有的任何特點，所以他們祇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起革命作用，而絕不能起領導作用。

最後我們要談到新的政治組織了。在中國具有長年鬥爭歷史的共產黨，不可不取得這個資格。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能否從農民羣衆的黨再度成為無產階級的黨？對這問題，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一個政黨的階級基礎不能隨意改變。二十年來始終依靠着農民，迎合着農民，覺悟着農民意識，追隨着農民路線，以農民羣衆為基本幹部，活動於農村區域的一個政黨，即使有些真誠的共產主義革命家佔着領導地位，也不能回復到無產階級的政權了。何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又都已在那思想上墮落成三民主義者，蘇聯官僚主義的附庸，服膺資本主義的「折衷主義者」了。將來羣衆運動發展下去，共產黨可能轉移一部分勢力到城市中來，也可能去接近工人階級，甚至，我們退一步承認，有可能企圖把自己的基礎重築在無產階級身上，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共再成了代表無產階級的黨，他還是不能代替我們所要求的那個新的政治組織，即能够率領無產階級及城鄉勞苦羣衆去建立工農政權，藉以完成中國的歷史任務的。

並非每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都能够忠於社會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同時必須武裝着一個正確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綱領。否則，他仍祇能替資本主義服務。所以一個政黨的社會基礎固然重要，但依附着這個基礎，建立一個正確的革命綱領則是更重要的。近代史上不少工人階級的政權，而且也有不少自命為「社會主義的」，但祇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近來俄國社會主義的政權，而且也有不少自命為「社會主義的」。其他如第一次大戰終了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權落到了手裏，即全來鎮壓社會主義的革命，拯救資本主義。英國工黨已經多次拿到過政權，但的作用却是替「他們的陛下」服務，唯一出色的地方，只是他們比保守黨服務得更加好些。第三國際轉入了史太林時代的各國共產黨也是如此，牠在一九二五年以後用機會主義幫助中國國民黨走上了政權，一九二六年英國以同樣策略幫助工聯會的工賊們解決總罷工，一九三三年在德國以「社會法西斯」口號抬上了希特勒，一九三六年在法國用「人民陣線」的策略放過了革命形勢，同時期以同樣方法在西班牙便利了佛朗哥哥的胜利。大欺期間，以最壞的民族愛國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的大屠殺，戰後，牠們又各自以腐敗的改良主義，幫助着各個統治者渡過危機，穩定統治，以此來避免革命的再生，並以此來準備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基礎上不及法德等國共產黨的純正，而在政策上却與兄弟們同樣地掉入了階級合作與改良主義的泥潭。整個共產黨的再生是不可能的，牠們再不能自拔於沉溺了二十年的墮落道路了。部分的共產黨員，那些真誠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在未來革命的打擊與影響之下，一定會掙脫那無望的史太林

沈家翁領長故復舊，竟喚使派出所警察多，意欲拘捕農民，拳打脚踢，五人被拘時，竟被鎗鎗去，迄今不知下落。

領甲處之橫行不法，敲詐勒索，已成爲農村中一種風氣。當鎮長和保長的，像土皇帝一樣，每個農戶人家，要常常孝敬他們，凡有婚喪喜事，或過時過節，都要請他們做個精神來吃，或送禮物給他們，不然有什麼事就要麻煩你。八月十二日洋警領弟二保某姓喪事，因為沒有打保長的招呼，請他來吃，竟致觸犯了他，藉口棺材抬過他們舊宅徐姓門口，路徑走錯，犯了徐姓的忌，於是保長徐甫榮，閉起祠堂門，鼓動徐姓宗族裏的愚夫愚婦，向某姓拚命，要某姓担保三年無事或罰佛事一場，某姓不肯承認，於是勾結鎮長鄭燁景，強暴逼脅，敲詐法幣四萬元完事。諸如此類之事，實不勝枚舉。還有鎮保長常常抽頭放賭，騙取一般農民的錢。農民每年每畝收穀，平均不過三百五十斤，繳了一百多斤租穀；繳了一百多斤捐稅；還要孝敬鎮保長；剩下來至多不過一百五十斤了，再除去秧十斤，人工一百四十斤，還有牛食肥料等等，這樣辛苦一年，還要虧本，於是不得已借高利貸。例如，借穀一百斤還穀一百八十斤，二百斤或三百斤；借錢利息二角以十元爲期。農民們飲鴆止渴，越弄越窮了。總之農村裏面農民今日受苛捐雜稅的繁重，租額的高昂，高利的剝削以及保甲制度的變態壓迫，使農民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過活。

八月十八日於慈谿

者 (一) 人生觀與社會主義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新旗的愛護者，在此『非楊即墨』的

主義的，但這將不是表示共產黨的再生，而祇能構成中國新的革命黨的一部分基礎。

要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從事鬥爭，要領導這個鬥爭去打開目前中國的僵局，要發展這個鬥爭走上社會革命的消路，并最後達到勝利，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具有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工人階級的新黨。一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甚至徹底的民主主義者，都必須團結在這個黨內，站在他的旗幟之下。祇有這樣的政治集團才是目前中國迫切需要的第三種力量。也祇有這個力量才有存在基礎，才有發展前途，才有勝利把握。這個力量的位置顯然不介於國共二黨之間，而處於共黨之左；不是中間派而是左派。

左派政黨的形成與核心

這樣一個左派，倘就完成的組織形式言，中國還沒有存在；但就政治思想說，牠却久已存在了。上面我們說過，當中國共產黨離開城市轉向農村的時候，黨內有一個左派，以中共的創建人陳獨秀爲首，堅持着原來以城市無產階級爲主要基礎的革命路線，并且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左派，即托洛次基派的政綱，成了國際左派反對派的一個部分。二十年來，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經歷了最深刻的機會主義的墮落。牠由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一往不復地變成了民族的，階級合作的，擁護資本主義的改良政黨。這中間唯有牠的左派，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獨立存在，一九三八年以後正式稱爲第四國際的，始終信守着共產主義的傳統，始終忠實於十月革命的遺教。因之，在目前世界上，祇有第四國際才是具有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工人階級的黨了。牠分享着世界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渡過了反動壓迫與戰爭摧殘的黑暗幾年，現在正在全世界發揮其力量，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者。這個國際運動的中國分支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牠因中國工人階級的退出政治舞台而陷於衰弱無力，牠忍受了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雙重屠殺與迫害，但雖如此，牠却始終高舉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旗。

如今全世界是在完全毀滅或則會主義勝利的決擇中，中國的命運尤其要在這個決擇中受到決定。中國如果不經由一場徹底革命而建立了工農政府，由此而解決一切對外的難題，則行將毀滅人類的第三次大戰，多半要把中國首先毀滅。因此，我們可以說，要救中國，也正像要救世界一樣，必須有一次徹底而廣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但要實行這種革命，必須有一個能領導這個革命的黨。可是在中國現有的諸黨派中，唯一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即具有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即十八年前出的所謂『托派』，亦即『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所以這個組織，在未來中國新的革命黨的形成上，一定要佔着核心地位。至於共產黨以及民主同盟則不能起這個作用，因爲他們所代表的是中間道路，也就是過渡道路，在未來的真正決鬥中他們如果不站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方面，必然要回到十足反動的資產階級政黨方面去的。就上層說，這些『中間派』的右傾與反動是必然的，我們不能對他們有什麼幻想。不過就下層的羣衆說，『中間派』的龐大恰恰表示出革命局勢的來臨，任何革命少了他們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對於這些人，我們應寄以莫大的希望與同情。我們應該藉行動與言語之助，讓中間派的廣大羣衆覺悟到他們所希望的民主和平，土地與民族獨立等等要求，祇有靠最左的方法，即由工人領導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才能獲得解決與保障，這個覺悟將引導其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來參加社會主義的革命黨，並圍繞其中最大部分於那個革命黨的周圍。

環境下，你們立場是頗值得推舉的。

從來，我有一個一己的所謂人生觀的，但新的文章却把全部動搖了，然而又不曾帶給我新的，於是我心反而空虛起來。對於這一點希望，你先生能有以我。

此外，讀新旗的文章，我有一些零碎感，寫出來給你看看，並希指教：

一、第四期上『菲列濱果真獨立麼』一文中蘭因先生說『菲列濱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消獨立，不政治上獨立罷了。』這點，據所知，連政治都談不到的。現在總統蔣斯是一個曾附逆的分子，由於麥克阿瑟之全力支持，才擊敗人民所擁戴的奧斯敏納，而登總統之寶，這樣政治獨立在那裏？

二、我最喜觀的是『革命問題漫談』。

三、第四期的評：『六二三』的教訓，最有。

四、在可能範圍內，希望介紹一些初步的，系統

的理論。

五、『國大開』。貴刊認為要打敗目前的蔣，『應當要一個直接平等不記名普選的帝國民人會而爭』。我懷疑『普選』的可能。即使這理想能實現，技術上困難這大得可。

言保珍上八月廿三日

保珍先生

你說的人牛觀給新旗的文章打破了你不知是怎樣人生觀？新旗文章如果打破了你的舊人生觀我們想，那末，也能給你一個新的。因為新所有的文章祇代表着一個思想社會主義。會主義，而普通人的見解彷彿是一個人種政治觀，其真不然，牠是完完整整一個人生活做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不在政治上抱一個確定見解，而且在人生觀，

讀者論壇

從田賦說到土地革命

大化

自從抗戰以來，國的田賦逐年都在增加，沒二年停止過不久。如果田賦既繳的是貨幣，我們尚可以說因為貨幣的價值，田賦的增加是當然的。可是自從開戰不久，我們的政府就把田賦改徵實物，那麼，田賦增加一分老百姓的實質負擔也就加重。在戰事未停之前，我們尚替政府解釋說，由於戰費的需要，不得不之於民；中國人民為着水獨，求生存，必須犧牲。可是現已是停戰後的一年了，我們仍舊看見田賦增加。前些時候報上會載着今年的田賦是每畝徵四斗，借斗，外加縣級公糧一斗二升。計算起來每至少一共要繳九斗多。這個官的高得驚人，是任何人都會覺到的。以我所知，中國的水田，以上等計的，大致上在豐年也不過能收成到三石多。下等的水田是在豐收的時候也還收不到兩石。這還是時的情形。這幾年來，因為戰爭的影響，鬧得農民不能安心種，肥料不夠，田地的收成可說普遍的減少，大約上田的成只抵得上平時的中田，中田收成只抵得上平時的下田，至於下田則多因為耕種不合來而被荒廢了那麼，以未荒廢的田地拿來平均一下，每畝的收成在豐年不過兩石多。再豐年常年和歉年平均一下，畝的收成不過一石多。現在政府的田賦就要九斗多，那夢農民終年忙碌，種了，貼肥料，結果就只剩一石幾斗一畝了。

現在眼不着今年田賦就要開始徵收了。政府田賦負責人前天雖在報紙上發談話，否認每畝九斗餘那樣的高額，但是仍承認每畝須徵四斗餘。拿個數目來說，大約要占總收成的三成。我們政府處處主張復古，主張恢復有道德，惟獨在壓榨人民這點上，他是一點也不顧到什麼有道德的。論語中有一段記載

袁公問於有曰：『年餉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益徵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徵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未足，君孰與足？』

意思是說俸袁公為年級荒歉，費用不足，於高孔子的弟子有若問計，有若他實行十一稅法（即農民收十成，公家抽成），袁公認為，十成抽兩成且不夠，十成抽一成怎麼行？從這段記載看來，十成和兩成古人認為多，而目前的田賦已到了十成抽三成的程度，我們的府當局似乎還不以爲重的。

而且從上面所引那段論語看起來，說『年餉不足』，則在年不餉（即不徵）的時候費用並無不足可想而知。由此我們可以想到古人的十一稅或十二稅法乃是真正的十一稅或十二稅法，當年歲歉收的時候，公家抽的，乃是按照歉收的數目抽成之一或十分之二。正因為如此，所以年歲歉收公家的收入也減少，因而够用。可是現在的情形怎樣呢？十分之三的田賦乃是按年十分之三。縱使到年歲歉收，田賦也仍按照定額徵收，毫不減免。老百姓那裏會管到你們小白姓的活？事實上，我這幾年來在鄉間看到的，不歡收時錢糧不會減免，甚至荒蕪的地田，也必須照那完糧。照我們政府的商官吏想來，十分之三的田賦許不能算多。因為他們或許想地主所抽的地租數目

一般思想的方面，都必須有一個與衆不同的社會主義的場，社會主義者不能同時是宗教者，也不能時是個厭世主義者或退化論者。

社會主義是一個完整的人生觀，神祖著最現代化的學的宇宙觀，根據着辯證唯論的哲學體系歷史學見解，他無論對於宇宙前會，人生，史，都有一個獨特的立場，這立場構成了個社會主義者的人生觀。

所以做個社會主義者，必須接受現科學的成果，進化一切迷信與宗教；必須認識世界以及社會進行之跡，必須了解現代社會的法則，而且，必須與那為較重世界的學聯繫着，確一個人的道德標準。

孔子能够造成這樣一個新人生觀去造成這樣的生觀，自然，光靠新旗上的章是不够的，研究些別的更基本的書籍。

第四期的『非列濟獨立』一文。若憑你引出的話，自然是錯的，非列濟政治也不獨立。不文中接着說：『軍事上和經濟沒有獨立的家，政治上果真能够獨立嗎？』意思是說，政治上也不獨立的。

去讀『命問題漫談』好極。理論其實解釋是更史的。我們對國大問題的態度在第五期裏的『機』一文中，說得相當清楚。我們一並非重他是一個完美的機關的靜勢面，而是看『能喚起廣大鬥爭羣衆的政治覺醒的動的方』。換句話說，我們所要的變能否實現是個問題，但在此時此地為此而爭，却可以進歷史，推進鬥爭的。因此我詳細的解釋請參閱。

編者

比這還多。中國的地租最重的地方有超過十分之五。既然佃農能負得起十分之五的地租，那麼，現在政府把佃農也當作戶的佃戶看待，以田賦的形式向他徵取地租，似乎是應該有的問題。至於真正的佃農，則政府想他們並不負完稅的責任，負責任的是地主，所以照理不增加田賦的影響。

想像上的道理雖然這樣，但中國鄉村的實際情況決不是這樣。農民和土地所有者的負擔決不止那幾斗的錢糧。他們所負的甚至有正式錢糧的幾倍。軍隊借糧要菜要柴，是沒有關的。（糧日借，柴菜日要，幾乎借了會學其實是有還過的例子。具以稱為借者，不過因為國家更有口糧，不好再說要耳。）過午過節地方要款犒勞軍隊，軍隊開拔，方要幾份子歡送，新來了軍隊地方要辦酒席歡迎。軍隊沒有合式的住家要地方等錢蓋房子，不但要房子給軍隊住，還要有房子給隊的家眷住。軍隊住下來了，要地方籌錢他們置備鍋碗及動用器具，到軍隊調防，又要再另置一處地方有了匪警，軍隊出動，土匪沒有死一個，子彈的消耗却非要主或地方負責不可。地方上欠派差，明天派快。如果派到你家，你家沒有能應差應役的人，或者正佃忙忙抽不出工夫，就只好花錢請代替。有時花錢也請不到人，就只好把錢給保甲長，托保甲長代請。樣一來，當然又替保甲長開闢新的生財之道。其他諸如類的事情，真說不盡，例如鄉保長做生要恭賀，保甲經費和其他一切地方上的開支都要農民負擔。總共起來，農除了繳地租，應快役之外，年每畝大致還要開銷一石上下。

農民既受到這樣的取，當然生活是苦到了極點他們實在已經到了絕境。真正籌不出來的時候，當然只好坐佛坐牢吃司。但是現在的官司却不是平法學家們所想像的那樣容易。如果法律上有明文規定不繳錢糧或不繳項公費該判徒刑幾年幾月，要中國農民恐怕十個就有九個願意棄田地不耕護官廳判他們的罪了。事並不是那樣。在鄉間，如果保長或駐軍派到你該出某項費用你不出，最普遍的辦法就派槍兵把你拘帶到鄉公所或兵營裏押起來並無所謂按『法』完罰。高興怎樣打你，就怎樣打你。如果你家裏及飯盆來當然就有挨餓。一天送來餓一天，十天送來餓十天。晚間即幸而沒有被吊起來，睡的是稻草也沒有的滿土地。真是苦的叫化子也不如。叫化子大還有一把稻草過夜，還可以有向人乞討的由，而中國鄉間的農民個個預備着做原始社會囚犯的情形。

以上是農民一般的活狀況，至於佃農，情形當更壞一點。他們除了上述的負擔之外，還要繳地租給地主。在雙重榨取下，當然是比自耕農更苦。但一個人總是要設法活命的。了真正拿不出來的時候，按照事物的常理他們自然會向抵抗力較弱的方面尋找出路。地主和官吏比較來，自然是地主比較容易對付。因此，在重的雙重榨取下，公家的費稅無法推脫，當然就只好在地方方面來減稅。以我的家鄉情形來說，這年以來，那怕是梅上等的田也沒有能照約定租額收租的。地差一點的，因為耕種不來，當然就只好具充蕪。這樣一來，地主中間當然有好多陷於破產。在中國從幾年前起就流行着一句諺語：『往日田字半脚，今日田為黑字頭』。

城市裏的工人，商或公教人員，如果沒有到過簡，或者與田地沒有關係，只了上面的敘述，也前還不能了解何以田地變果實。他們想，地租雖然不能照定額徵收，縱令減讓，大總不會不繳錢糧。其實可怕的倒不是式的錢糧，而是正式錢糧後跟着的非正式錢糧。關於糧更加一大秤收糧，故

(二) 立與是非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落黨濶關係的學生，不過我也不恨那些自命爲中立者。我覺得祖國是一個中國，就不能對中國的中立，因爲中立與旁觀是相不遠的。我看中不值的另一原因，就是這名稱往是一個幌子，越是在中立，而骨子裏却越是有黨。

我覺得，在個時候，超出於既成黨派是好的，甚至至是應許，但對於這些政黨之間發生糾紛却無所謂中立而祇應站在超黨派的立場上，即不站在糾紛有關任一政黨的立場上，評斷一非非；不但評斷，們還應該積極站在是的方向參加鬥爭，以反對的方面。

你們的態度很贊成，雖然你們不是無黨派的。你們不屬於國二黨，超出於二黨，但不中二，有是非。你們抨擊國民黨，同時也批評共產黨，但你們顯然不將二看成半斤八兩，顯然有所高下，有所偏袒。你們較爲進步一邊的批評，只是了更進步，爲了更力地打擊反動。這個立場，是十分擁護的。

最近我看到本雜誌，是專門給「青年與婦女」看的，有些態度跟你們差不多，但有些態度很粗成問題，例如在五期，牠在一篇論內戰的文章，就過國民黨如何不好之後，接着作者彷彿要故示「中立」。說中共的行爲是「憑藉武力壓制」的軍閥姿態。這個我覺得太不對。批評究竟是應該的，但不把是非顛倒了。我們知道，窮總以區域形式進的，我們能單憑這個形式而模爲進步的一邊爲「制敵」嗎？「軍閥制敵」這舉句，不管應用的心裏懷着什麼起頭，我覺得，

黨和納糧人才難以取小費等情形，已經有許多親身宣布過的。除此以外，一方以防區爲名購買補給所費要向日敵上繳，爲防匪突襲補所費要向日敵攤派，地方經費缺乏要從田上籌措，而最可笑的莫過於「催征人」的征費，最可怕的莫過於軍隊的保糧軍費。先說催征費，國家錢糧既非常緊迫，糧戶那裏還敢不按時繳，要等到糧吏的催促？即使要糧軍吏催促，也只是到國官吏，自應由國家支領薪金，可是事實上催征人並無其人，不過由保費掛催征人名義，糧戶是既爲國官吏，自應由國家支領薪金的佃戶），就要徵收取保費三斤，如果一保有糧田三四千畝，那麼當保的單軍催征費一項每年就可以有一萬斤稻收入。無怪鄉間的保甲制度糟得一塌糊塗了。

所謂採購軍糧，亦是第二種錢糧，而且數目較糧更重，催逼起來比錢糧更凶。既說是採購，當然要按市價自由買賣才是理，可是老百姓自己已經沒的吃，而且明明知道軍隊難辦，誰個願意出賣。於是我們軍隊就想出了辦法，是按日攤派。每畝攤你多少，你就非賣多少給他不可。那怕你家裏沒有米吃，那怕你必須買米來餵他，讀者或許以爲：既是採，當有代價，那麼老百姓得了代價之後，豈不仍可買米。如果有人這樣想，那簡直是對中國事未死太慢了。所謂採購的實情是：先告官宣布採購數目，規定官價，限定納糧期。然後是層層催繳。等待糧納齊了，再慢慢等着採辦糧一層一層去採購數目，等到價款請下來，通過地方機構發到農民手裏，價早已漲了幾倍，幾十倍。這這這這跌跌跌幾倍，幾十倍的代價，也往這中間人吃去，不能到達農民手裏。所以名爲採購，實際上毫無代價徵用。

我在這裏且舉一個例子。民國三十年那一年，恰皖南豐收，那時上官雲相在簡主持軍事。他向中是宣城南陵鳳舉辦所謂搶購軍糧。本來上面規定是每畝徵糧類以八十斤（老秤）爲限，但是實際上攤派的數目竟有超過百斤以上者。糧戶規定的是每百斤（老秤）十三元，可實際上這批糧包給粵坊做成糙米，糙米又及後運，做工和運費都是從從價上扣除，結果稻每百斤實得價八元至十元不等，而這筆錢奔下來的餉，稻子市價已漲至每百斤十餘元。農民所得不過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而多數窮民老原連一畝田的錢也沒得着。因此老百姓說：什麼「搶購」？簡直就是「搶」！

尤尤拿軍糧一項來，除了非正式的「借」糧不，還有三種，一種是隨糧帶餉「徵購」，一種是上面所說的「搶購」，一種是「採辦」。名稱雖不同，實質並沒有多大差別，歸歸一語，就是老百姓把辛辛苦苦弄出來的米都代價貢獻給政府，實際上第二和第三種田賦，萬萬種田賦。拿隨糧帶微的「徵購」來說罷，是中央規定適用於全國的辦，照理應該可以辦得比較好些可是皖南有若干地方於三十二年隨糧似購軍糧代價，一直拖到第二年政府都沒有音訊。老百姓跑到縣府去問，他們總說上面沒有發下，實際上情形如何，老百姓是無法知道。

照這樣的情形，有地收租的人，自然是無法指點什麼，有時候把所收租糧全交把公家還不夠頭。以皖南宜南兩縣飛來的人，在平時，上等田的租大約是每畝老秤二百斤，中等大約是一百四五十斤，下等田大約是百斤下。現在下等田已完全荒蕪中等田大致都減低租額至百斤下，上等田租額雖未甚減低，但是因爲農已凋敝達於極點，無力繳付所以地主在實際上能收到的，比去年那幾幾倍，

只能助長反動的聲威，替牠吶喊，不知先生爲如何？

佩秋先生

魯佩秋上 九月一日

來信駁論，極是極是。關於中立與昇之分，我們想添說什麼，有一點需要補充，就是中國不但對於中國事不能中立，就是對於世界事不該如此。天下已成一家，「中國事」大部是決定於華盛頓的，你看。

中立來是一個騙詞，在此階級分鬥社會裏，真正立不能有，也不會有。至於非，那是有，原因就在於階級中有進步與動之故。

國共軍事，首先也應該就二黨所代蔣階級立場來討論。一邊一記目光的辦法自然正確，幫着反動的（就階級立場說）一邊反對較進步一邊當然更不該。

來信指那本雜誌上的話，我們找出來了，這話是錯的；不過我們希望文高作者祇是犯了字句上的毛病。

編者 九月十日

八月十日，北平有個盛大的晚會，慶去年日本的降。主席胡適演說中洩露了過去一件外交秘。他說，當他初到美國做大使時，正是中「最危險的日子；廣州和武漢兩城市於數日內相繼淪陷了。奉命向美國商借款的陳光，垂頭喪氣，不停沒臉向白魯判借款，而沒臉出門去館子吃飯。他打電請給新大使，要到大使館來吃晚飯。可是簡，美國財政長摩根索打電話來了，要請他二人去他家吃酒。九點鐘，胡陳二人到了奉

頭，也只合到定額的成。中田在減租之後仍不能繼續收。因此我看見國民政府當局在宣傳什麼「一五減租」，心裏不免笑，這樣的口惠，當然是樂你們做的。其實農民早已被你們壓榨到連七五租也起不起了。

所謂地主能實際得的田租究竟有多少呢？以簡的情形來說，譬如平均計算大約上田每畝可收百斤，中田六七十斤，田無收。上中下二等田再一碼，大約每畝可以收到六七十。這個數目大約是够完正糧，再遇高軍隊何難兼，那麼地主只好去田地逃跑了事。當然也有少數地主，那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和保長駐軍勾成一氣，通同作弊，以多報少，「飛糧」；「過戶」把自己應納的糧轉到別人身上。可是數守本分的地主是不能仿效深做的。去年我在蕪湖，和一個親戚在馬路上走，遇見一個形似光蛋（蕪）的人，我的親戚指給我看看向我認識不認識。我說不認識他說那是××茶葉行的小老板，家裏有幾畝田，現在跑到蕪湖來當光。言下大有鄙視之意。××茶葉行平時在宣城是相當有名的老字號，這幾年因爲茶葉生意虧折，而田地無收入，那麼那位小老板之流爲光蛋，自是可以理解的。我當時心裏：流谷爲光蛋雖表示一個人笨用，或有什麼嗜好，但是多還表示他沒有同流合污，現在能够同流合的人是個個有辦法的。

我有一個親戚家院北，有一點田地收租。據來信，這幾年不但租收不齊，還要倒貼各種經費。今天才設法把紅費付清過了幾時又累積得許多拖欠因爲他是個古老人物，把租著得非常寶貴，所以雖然賠累仍舊捨不得棄。結果是積欠愈來愈多，終不得不把田割賣一部份來清積欠。到後來佃戶跑了，保甲長仍要他想法派費，他一再托人向保長交說田都荒了那裏還有方法担認費。保長說，只要有廚房存在，上面是不報荒的。弄得沒辦法，只好把廚房也拆了。

像上面所說的這個例子，乃是鄉間一般情形並不是特殊例外。中國的農村，不僅小農不能生活，就是地主，除了騎更軍隊勾結吃人的，同樣也能生活。這當然是國民黨政府腐敗榨取的結果。可是國民黨爲逃避自己的惡，現在還在假宣傳要減輕農田負擔，規定地租不得超過收穫量的三成。好像鄉村農民的不能過惡怪地租太重。其實而上面所說，地主所能收的地租平均不過適合正收穫量的三成，而國家向地主徵的，只田賦一項已經就有此乎。

我說地主領有田並無實益還有一件事可以徵證，那就是田地的跌價。在中農鄉間已經有一個普遍情形，那就是下等田絕對無法出售。只有上等田還有買賣，而它的價價，和一物價對其起來，只合到平時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我想起了一件故。宣城東鄉雙橋鎮和孫家埠附近的田，是宣城出名的良田。前幾年川軍宣城駐防，有一位鎮軍長看了雙橋那塊地方，就派了一個官，他的宗家，住在雙橋專門替他買田。軍調防之後，這位鎮軍官仍在雙橋繼續他的「任務」。前一共買了幾千畝，在雙橋鎮上專門設了二倉房。過了兩年，錢糧漸漸重，收租漸漸困難，鎮軍長看形勢不好，發了一道命令給鎮軍官：租額二百斤以下的田一律賣去。這故事是宣城人個個都曉得的由此亦可以推知，除了極好的田地，尚有一點收谷的希望之外，大部的田地是難賣有收谷的了。

記得前年（三十二年）度的田賦軍糧（軍指中規定的軍糧）合共是三斗幾斤折老秤五十幾斤，已

根案裏，竟財政部次長和兩個顧問都奔兒，才知道這一個「鄰重其事的會談」。愈整甚麼呢？梁耀斯爾總統已經批准中國借款了。廣州和漢斯路，中國兩位外交官認真險向美國開之時，美國居然不待開口就發借款了。真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消息」，胡大使說的。可是，梁根案還有下文。今晚，他不懂通知總統批准借款消息，而且要求中國府保證：抗到底。胡陳二人快活得連酒都吃了，立即打電報報取得這個保證。保證自然是沒有問題的。借款是以抗戰到底為條件。說了洋外交秘密之後，胡適做結說：「這故事劃的留在我的腦子裏，同時也感謝着美國我們的偉大同情與援助。」好個疏財仗義圖私利的俠客呀！

強耕種而得的策仍被強力者收奪而去。這發來工業既大部停頓，海關鐵等收入既完全滅，可以說從黨政軍各機關到奸商高利貸者地主土豪地流截止，沒有個不是寄生在農民身上的。而成所有這些現象的關鍵乃國民黨的反動活。

國民黨的動統治不僅榨乾了農民，而且排擠掉那些單純的地主，即做土豪劣紳，當鄉保長，不勾結黨權和財軍地主。因為這種地主由田租收入還抵不肉地而支出的。中國農民實上已經變成一種變相的農奴，他們的生活可說連真農奴也不如。統治農奴的是個個的封建領主，而統治這新農奴的乃以國民黨為核心的，一個很複雜的集團。封建領主身份制把舊農奴束縛了土地上，而國民黨却發明了保制這個枷鎖。中國農民當被榨得實在不能活的時候，是連逃難的自由也沒有。國民黨政府雖沒有佈沒收農民和主的土地，但實質上比沒收土地而自命為封建領主還要害。正式宣布沒收土地而自命為領主，還不能現在這樣向農民無限的苛。如果苛求了農民還以一個「龍耕」對抗，如同佃農向地主辭佃一樣。現在國民黨不宜宣布沒收土地，為的是一方面要避兔土農的反抗一方面還可以此利用農民落後的私有心理驅他們更加緊出力勞作，好讓

經弄得較南的老百姓苦運天。去年抗戰勝利，中宣佈免賦一年，有出地的才幸可以鬆一口氣，接着又來了要命的消息。縣政府因為經費無着要地向地毒措，地方駐軍要採取軍糧。尤其是當去年初勝利的時候，所有皖南贛東的軍隊都經過南國宣城向蕪湖方面推進，宣城成了重要的兵，所以單獨攤購的軍糧一項就是每畝糙米斗，折稻約合九十斤。老百姓被逼得上吊投水者日有所聞，至於逃亡異鄉者更是不知多少。可是這樣的實我們的中央政府都裝作不道似的，以為免賦便宜了老百姓，今年又宣佈要分兩年補徵。其實，非正錢糧早已超過正式錢糧兩三平不補徵正式錢糧，老百姓已活，那裏還架得住你再來厚賜！

抗戰這幾年來，多人在慶幸老天爺替中國忙，沒有讓中國發生水旱天災想起來，中國這幾年滅然一點天災也沒有但是人造的災荒却超過了這半年的最嚴重的天災。據各報載去冬今春各省在饑餓中的人，恐怕超過民國初年北五省的大旱災與國二一年長江流域的大水災只湖南一省據說就有五百萬人要餓死。雨順調而有這樣的災荒，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政府的解釋是敵人進擾，使老百姓無法安穩。但據說所佔據的是「點」和「線」，既然是點和線，那麼老百姓就無法安穩。其實據害老百姓安穩的，與其說佔據點和線的敵人，寧可說點占據「面」的豺狼。中國災荒的真實原因是：（一）在不良的政治下，地大量的荒蕪，不但下等的田全部無人耕種，就連中上等田地有時也局部荒蕪。（二）上等田荒蕪的原多半由於地租太高，地主刻薄甚，堅不減租。（三）農民為着活，在極壞的情況下勉丁及其他種種關係不照平時一樣細耕，因而收穫普遍減低。（四）農民為着活，在極壞的情況下勉民黨更多榨取一點。我幹國農民生活不如農奴，一點沒有誇張，農奴雖沒有獨立人格，但是縱令被當作和牛馬一樣的「財產」，「主們也還要供給他們以一定的衣食，可是現在國民黨是決不會顧慮到農民的活的。

整個的農民（不管舊農或自耕農），和單純地的遭遇既是這樣，我以為一個革命的黨要解決農的土地問題是有路徑可尋。他可以爽快快宣布沒收一切土地歸國有，分配其使用權於一切能耕種的，而徵收較輕的田租就是了。並不要須顧慮地的反抗。單純的地主，在國民黨統治下，雖在形式上保留着土地所有權，而實際上早已不帶着實益，所以於土地國有是不會有什麼強烈抵抗的。至於那與反黨政軍當局或土豪流棍勾結的地主，雖不沒收他們土地，他們也勢必要壟斷反對革命，反正是革命的敵人，我們更應該堅決剷除他們的根基，不應請他們妥協。中國共產黨應該讓中國農村中這些具體條件來決定他們的土地權，應該大規模地舉起土地革命旗來。

本刊本期因秋節及其他關係，遲出九日。後統改為旬月十日及廿五日版。

中國革命悲劇(續)

第三章 新覺醒

當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中間，中國經濟開始改變時候，其他各種改變也很快地接踵而來了。新觀念，新思想，新要求，經過千百條孔道進入中國來，好像強有力的潮水一般衝擊着過時代的破船。在知識分子中間，一九一一年革命失敗所造成的失望和頹喪情緒已在消失而開始一種豐富的文藝復興，很迅速地吸引整輩代的青年人走上牠的軌道。一九一一年前後活動的知識分子羣中出現了陳獨秀，安徽省官僚家庭的子弟。陳獨秀比他以前任何人都更大胆，更勇敢，更明確，倡導反抗。他的周圍團結了一大群人，他們將跟他一起支配整輩代人底生活，以後又將分化為敵對營壘，在社會戰爭場地上各自率領大軍作戰。

陳獨秀宣告說：新青年底任務乃在於「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舊宗教，國粹和舊文學」。他提出「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來代替上述種種之位置。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他主編的有名的「新青年」雜誌上寫道：「我們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見「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新青年宣言」。譯者按此文係一九一九年所寫，並非一九一五年。)

陳獨秀又寫道：「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隣，而不為其國毒所傳染也。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精神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

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執為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執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置置於腦裏，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淨之日也。」(見「新青年」第一卷第一期「敬告青年」)

這種令人難忘的號召乃是中國新覺醒之先聲。有個大學生回憶道：此文發表，「好像一聲霹靂，將我們從漫長的迷夢中喚醒」。我們寄快信到北京去多買幾本。我不知道這雜誌第一號究竟重版了多少次，但我確知牠賣了二十萬本以上。」(見「F. C. Ware」著的「中國青年運動」一九二八年紐約出版，第一〇〇頁。)(譯者按，此言不確。「新青年」雜誌大銷行是在五四運動以後，第一卷第一號出版時幾乎是不受人注意的。)從此發生了偶像破壞運動，青年人勇敢起來，為建立一種新生活，一個新世界，而奮鬥。這個雜誌乃是後來幾次大運動底思想源泉，這些運動不久就震撼全中國，使幾百萬人從拜跪姿態站立起來了。新民族主義也是從此出發的，大戰以後各地被壓迫民衆底不安和騷動更加助長這個運動。

羣衆有了這種情緒，立即與日本帝國主義發生衝突，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大戰機會強迫中國接受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而且佔領山東省。美國總統威爾遜好說的諾言，允許各民族有自決權利，并能享受社會正義，遂給中國人一種希望，以為和會能夠滿足中國要求的。帝國主義馬販子在凡爾塞打破了這些幻想，於是青年人氣憤起來，反對北京親日政府底賣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生舉行了廣大的示威。那些賣國總長底住宅被學生搗毀了。運動從北京普遍於全中國。全國運動中參加了新因素，即工廠工人也實行罷工以支持學生要求了。

工業底發展造成了中國近代無產階級。一九一六年末，中國已有將近一百萬的產業工人，到一九二二年，這個數量增加了兩倍。二十萬華工被送到歐洲西戰線去，他們在那裏學會讀書，學會寫字，更重要的是與歐洲工人和歐洲較高的生活接觸。他們帶了新思想回國來，知道怎樣為較好的生活去鬥爭。他們看見了那些強大的民族糾纏於衝突裏面，回來後便決心要解放自己的民族。好多華工於山東問題爭鬧時，從歐洲船艙回來，路過日本埠頭拒絕登陸。當工人罷工擴大五四運動時候，這些回國華工已經被人視為「預告中國大工潮之海燕

了。在新興的中國產業工人之中，這個新從俄地回來的華一隊伍形成了有階級覺悟的堅固的核心，幫助幼稚的幾乎剛出世的中國無產階級去担負重大的歷史使命。工業無產階級領導了幾千萬交通勞動者，苦力，傭工，工匠，學徒，而開始組織起來。與舊式獨家或合夥經營讓位於股份公司同時，過去的行會組織也解體了，分化為商會和工會。中國工人剛接觸機器，便投入政治鬥爭。一九一九年上海及其他城市的罷工迫得北京政府釋放示威的學生和罷免火民心的官吏。

五月四日運動潮瀰漫於全國，引入於中國第二次革命。舊傳統壘壘崩塌之響聲震動了全國青年，使之覺醒。他們從城市和鄉村被吸引來，投入同一輩人底潮流，這一輩人是要操縱未來中國命運的，他們勇敢地打破權威枷鎖，大踏步前進推翻舊中國剩餘的論壇。舊式的行動和思想方法的惰性仍舊存在，在未來的革命和調整中仍舊現出強大而可怕的形象，然而壘壘之門已經打破了。再不能堅守了。新青年眼睛離開了凡爾塞而轉向俄羅斯，那裏十月革命給了他們一個榜樣，一種靈感，比其現實有更多的威力。隨着十月革命來到中國的，還有歐洲社會思想底各種潮流：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馬克思主義。這些潮流在中國開闢了新的眼界，激起了一個真正的思想追德文學革命，很迅速地加深了政治改革和社會衝突之孔道。所有社會階級都加入政治鬥爭舞台。舊的政治團體獲得了新鮮的生命，新的政治團體也產生出來。

當一九一九年這些政治新潮開始泛濫時，主持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國民黨是毫無力量的。其中右派分子，那些保守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了軍閥底依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較急進的一派領袖孫文，則繼續進行他的軍事革命計劃，即利用較小的軍閥去反對較大的軍閥。他創立了一種政治哲學，概括於他的三民主義裏面，其中既不以簡單明瞭見長，也不以其體面而大加處理中國革命社會問題是長。他的民主主義并未曾主張向帝國主義主人實行鬥爭。當他做第一任共和國總統時，他對於列強態度是很協調的，即允許列強列強用武力從前朝得來的特權和償付舊皇朝所欠的外債。（見 *Seibert, J.* 著的『廣州莫斯科協定對於孫文政治哲學的影響』，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論』雜誌，一九三四年四月至六月，第一一三頁。）大戰之後，孫文認為中國祇能寄託其希望於列強中間一種善意的合作。為此目的，他向各國政府提出一種天真的計劃，叫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為發展中國經濟資源而『誠意』合作。他確實有個幻想，以為外國強盜能够絕食慾，而參加一種人人有利的『社會主義計劃』。他寫道：『我希望，這個計劃實行結果，現在的勢力範圍就可以消滅，國際而戰就可

以免除，互相毀滅的資本主義競爭就可以停止。最後勞資間的階級鬥爭也就可

以避免。』

孫文底民族主義也含有將被壓迫的中國轉變為壓迫國內少數民族國家的意識。他計劃如何『同化』滿蒙回藏諸族在漢族統治的一個大國裏面。民族自決，同反帝國主義鬥爭一樣，都是後來才入於他的思想裏面的。

他的民權主義主要是為了一種『訓政時期』而製定的，在此時期中有知的領袖將漸漸指導那些無知而貧困的羣衆去學會自治。這種民權主義，與人民直接採取自治權利和自由的思想，是毫無共同點的。

他的民主主義代表了他的政治思想的問題。中國的組織未來形式之活生生的問題，以及關於土地和農民的極重要問題。他的『限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兩個公式經過了他自己和他的徒黨多次的修正和解釋。他希望經過『限制資本』（用甚麼方法去限制，他未曾明白說過）能使中國免於資本主義災害。『平均地權』則是一種計劃來調整農行不平等，但『須過去有財產的人不因此而受損失』。他的計劃是先同地主商定地價，以後地價增加之數都歸國家所有。國家有了購買力，就可以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造成較有利的條件。但他好久不敢太過公開傳播這個理論，爲了害怕得罪他的軍事盟友以及好多他自己的徒黨。他始終反對階級鬥爭思想，反對羣衆參加政治生活。他希望，他自己及其徒黨靠純粹軍事手段掌握政權之後，能够和平轉變中國社會。而不經過大的動亂。這就是他的無數次軍事同盟和軍事冒險之目的，這些事情每次都沒有好結果。

司是一九一九年以後新的政治傾向和羣衆運動之興起，給孫文底沒落的黨增加了力量；國民黨又活動起來。孫文開始向學生會演講說。當陳炯明允許他在廣州設立一個政府時候，他就與廣州和香港新成立的工會聯絡。

此時，無產階級政治團體也開始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雜誌開始出現於大中學，給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開啓了思想和行動底新前途，以後又給工人階級本身開啓這個前途。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形成的集團發展爲社會主義組織，由此再進一步亂於一九二〇年成立中國共產黨了。黨底創立者都是五四運動底領導人物，其中主要是陳獨秀，那時在北京人學當教授。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開第一次全國大會時，代表成分是很複雜的。無產階級出身的，很少。多數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爲新覺醒所激發的。他們未曾經過訓練，未曾經過考驗，就合成一個團體；事變發展不久就使這團體分化了。比其中大多數人所期待的更早些，階級鬥爭以其強烈的日光照射了每一個人，如此強烈，使他們

而四顧無所適從了。不少的人，爲了感情，或爲了無政府主義傾向，很快就起而擁護他，這階級就益趨去。有些人則消極而退出政治舞台。其他的人如令人聞之而寒心者，則爭相犧牲生命。其餘的領袖中，如陳獨秀、王澤東、張國森等，則其命運交織於後來的中國歷史中，此歷史是從一九二一年這個夏天他們致力於共產主義事業時候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月餘熱之中產生的，在此次會議上他提出了爲中國工人階級製造組織武器之任務。這個工作已經開始於北京郊外的長辛店了，那裏鐵路工人已經成立了一個工會，共產主義傾向的大學生也已開辦幾個夜校了。一個「勞動組合書記部」設立於上海。進行是很遲緩的，開始是沒有甚麼成績的，問題是廣泛而困難的。因爲歷史把成人担负的任務加於尚在孩童狀態的階級肩上了。

共產黨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乃是牠以無產階級黨資格，對於資產階級國民黨，應有甚麼關係的問題。共產黨參加國民運動的形式和方法，對於未來事業全過程有決定的意義。這種參加是出於國民革命運動之無可否認的進步性。我們已經說過，列甫曾於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席上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平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是可以同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合流的。與國民運動相合作，是可以的，必需的，但有一個極重要的保留條件，即無產階級組織，「即使尚在其胚胎狀態」，也必需保持獨立。

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討論共產黨和國民黨同盟計劃。當共產主義青年國際一個代表，俄國人達林，將這個計劃向孫文提出時，孫文拒絕了。他告訴達林道，他可以容許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不贊成兩黨同盟。不久之後，馬林在杭州西湖參加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提議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利用國民黨廣大的寬鬆的組織機構來發展自己的宣傳并接近羣衆。馬林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第一個代表，他已經在南方與孫文接觸過的。

馬林底提議根據下面三個理由。第一，馬林是根據他自己已在爪哇工作的經驗。戰前，爪哇社會民主黨左派加入了「Socialistische Vereniging」——這是一種混合經濟社會宗教的運動，爲了反對歐洲殖民者對於爪哇人的剝削。其中左派會接受「印度社會民主聯盟」之援助，這聯盟就是馬林幫助組織的。牠在「Indische Arbeiderspartij」內部開始發展工會組織思想，大戰幾年中左傾運動之增長是出於牠的功績。第二，馬林是根據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戰略和策略的結論，他認爲這些結論特別適用，因爲——這是他根據的三個理由——國民黨和南方日益增長的工人運動之間早已有了關係，那裏，在孫文影響底下，工會已經參加國民運動了，而且找到了最豐饒的地盤來發展共產主義活動。

據馬林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大多數贊成他這些見解。反對他的提議的人，不過懷疑國民黨沒有大的政治力量，懷疑國民黨能發展爲一種緊要運動。馬林把陳獨秀列入於贊成他的提議的人中。全體中國中央委員都反對馬林底見解。陳獨秀把這反對說做有根本的政治性質，認爲反對的人都相信加入國民黨，將混亂了階級組織，將拘束了我們的獨立政策。（見陳獨秀「告全體同志書」，上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但我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那幾年間中國共產黨領袖曾反對與資產階級合作。反之，這種合作思想完全支配了他們。陳獨秀在一九二二年寫道：「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乃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必須經過的追路。」（見「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對加入國民黨的，無論是全體領袖或幾個領袖，似乎更多根據國民黨業已死亡爲理由。據馬林的，無杭州會議中反對加入國民黨最有力的張國森，就是表示這的意見。但最後，馬林底提議通過了，雖然人們還在懷疑國民黨領袖是否歡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創立人中有嚴季陶，他幾個月後受了孫文嚴厲的斥責就離開共產黨了，後來成爲國民黨內主要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他早期離開共產黨的人中，有陳公博、周佛海、邵力子，這些人後來都是國民黨政權下的要人。（原註）

*這是一九二五年間著者在荷蘭倫德斯德丹訪問馬林時，親自聽馬林說的。（原註）

**據陳獨秀說，馬林最後拿出共產國際紀律來，這提議才被通過了的。但馬林否認這話。他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儘有可能向共產國際高機關去控告他，但並沒有人上控。他又說：「此外，共產國際并未給我特別的訓令，我手裏也沒有任何文件。」共產國際未公布的和不讓人看的文件中無疑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米夫說，第一個正式訓令，關於「調整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活動」的，包含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底一個特別通告之中。此時共產黨黨員已經加入國民黨了，雖然正式的決議通過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上。（見米夫著的「英勇的中國」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第二一二—二二頁。）

新旗

第九期

半月刊 實售價幣三百元

我們要的國民大會

是甚麼？——舒嚴

國民大會開會日期到了，國民黨表示決不再延期，在野的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則表示不願參加這個國民大會，因為召集命令違反了政協決議，而內戰槍聲至今尚未停止。國民黨是否能因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底反對而改變牠的決心呢？即數日之內是否能頒佈命令又加一次展延會期呢？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說的是：我們不僅反對十一月十二日召開的那種國民大會。即使內戰停止了，即使國民黨政府依照政協決議召集了，即使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參加了，——這種國民大會，我們也是反對的。因為這種國民大會仍然是十年前國民黨一手包辦的舊代表和現在各黨派協商分配和指定的新代表所組成的。如此產生的代表都非中國民衆自由選出的，都不能代表中國民衆利益。

我們要求停止召集這種國民大會。我們要求重新制定國民大會選舉法，依照普選，直接，無記名原則，讓民衆自由選舉代表，成立一個全權的國民大會，或制憲會議。

制憲會議應制定一部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過去的憲法草案，無論是以前原文或後來修正文，都應拋棄，而推選委員會重新起草。憲法制定之後應提付全國國民投票表決可否，經過了全民投票通過以後，才能成為正式憲法。

制憲會議底任務不僅以制定憲法為限。一經宣布開會，制憲會議就應擁有國家最高權，不僅擁有立法權，而且擁有行政權和司法權。制憲會議應從國民黨區域政府和共產黨區域政府接受一切權力，

成立一個臨時的統一政府，對制憲會議負完全責任。臨時政府國防部應統一指揮全國所有正規軍以及輔助的武力。

未來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完全由制憲會議決定，決定以前，即正式憲法頒布以前，一切都保有臨時的性質。

總之，我們所要的國民大會，乃是法國大革命時的「國約會議」(Convention Nationale)，自有歷史以來最民主的最有權力的國民大會。我們所要的，并非烏托邦，而是歷史上曾經實現的，現在又有實現可能的一種制度。

現在有實現可能麼？現在中國還能實行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最典型的制度麼？

全然可能的，但非必然的。一切視我們為之努力的程度而定。首先，我們努力爭取最民主的選舉法；其次，我們努力保障合法的選舉；其次，我

第九期目錄

我們要的國民大會是甚麼？	舒嚴
我們看華萊士事件	劉默
再論內戰擴大以後	振聲
工會人員的安全問題	蕭振華
收回港九問題	三德
新民主主義和舊民主主義	穆德
美國社會主義黨對中國內戰的態度	穆德
歐洲革命之第一階段(一)……Enrich Germain	守敬
評胡繩論發展生產力(讀者論壇)	穆德
再論中國共產黨底革命觀	穆德
青年人的兩大問題(讀者通信)	朱履石
中國革命悲劇(續)……Harold R. Isaacs	覺新
電話公司怠工事件(工廠通信)	覺新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們努力選舉最能代表廣大民衆利益的代表；其次，我們努力提出最符合廣大民衆利益的綱領；其次，我們努力……，但這一切努力能否成功，全視廣大民衆，尤其負領導責任的工人階級，是否崛起，是否以議會外的民衆力量去支持議會內的代表爲定。廣大民衆崛起，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爲自己利益而鬥爭，不僅可以實現資產階級革命中最革命的議會制度，而且能使這個制度爲無產階級革命服務了。

我們看華萊士事件 劉默

華萊士事件構成了九月中旬國際政治消息的主題，事情很新鮮，毋須我們在此地覆述。這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尤其在中國，更尤其在中國民主派人士及其刊物上，引起了甚大的注意與興趣。這是當然的，因爲華萊士正是美國式的民主派，他反對獨占的「官僚資本」，他主張持久的和平，他主張與蘇聯妥協，希望有各黨派參加的中國的政府出現……

人們慣常指出：華萊士是代表美國中小規模的自由企業家的利益與見解的。這話不無根據。美國的中小企業家確實是受着嚴重壓迫的，他們確實反對獨占資本，進而反對他在國內國外的政策。但是我們知道，傳統的美國的自由企業家們，首先在經濟上，跟着在政治上，愈來愈失去其比重與地位了。尤其是經過了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企業家」竟可以說是一蹶不振了。根據「較小戰時工廠聯合會」向美國「參院小企業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第二次大戰期間的經濟集中」一書所載，經了這次戰爭之後，美國的全部經濟命脈，是由五大財團控制了，牠們間接直接所屬的二百五十個

大公司，擁有了全美今日所有的三分之二的生產資料。至於小規模的經售商與製造商而行，則有五十萬家在這戰爭期間被完全消滅了。

獨占資本如此地得了戰爭之賜，真已到達了凌駕一切的地步，今日美國是由牠操縱着政治，壟斷着經濟，指揮着輿論，總之，是牠掌握着美國的全個命運。

在這次戰爭之前，美國的獨占資本就已達到了這個地步，非以全世界爲其市場不足以繼續其存在了。如今，戰爭使美國的工業生產又增加了一倍，那就更非使天下爲美國的一家一個政策，這是美國目前世界戰爭的由來。但要貫徹這個政策，就得積極地準備戰爭，甚至從事戰爭，而戰爭却首先要使勞動者與中等階級的人士受災。這些人，剛才從長期的戰爭壓迫中出來，那是不願意立即又被拉入這個可怕的災難中去的。所以他們反對獨占資本的政策；但直到現在，美國的工人階級還沒有一個強大與獨立的力量，不能將平民大眾的反對聲浪，組織成一個獨立的黨，去和獨占資本的政策對抗。於是資產階級內部某些較有遠見與比較敏感的政治家，便出來「代表」大眾的利益了，以便取得他們的擁護，他們的同情，藉以緩和和工人階級與廣大資產階級對獨占資本的敵視，防止他們獨立組織的出現，使這些不滿仍舊導納到獨占資本的政治軌轍中去。

對於華萊士，伊克斯，毛根索等人的「民主表示」，應該首先作如是觀。

因此，我們覺得，美國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中國的老百姓，或蘇聯的工人們，都不應該誠心誠意相信華萊士等所代表的是一個完全和美國現行政策，即和獨占資本的政策相反的路線，是「民主的」「和平的」，或什麼「羅斯福的」。我們要記得

，美國的獨占資本是在羅斯福的長期統治之下特別發達起來的，美國的戰爭是羅斯福領導的，美國的對蘇與對華政策，也是羅斯福所規定的！華萊士之反對獨占資本，也祇能和羅斯福的反對托辣斯一樣；以反對之名行保育之實。

如果華萊士這次以左傾姿態，獲得了美國工人與小資產階級的支持，贏取了今年冬季的議會選舉，且能當選爲一九四八年的美國總統，那末美國的政策在本質上決不會改變。未來的華萊士和今日的杜魯門一樣，也祇能執行由華爾街交來的政策吧。再說想得太胆一點，如果華萊士退出來的政策，會同了美國現成的幾個大的改良主義工會組織起美國式的工黨來，那末，華萊士做了美國的麥唐納或阿德里，即使掌握了政權，也祇能和目前的英國工黨一樣，忠實地執行着華爾街那些「陛下們」的聖諭。

因此，如果不是美國工人階級在一個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的領導之下，實行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從根剷了獨占資本的勢力，則美國的國內外政策決不會有根本改變，換句話說，一定要走向新的更慘酷的世界大戰的。這政策由貝爾納斯或華萊士來執行，不過是步驟與策略上容有不同吧了。

蘇聯的報章與廣播，這次對華萊士事件沒有表示多大的興趣，倒是對的。

中國的民主派，尤其是中國進步的工人，也不該對華萊士及其一派存着希望。美國統治階級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改變華爾街獨占資本所定下的政策的。在今日美國內部的各個力量中，祇有美國強大的工人階級，當他們政治上覺醒，組織上獨立，進行社會革命，建立工農政府之後，才能給中國以真正幫助的。在這以前，也祇有這個階級的獨立行動，才能阻止美帝國主義的干涉中國，進攻蘇聯。

我們能對愛國的工人階級作些，我們也就能作些。根據於愛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取捨於產業工人與農民階級之間，結果也會如俄國於馬歇爾與赫爾利之間一樣的。

再論內戰擴大以後 續聲

本刊第七期上，我們談過這個問題，那次主要是對中共而說的。我們認為中共所代表的那個農民的武裝力量，如果思想越趨統治者所加於他身上的壓迫，想在內戰中勝利，中共領導者必須拋棄一切幻想的或妥協的政策與立場，必須站在正確的土壤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政綱上，為全權普遍的國民大會而鬥爭。

經歷如此深重的機會主義墮落的中共領導者是否推這種做，我們是懷疑的；不過即使退一步，假定他們能這樣做，但事情也還祇做了一半，因為更重要的一半，需要廣大城市中的民衆——尤其是其中的工人階級來完成的。我們現在就要談到這一半。

現在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人都反對內戰，但是內戰像天災，像瘟疫，像死亡一樣，終於達反着我們的意志而來了。來了怎麼辦呢？一向來高叫反內戰的聲音却聽不見了。這裏自然是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壓迫，他用特務的魔手緊緊縛住了人們的手，扼住了人們的咽喉。但顯然也不能把全部責任放在特務壓迫上，反內戰人士本身的軟弱與妥協，却要負大半責任的。

我們拿上海來做例。

上海的反內戰和平的運動，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大暴亂中達到了很高表現。這次運動，我們知道是由五十三個團體發動的，其中包含着學生團體，

產業工會，職業公會以及自由職業者的社團。當時被南京戲劇式的政治談判所刺激，人民反內戰和平的迫切要求，就匯合成這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我們當時就竭力指出這次運動的大意義，同時我們更指出，為使這運動不致如蒸氣似地飛散，我們主張由參加運動的羣衆團體，依照人數比例，推選代表，組織一個超黨派的，統一的，集中而民主的機關，由牠來領導一切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

來說要通緝他。這當然不過是空氣吧了，嚇一下而已。林先生應該挺身而出，向社會聲明真相，準備接受特務的挑釁，如果這樣幹，特務就會退却，甚至會出來解稱「誤會」的，萬一他們不顧一切，竟敢將林漢達先生誣華，或判處數月徒刑，那末這結果將不是鎮壓反動運動，反而會激起更大的民主怒潮來的。可惜，我們的林漢達先生不會這樣鬥爭，他躲起來了。

我們這呼聲，可惜在佔據領導地位的民主派中沒有得到響應。

不錯，上海目前有一個「人民團體聯合會」，但這與我們所要求的組織不同。目前這個聯合會是一個鬆散的，僅限於少數上層份子聯合的團體，牠不是直接由羣衆選舉的，不能獲得廣大羣衆的信仰，因之不能具有戰鬥性。因為要使一個組織具有力量，牠必須是直接由羣衆中來，對羣衆負責，在羣衆眼中活動的。目前那個聯合會自然根本談不到這樣的性格。

下關被打的代表們，當時便聲明不願追究，結果，靜悄悄地回來了，打手們都殺了刑，沒有事；指使打手的大人們更是沒有事；可是該選代表的糾察却被判了罪，無辜地在獄中受難。羣衆懷疑我們的示威有什麼力量，他們再不會在這些代表們的號召之下起來了。

昆明的暗殺確曾激起了廣大羣衆的憤慨，人們都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來表示一下自己的反抗，但是直至現在（九月二十日），連一個追悼會都還不會開，要求公開審判兇手的運動不再繼續，昆明飛來的教授們都不敢開口了。

從六二三的運動中沒有產生出一個羣衆性的戰鬥組織來，這是近幾時上海反內戰運動消沉的一大原因。因為沒有這樣的組織，又因為現有的「聯合會」是上層階級而鬆散的無力，所以代表們的「聯合會」，特務們一對敵對的負責人來了一個恫嚇，有些先生們便急急忙忙後退了，捲起來了。反動派完成了各個擊破的戰略。

上海大的工會，自從七月以來，就遭受着各方面的壓迫，勞協也受了打擊。在這打擊之下，領袖們很多屈服了，非但不領導工友們從事反攻，却拚命叫工人「識相」，竭力阻止鬥爭。

其次，民主派領袖們的妥協與阻行爲，使羣衆失了望。舉個例子，就像林漢達先生，他在學生羣衆中是有很大影響的，反動派注意了他，給他加上了「馬路政客」的帽子，準備給他以打擊。六二三示威中，林先生被舉為主席團之一，在羣衆抓到了特務分子，預備打他們的時候，林先生出來勸解，可是事後，反動黨却認錯他指揮打人，放出空氣

民主派的領袖們似乎都只能「看風頭」的。把民主鬥爭的全部希望寄託在國民黨的「護步」，馬歇爾的「壓力」，共產黨的鬥爭之上。一到國民黨決不讓步，馬歇爾支持內戰，共產黨武力見抽的時候，他們便都一個個退避書齋或辦公室了。這是大地不對的。

首先該相信自己的力量呀！

大城市中民衆的政治鬥爭是具有決定力量的。不要讓國民黨，馬歇爾或共產黨的態度來決定我們

的離度，却要用我們的鬥爭來決定前二者者的離度。真正反對內戰與爭取和平的城市民衆，絕對不該以內戰之業已擴大而消極，而失望。應該以內戰之擴大而加緊我們的努力。第一步，必須加強我們的組織，要產生出民主選舉的直接代表演大政策——尤其是勞工大衆的組織，要用直接行動，例如罷工，罷課，罷市，以及示威遊行的方法，來發揮我們的力量，表示我們對內戰的抗議。

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喚起美國反戰事業的注意，獲得他們的援助。祇有這樣，我們才能使國民黨中的好戰者有所顧忌，使軍隊中的厭戰士兵積極地起來反對；祇有這樣，才能使共產黨平準的農民武力不能致被消滅，且能在城市工人階級及其正確政黨的領導之下，真正完成中國的民主改造。

民主派的領袖們如果能領導我們這樣幹，好的，我們一起前進；如果他們始終保持着妥協與胆怯的態度，那末丟開他們，讓我們下層羣衆自己來。

九月二十日

工會人員的安全問題

蕭振華

統治階級的眼睛真亮，而且也真有經驗，爲要壓迫上海剛抬起來的民衆運動，他們把頭一顆子彈射向我們工人的工會。工會到處被改組，比較敢替我們工人利益說幾句話在工會裏辦事情的工友，時常被人家捉去。最有名的，就像電話公司的二位工友，鋼鐵廠方面的三位職工，百貨業工會的副理事長，其他還有許多不出名的工會人員被無緣無故捉去關起來。捉了去關在監獄裏，並不送法院審問，一關幾個月，全不講什麼法律。弄到正派的工友都不敢出來過問工會事情了，有些工友還担着工

會職司的，也不敢作什麼主張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都動支友忍耐，等等風頭再說。他們開始反攻，很多廠家提出減工資，裁人，不把工會放在心上。工人偷直不能講話，一有話，帽子套在頭上，『護工隊』把你弄了去。幾個月來，物價漲了又漲，可是我們的工錢非但沒有加，而且減了。照理說，工錢跟着生活指數，物價漲了工錢也跟着漲，可是天曉得，四個月之前我們還過得去，有幾個工友連個人的吃用都不够了。這我來說吧，我的底薪是一元一角錢一天，四個月前，乘了下了生活指數（多少我弄不清）我拿到十四萬多些，日子很好過；這個月，工錢算出來，十五萬光景，我却過不下去了。什麼道理呢？上次請教了人，他告訴我，生活指數靠不準，據說這是市政府關了門自說自話翻出來的，還聽說管這門事情的一個專家因爲良心過不去而辭職了。

難怪，市政府跟資本家唱雙簧，一個暗造生活指數，一個減低底薪，再來個特務先生亂捉工會負責人，我們工人倒霉了。可是，前兩天，看見報紙上登載英國頑老爺又在參議會上說：『上海工人拿的工錢比美國工人拿的多』，這真不知仁愛忠信的『信』字，禮義廉恥的『恥』字是怎樣講的？

總之，我們工人現在又被打得不起頭來了，一年來的鬥爭結果，快給人搶光了，我們又將陷入敵偽時代的痛苦中了，甚至更痛苦都不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立刻覺醒轉來，睜開眼睛，不要馬馬虎虎。要爲我們的生活改善而鬥爭，這個鬥爭中的第一步，就是要大家團結起來，作工會人員，或工人代表的後盾，要用我們全體的力量來保證他們的安全。今天起，就應該發起一個運動，把目前全上

海關在牢監裏的工會同志救出來；以後，再碰到同樣情形，一定要用『全體進牢監』，示威遊行，甚至不惜用罷工手段來反對拘捕工人。工會人員的安全有保證，工會的事情辦起來才有勁，我們的鬥爭才有辦法，我們的生活才能改善，否則，一切都談不上的。

收回港九問題

三勇

最近因爲香港政府的發言人否認九龍城內仍爲中國領土，引起了好些人的抗議。見之於報章的，有大公報的社評，外交部司長的談話，……而更鄭重的，則是上海參議會會正式決議，『請政府積極進行收回香港九龍澳門』，而且還要『收回蒙蔽的失土』。

這事情有點叫人想起今年春天的『白爾丁事件』。正當人民對政府爭取民主的時候，忽然有人出來提醒大家：法國人不願治外法權的取消，竟私將人犯搬走了，於是遊行，於是抗議，於是人心激昂。

我們並非不看重中國的法權，當然我們更看重中國的領土，但是，正當中國的整個主權在送人，全部領土在請人佔領的時候，特別指出另一較小強人的蠻橫與侵犯來轉移人們的眼光，我們覺得是不當的。捉住查爾放過老虎的辦法，縱然不是陰謀，也至少是糊塗。

但我們却不相信我們的當局會糊塗的。『勝利』一年了，不平等條約的『取消』有好幾年了，但是，海關還在查手手中（只是英人換了美人），內河還有外輪行駛，而且，空中是美國的飛機，街上是美國的大兵，滿地是美國的車輛，滿市是美國的貨物，最高『主席』有馬歇爾元帥，各

部各機關有美國顧問，殺人用的是美國槍炮，「護路」的是美國軍隊，搜捕有美國的憲兵，審問有美國的法庭，但是，我們祇聽見大人先生的歌功頌德，沒看見他們的一點抗議，半分批評。這裏對他們是無關乎主權與領土的了！

在此情形中談收回港九，我們只能覺得無聊，甚至可恥。大公報的主筆先生從這個「港九收回運動」中看出了「民族主義」，倒是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今天中國統治者的民族主義的面貌。

其實，即使「港九」也只是陪襯吧了，一位姓莊的參議員主張「出兵」去收回蒙古失土，倒是十分真實的；因為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祇有恰好充當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先鋒角色的時候，才是真實的呀。

新民主主義和舊民主主義

穆 德

周恩來近日來上海向聯合社訪員發表談話，其中有幾句說：「此項和平（按指停戰及成立聯合政府）之唯一結果，即使中國實現美國式或林肯式的民主政治。」

胡繩幾個月前在「論發展生產力」文中說：「成立聯合政府，其任務歸根到底就在於：（一）解放農民，……（二）發展自由資本主義。……」可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新民主主義政治并非歐美式的舊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亦非歐美式的資本主義。

我在本刊第五期「革命問題漫談」中曾預告將說明毛澤東所謂新民主主義，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也就是舊民主主義。這一預告至今尚未踐行。好了，現在無庸我多說明了。周恩來已經承認新民主

義就是美國式的或林肯式的舊民主主義，而胡繩也已經承認新民主主義就是自由資本主義了。由此可見，要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選擇一條中間道路，總是徒勞無功的。凡理論上排拒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暫時的排拒，即使是拿來放置在最高黨綱裏面，都必然在實踐上站在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方面。

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對中國內戰的態度

鶯

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美國工人階級中一個最革命的政黨，是美國一些站在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立場上的革命家組織，也就是美國的托洛次基派；這個黨，對於美國民主主義干涉中國內戰，有一個極正確的態度。在牠的機關報「戰士」上，不斷有文章揭發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同時反對國民黨鎮壓革命民衆的行爲。下面譯的是六月二十九日該報的一篇社評，由此可見美國托派對我們內戰的態度：

「據合衆社稱，六月廿三日，上海有十萬人的大示威，反對美國的干涉中國，示威者高持標語，上書「美國軍隊，請回到你們的可愛之家去！」「打倒金元外交！」「美國人，不要參加中國的內戰！」等等。講演者以英語和中國語大聲地呼喊，要求美國的海陸空軍立刻從中國撤退。」

「從這示威中，使人再度注意到華商街征服中國的計劃。戰勝日本之後，美國非但不撤兵，且更深入地將軍隊推進這個混亂的國家去。這些軍隊成爲蔣介石政制的支柱。」

「除了美國的軍隊外，華盛頓又送轟炸機給蔣介石，美國的運輸艦運送蔣介石的兵到東北去，而

不把美國的自己的兵運送回來。那些被美國的運輸艦運上東北的蔣系軍隊都是美式配備的。并且美國的軍官在蔣介石的參謀部工作，改編中國軍隊以適應近代機械化的戰爭機構。華爾街最後希望利用那些軍隊作第三次大戰的幫兇。」

「華盛頓之干涉中國是違反了中國人的意志，最近的示威是以後連續不斷的示威運動的開端。中國人希望從蔣介石獨裁中解放出來。他們需要和平。他們要求機會可以把中國從目前的悲慘，飢餓，流血中得救。」

「華盛頓之干涉也是違反美國人民的意志，違反海外的兵士和他們家屬的回國要求。關於撤兵問題，人們對國會施了這樣大的壓力，所以政府長官們一再地給國家議會。甚至確定的撤兵日期都定出來了，但每一個諾言都沒有遵守。」

「假使華爾街一意孤行，那麼中國的前途非但不是「免除威脅的自由」，大西洋憲章上一切規定的自由都將被撕毀了。唯一的前途是呻吟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鐵蹄下。」

「美國的勞工運動必須對國會加重壓力。將我們的手伸過大洋去！和上海的示威者聯合起來！撤退在外國領土上的美國軍隊！」

本刊第八期 正誤

4 頁下欄十六行「新民主主義論」應改「新民主主義論」

6 頁上欄十二行「二五減租」應改「二五繳租」

全頁全欄十三行「一百九十五斤」應改「一百三十斤」

全頁全欄十四行「二百十斤」應改「二百四十斤」

全頁全欄十五行「二百二十五斤」應改「一百五十斤」

全世界拆組織，大戰中相互間雖然失了聯繫，但製定的一種路線畢竟謀而合的，即是預備着：將有世界的革命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昂貴的產物。這個路是建立在若干理由之上的，這些理由又是從那腐朽的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社會、心理各方面發展之在法則推演出來的。這些理由也構成了第四國際綱領基本項目，又為第四國際所以存在的原因。拿黨發生的事變來論這些理由，遂成為整個運之重要任務了。

戰了為甚麼非在革命暴動中結束不可呢？

我們的推測可以概括如下：帝國主義戰時變遷下去將加劇資本主義制度一切矛盾。黨生活將一天比一天更加因乏無產階級革命潛力亦將一天比一天更加活躍。以後，在許多的國家，戰爭將對或破壞國家機構，使勞動階級能够把階級鬥爭推展至其最前進的階段，即權政制階段。帝國主義的均勢全打破之後，所有這些因素配合起來，就能成良好的條件以擴大革命鬥爭於歐洲範圍，以至世界範圍了。

應用於歐洲的具體條件，用具體的話說來，一個推測就是說：舊大膽的羣衆將一天比一天更加不能負擔戰爭重壓。羣衆底鬥爭意志，會於一九三二—四〇年間降落到最低的水平，以後就要開始上昇，而且愈愈迅速地表現出來了。

在德國軍佔領區中，歐洲各國舊的國機構一個個可恥地崩潰了。其餘剩的部分，實證明了，再不能抑制羣衆底運動了。納粹軍事機構和警察機構固然造成了鎮制止歐洲無產階級底革命暴動。可是到了納粹機構削弱和崩潰之時，革命暴動就要接二連三起來了。最後，德國革命底爆發將結合各國底運動，使之成為歐洲的規模，使之互相協同，且給予革命過程中產生的雙權制機關以可能鞏固其力量，在長久時期內去抗英美帝國主義底壓力。這時期又將特別利於第四國際各國支部迅速發展的。

歐洲革命之第一階段 (上) Ernst Germain

所以第四國際推測和實際發生的羣衆革命行動之間，所不符合的僅僅在於規模較小，沒有同時發生，又缺少協調而已。我們已經看見了歐洲範圍的革命，但進行得沒有我們預料的那麼快，又比我預料的更少規矩些。最重要的是沒有德國革命發生，因此我們的中心預言二似乎沒有應驗了。

第一階段下雙權政制

雙權政制在意大利詢其最完成的形跡。一九四三七月間，意大利開始革命時，好多地方成立了工人代表會，米蘭甚至成立了個工兵代表會。以後，各工廠成立了「內部委員會」，而全國城市和鄉村又無量數的「國民解放委員會」產生。在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天，意大利遊擊隊大規模武裝起來。最後，一九四五年四月末發生了一次真正的暴動，結果意大利北部所有工廠都給工人委員會佔領了社會生活完全受遊擊隊統制，命法庭組織起來，所有政治職能都歸「國民解放委員會」行使。(參看倫敦「經濟學家」雜誌，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英界產階級的「泰晤士報」通信比某些幻滅了的左派更瞭解這些事變底性質也稱之為「社會革命」。

這推測合於事實麼？

試簡略檢一下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以來所發生的事變，我們就可看出面的推測有那部分是經過事變證實了的，有那部分是顯然不合事實的，沒有人能否認由於可怕的戰爭底消耗和破壞歐洲經濟業已完全枯乾了。

爭停止之後一年，歐洲工業生產不及戰前生產之半數。也沒有人能否認，戰爭強加於羣衆的不可忍的生活條件畢竟復活了羣衆底鬥爭潛力。試研究一下罷工鬥爭底次數，我們見，一九三九年時，各國罷工很少，那些已受法西斯統治的國家，常常終年有一次罷工，可是到一九四三年初，歐洲一切國家忽然都罷工起來了。同戰時期比較，此次罷工潮發展很快，到了一九四五年，除法國以外，各國都過了上次一九三六年罷工潮原平。(此外，此次罷工潮，就世界範圍說，是在向上漲的，同整個革命運，但這方面姑置不說。)

當納粹佔領期間，甚大保機構尚在威風凜凜時已經有好多大羣衆行動發生了。其中含有希和意大利的四次總罷工，法俄對徵工運動，遊擊隊佔據南斯拉夫，以及比時國內幾次大罷工和里埃埃治成立工廠委員會等等。所有這些，與一九三二—四〇年時無產階級普遍消滅了顯明的對照；同時，又證明了這些乃是革命運動，并非第一次大戰後幾個月發生的連串經濟罷工性質，後面我們就說到，在好多國家，這些事變果都造成雙權政制機構或其胚胎形式。

所以第四國際推測和實際發生的羣衆革命行動之間，所不符合的僅僅在於規模較小，沒有同時發生，又缺少協調而已。我們已經看見了歐洲範圍的革命，但進行得沒有我們預料的那麼快，又比我預料的更少規矩些。最重要的是沒有德國革命發生，因此我們的中心預言二似乎沒有應驗了。

雙權政制在意大利詢其最完成的形跡。一九四三七月間，意大利開始革命時，好多地方成立了工人代表會，米蘭甚至成立了個工兵代表會。以後，各工廠成立了「內部委員會」，而全國城市和鄉村又無量數的「國民解放委員會」產生。在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天，意大利遊擊隊大規模武裝起來。最後，一九四五年四月末發生了一次真正的暴動，結果意大利北部所有工廠都給工人委員會佔領了社會生活完全受遊擊隊統制，命法庭組織起來，所有政治職能都歸「國民解放委員會」行使。(參看倫敦「經濟學家」雜誌，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英界產階級的「泰晤士報」通信比某些幻滅了的左派更瞭解這些事變底性質也稱之為「社會革命」。

在捷克，九四五年五月革命中也發生同樣事情。那裏「雙權政制」有四種重要原素：一、工人代表會管理工廠；二、工人自衛軍；三、解放委員會為具有最高權政治機關；四、人民法庭。個資產階級記者（倫敦「經濟家」記者）把這局勢寫得很生動，他又添加個正確的觀察，說：「中央政府事實上毫無能力，工人自動沒收一切工廠。」

在法國西巴黎暴動把羣衆多多武裝起來，好多工廠被工人所佔領，其多數成立了工委員會。同樣現象也發生於芳濟城，如里昂、里莫治、都斯、佩萊爾；這些地方有一特點，即那些雙權政制機關，雖在萌芽形式，卻繼續行使職權幾個月長久。

在希臘，「治上受 EAM 領導的遊擊運動」，未「解放」前就已統制着很大的地區了。「雙權政制」這裏表現得最清楚。「正式的」希臘政府設在開，有其軍事權，有其行政權和司法權；但希臘本國，則羣衆選舉的委員、自衛軍、人法庭，施行職權。當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公開的國內戰爭時，一些平行的即資產階級的機關，在雅典城內外區域以及「開」管轄下好多地，都被取消了所有的權力（尤其司法權力落入於民選的機關手中。

在南斯拉，遊擊運動一開始就帶着革命性質；這裏，各種權力也移轉於民選機關之手。但後來，這些權力變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所支配。我們沒有充的材料，不能決定此後羣衆自發的創意力能發生甚麼作用。

在波蘭，「軍迫近時，工農羣衆中發生二種革命運動，工人佔據工廠農民生取土地」此外，工人又完全管理了生產。

最後，在利時，「雙權政制」，認真說，存在於軍事方面，結果發生了九四四年十一月事變。但里埃治城工廠委員代表了「解放」翌日之事實的權機關，而一四五年五月間羣衆自動建「比好」也表示了羣衆在那些範圍內的獨立行動；在平時條件之下，這些範圍的事務本應歸資產階級國家關處理的。

雙權政制果真存在麼？

歐洲第一革命潮底無產階級性，在嚴重受人否認。人們首先否認代革命的機關是真正的雙權政制機關。「國際」中極右派和極左派都把那些新政治組織看做機構，即資產階級國家機構之新的形式。有些人甚至走得極遠，把羣衆爭過程中自發的軍事組織看做帝國主義軍隊一樣。又有些，則分析事變不過是一種藉口來攻擊史大姆魔手和「俄羅斯帝國主義

他們在那些羣衆革命爭中祇曉得去尋覓「替俄羅斯帝國主義服務的史士林式組織陰謀」，以別於替英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史士林式組織陰謀」。

納粹佔領期間羣衆爭中創立的政權機關，人們認牠具有革命性和無產階級性，人們所根據的由，概括起來約有如下諸點：

一、那些「委員會」，就其種種形式說，都不是臆的機關，而是依照各黨派強弱為比例成立起的。

二、這些「委員會」包含好多小資產階級分子，甚至資產階級分子。

三、這些「委員會」和「自衛軍」是受帝國主義或蘇維埃官僚金錢津貼的，或同時受兩方面津貼。

這三點論據是我們熱聞的。當西班牙革命時，極左派也曾使用這些論據來否認西班牙事變之內性質，而僅僅視為「帝國主義爭底一個準備階段」。但這些論據，至少一二兩點，也會為「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西班牙一個中間黨）所使用，來制托洛茨基底批評。

「馬克思主義聯合黨」諸領袖說道：「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和嘉泰隆自治政府之間是沒有根本差的，因為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是「民選的」，也含有小資產階級分子。」們又說道：「托洛茨基圖謀奪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蘇維埃和臨時政府之間的關係，去比較一九三六年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和嘉泰隆自治政府之間的關係，——這又是一實例，證明托洛茨基圖謀用俄國圖式於世界各地。」

事實上，所有這些論，無論是中間派的或教派派都證明了那些先生來就看不見落門的，即兩點落在他們的鼻子上，也是不見的。

從歐洲第一個革命產生出來的政權機關，其真偽性質，從其來源看及從對於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立場看，都是很明白的。每個機關都是工人羣衆和小資產階級羣衆獨立創之產物，至少其先鋒隊獨立創之產物。在下層，當選舉領袖時候（不僅工委員會選舉，而且基本軍事組織和鄉村「解放委員會」選舉），這些機關底發性性質是到處明白顯露出來的。上層領導機關，則往往是委任的，而且是按各黨派力量大小為派別和改良派領袖，即不這完全取消

反映此運動領導機關之獨派性質；是比不是甚麼新的事情。以往革命鬥爭底全部歷史中，我們看見同樣傾向進行同樣的政策，達到同樣的結果。試讀托洛茨基著的「俄國革命史」論彼得格勒蘇維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的一章，其中就說起了冒險的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混入那個執行委員會裏面；從那裏又可知道

實在說來，「個委員會也不是」由下層蘇維埃選出的。研究了柏林第一個「兵代表會」成立之後，你也可看見真正的法新分子居然能鑽入其中（例如林·羅斯）。「研究俄德西諸國革命中已知鼓推轉移方式，你更可見見蘇捷革命初期也顯露這同樣的反應形式。此，試拿德國中間派希爾費定與將蘇維埃納入瑪憲法中的『深刻思想』比較史大林派在法比意希諸國『將遊擊隊納正規軍中』的同樣策略，你發看見在根本相同的條件下登的同一政治面了。

最後，從歐洲第一個革命潮產生的人民間的真正的變權性質，根據英帝國主義，蘇埃官僚和「民族」資產階級於他們的態度看來，還更加顯些。德國佔領剛一退出舞台，依靠英美帝主主義軍隊搏鬥的傳統資產階級權機關立即就實行一個強硬的殘酷的鬥爭，爲了消滅黨所造成的政權機關。如果這些機關真是屬於被派資產階級的，那麼爲甚不可以將牠們入於「資產階級秩序」機關內呢？能够舉出其他的例來駁不同的「資產階級派系」間的衝突引起像俄國那樣的國內戰爭麼？那種種，開始否認一九四三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間歐洲事變之變權政制，因否認其社會革命，結果必然要在分析歷史過時事實上拋棄了階級準繩。產階級如此氣憤擊和消滅那些從「抵抗運動產生出來的政權機關，隨力其比不同而用種方法去對付牠們，從「暫時」承認到公開的白色恐怖，——這個事實，最分析起來，除了拿這些機關階級性，視之爲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及工人衛軍之胚胎以外，是無法可解釋的。

第二個革命潮之特性

然而拿一九四三—四五年事變與一九一—一九年事變相比較，立即可以看出第一次其大戰後的第一個革命潮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革命潮間有重大的差。

首先，在一九一—一九年間，革命運動在說僅限於東歐和中歐。兩僅僅有無產階級經濟鬥爭底激烈化。但此次則全歐洲資產階級政權都陷於搖了。

在一九一—一九年間，革命潮是從革命中心大爆炸炸出來的：我們有國革命底勝利有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間德國革命底幾次連連。此次，則俄國全不成其爲蘇門爭舞台了；德國無產階級發揮了次等作用。

第一次其大戰以後，革命鬥爭曲線起是短促而急速上昇，到一九二

年春天達到尖峯，以後急速而延緩下降，中間祇有九二三年很短期的新的上昇隔斷着。此次，革命鬥爭曲線則是以後慢而過渡的上昇開始的，中間被若干次搖擺或部分的後退所斷，但其一運動的趨向是向上。這個事實底重要性，是很明顯的。第一次其大戰以後的運動，一開始就遭大失敗，尤其在德國；現在的運動則相反：產階級尚未出其全力投入戰場。所以，幾次的失敗都是暫時的，相對的，并危害於事變往後的發展，而留鬥爭進入較高階段來補償。

這個重要的差別并僅僅從第一潮底限制性（俄國德國無產階級沒有加入鬥爭）生出來的，她是，她尤其是從工人運動全趨去史生出來。一九一八年，無產階級沒有經，一鼓作氣衝入革命鬥爭中，而遭嚴重的失敗。無產階級，一九一四年間被派派出賣了，陷於暫時的頹爭，到了客觀局勢發展（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削弱，生活條件惡化等等），造成變的條件，遂展開了羣衆鬥爭。無產階級投入些鬥爭，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意識，但缺乏革命經驗（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間展的革命潮大受此影響）。

當初，無產階級在奧匈波捷南意及波羅的海沿蘇國的鬥爭，含有爲社會主義鬥爭的形式；俄革命底吸引力在這些鬥爭中佔據很重要的位置。改良派領袖自己也不得不顧羣衆底社會主義熱情。工人黨內部的「爭論」雖然歸結於公開的反抗產主的恐怖，當初則是呈獻爲如下形式：我們怎樣建立社會主義？立即開始建好麼？祇要翻開當時的報紙，就可知道這種思想方法浸染了羣衆自身。

他方面，革命鬥爭之缺乏，又使得羣衆及其領袖共產黨人方面都在不斷地摸索行動方法，這領袖是沒有適切領受「十月訓」的。惟有在物希罕情形之下，而且經過好苦難以後，羣衆運動才能採取變權政制底最成熟的形式。

第二次帝國主義世大戰以後的歐洲無產階級，則是經過了長時期失敗的。年紀較輕的羣衆人未受過社會主義教育。年紀較高的羣衆人則懷疑有革命可能。領導此次戰後第一個革命潮的羣衆組織，無論史林派或改良派，都在盡其所能剷除社會主義，命意識之殘跡，熄滅堅決的激進志之火花。「社會主義」這個字眼很少能出於刊物中，於討論或說真面。羣衆僅僅僅希罕的而且不連貫的情形才意識到他們的鬥爭是含客觀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性質的。（未完）

唐盛譯自比利時出版的「工人鬥爭」

讀者 評胡繩「論發展生產力」

守敬

胡繩先生之為時髦的馬克斯主義理論家，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僅談論唯物辯證法，更不斷在談論各種實際問題。本來唯物辯證法是和實際問題分不開的，我不但不反對唯物辯證論者談論實際問題，而且極力主張把握唯物辯證法的人必須就實際問題來把握。馬克斯是唯物辯證法的創立者，他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都滲透在各種具體問題的著作中。胡繩先生儘管把唯物辯證法的公式背得透熟，但是（一）遇着具體問題，總是弄得離開唯物辯證法。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胡先生的唯物辯證法是背公式學來的，不足為用，同時更可能是因為胡先生遇事不知多用自己頭腦，一味做人應聲虫所致。在若干年前，我曾看見胡先生對於某項問題大鬧笑話。這些年來我因埋頭研究某項專門學問，平時不大涉獵一般刊物，所以不知道胡先生的情況。可是前幾天偶一翻閱「理論與現實」復刊號，拜讀了胡先生的「論發展生產力」，又發見胡先生遇到實際問題就離開了唯物辯證法。

胡先生在文章的開端就指出他的總綱領，要有和平與民主，中國的生產力才能得着解放，才能自由發展，因此他主張：『內戰必須堅決無條件的停止』，因為『內戰是破壞生產力的惡魔』。他說：『實現民主的最高意義就是打碎束縛生產力的惡魔，使生產力發展，使人民能够豐足，國家能够富強』。胡先生提出了這樣的綱領之後，七扯八拉的寫了幾千字把國民黨政府大罵特罵。國民黨政府當然是該罵的，我並沒有左袒國民黨政府的意。問題是胡先生在痛罵國民黨政府的文章中沒有指示出生產力如何解放。胡先生不但在罵國民黨政府的文章中處處表示出他忘記了馬克斯主義，而且在一開端就把問題提錯了。

馬克斯談到『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的時候，曾拿它來和『和平』『民主』並提過嗎？我雖淺學無識，未能多讀馬克斯的著作，但只憑我所曉得的馬克斯的基本學說，我敢斷言馬克斯決沒有這樣提過。馬克斯提到『發展生產力』總是與『生產關係』來並提的。馬克斯明言生產關係束縛生產力，阻礙生產力向前發展的時候，必須用革命的方法，摧殘舊的生產關係，才能為生產力開闢新的發展道路。所謂革命，當然也是戰爭的一種，而且是國內戰爭的一種，可見得戰爭並不一定都是破壞生產力的，反過來說，和平也不一定都是發展生產力的。照馬克斯的觀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戰爭即是解放生產力的必要條件，沒有革命戰爭，不但生產力無由發展，而且整個社會都將萎縮乃至滅亡。

既然革命戰爭是解放生產力的必要條件，那麼，說『實現民主的最高意義就是打碎束縛生產力的鎖鑰』也就毫無意義了。因為在革命戰爭中，只有階級的專政和階級的民主，沒有所謂一般的民主或抽象的民主。更因為這個原故，馬克斯，恩格斯和列甫在任何時候也未曾把生產力與和平民主拉在一塊來談。也許胡先生的理論是馬克斯列甫主義之斯達林時代的發展吧。然而，希望和平民主能起解放生產力的作用，能

再論中國共產黨底革命觀

德穆

本期守敬先生來論，啓示了我去找「理論與現實」那期雜誌，去讀胡繩先生那篇「論發展生產力」文章。讀後，我覺得那篇文章是應當批評的，而守敬先生底批評，我也都同意的。守敬先生主要是把那篇文章當作胡繩先生底文章來批評，因之除了批評其中錯誤以外，還涉及胡繩先生個人對辯證法的理解和應用，以及過去所鬧笑話等等。我慚愧，以前未曾讀過胡繩先生著作，更不識胡繩先生為人，對於他個人方面事情不感興趣。我覺得他那篇文章底根本錯誤，并非他個人的錯誤，而是中國共產黨底錯誤，批評這些錯誤，儘可以把他個人事情擱開。而當作中國共產黨底錯誤來批評，則我要說以下幾點來補充守敬先生底批評，或與之相發明。

胡繩先生那篇文章比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論」更加明白顯示中國共產黨底革命觀。從那篇文章看來，中國革命任務是在：（一）解放農民，（二）發展自由資本主義。達到這目的的手段，則是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政治上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經濟上工人和資本家合作或協調，農民和地主妥協。這些手段，無須經過暴力和戰爭，可以靠和平談判實行出來。須得這個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實現之後，過了相當長時期，讓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讓無產階級積累力量，然後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這最後一點，那篇文章雖然沒有說，但據「新民主主義論」看來，這是超中應有的義，我們代為補充，胡繩先生會否認吧？

這個革命觀，在俄國大體是門雪維克派底革命觀。當初，門雪維克派也是認為俄國革命任務是在發展自由資本主義，農民解放本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上一個重要條件。他們也是主張無產階級與自由

人吃有穿，豐衣足食」，豈不正和美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所散佈的幻想一樣麼！

胡繩先生罵國民黨專政是中國貧窮災荒和生產不能發達的根源，當然沒有罵錯。但是怎樣才能消滅國民黨專政呢？是用革命手段迫得國民黨交出政權呢？還是用妥協手段請求國民黨開放政權呢？胡先生走的是第二條道路。他主張勞資協調勞資合作的原則，他主張聯合民族資本家來反對官僚資本家。

當資本主義還在向上發展階段的時候，馬克斯也沒有主張過勞資協調，而胡先生在資本主義已爛熟，資本主義矛盾發展到極點，資產階級拚命向無產階級進攻的今日，却表示贊成勞資協調，我真不知道胡先生預備要叫勞工大眾如何協起。胡先生要勞資雙方讓步嗎，那麼，不僅資本家非經鬥爭不會讓步，而且工人們的生活已苦到無步可讓，即使胡先生贊成用強制仲裁方法迫得勞資雙方都讓步了，問題仍沒有解決。因為胡先生所提出的並不是一部分在業工人們的生活問題，而是整個解放生產力的問題。從解放生產力的觀點來說，則失業現象不消除，工廠停工現象不消除，一切人力物力得不着合理的使用而發揮其可能發揮的效率，則生產力並未得着解放。這些問題都不是勞資協調所能解決的。

把民族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對立起來，更是大大的笑話。官僚資本就不是民族資本麼？這是那裏來的邏輯？也許胡先生要說官僚資本雖不是外國資本但是它依靠外國吧，其實所謂民族資本果真能不依靠外國麼？整個中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已實質殖民地化了，民族資本那能不依靠外國？民族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在依靠外國一點上只有間接與直接之分，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官僚資本家比民族資本家實力雄厚，且有政治力量的幫助，都無法與帝國主義的金融支配相對抗，難道民族資本家能希望和帝國主義相對抗麼？中國民族資本家（本文中的「民族資本家」，都是照着胡繩先生原意的「民族資本家」，即不包括官僚資本家的民族資本家。）在經濟上那個能脫離了外國的關係？他們用的機器是外國來的固不待說，就是原料，此刻也很多仰給於外國。那個產業資本家不兼做囤積生意，囤積大批的舶來品？他們周轉資金的時候雖非直接從洋大入手周轉，但他們能逃過胡先生所反對的與外國有關係的「官僚資本」的羅網嗎？其實一部分「民族資本家」所以反對「官僚資本家」，正因為「官僚資本家」壟斷了對外關係，他們反對這種壟斷，而希望自己能直接和外國金融資本發生關係，直接從外國獲得物資資本，直接從事對外貿易。

胡先生的意思，要發展中國生產力就必須幫助民族資本家反對官僚資本家，或者聯合民族資本家反對官僚資本家。姑毋論胡先生的希望，照胡先生的辦法能否實現，即使實現了，中國的生產力是否就得着解放了呢？不會的。官僚資本固需仰賴外國金融資本，民族資本也需仰賴外國金融資本的。結果難把寄生於中間的官僚資本排除了，並不能求得外國經濟的獨立，民族資本也需仰賴外國金融資本的。這情形正和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能排除寄生的商人，並不能解決社會根本矛盾是一樣的。

金融資本統治產業資本乃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而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金融統治與政治統治相結合也是必然的現象。中國金融資本雖因先天不足而採取了稍與西洋金融資本不同的發展途徑，成了外國金融資本的附庸，雖然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而與政治發生高度的結合呈現為官僚資本的形態，但是

派資產階級聯盟，推選自由派資產階級走上政權，而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積累力量，同西歐諸國無產階級一般的，等到力量豐富之後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所不同的，就在門雪維克派僅僅「現實」上與資產階級共組「聯合政府」和實行勞資協調，而「理論」上尚不敢如今日中國共產黨這般公開宣傳罷了。

門雪維克派當時居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們徵引馬克思底理論來替這種革命觀辯護。馬克思曾說：「未來較多發展的國家顯示較少發展的國家以後者工業的形態。他們由此推論說：俄國發展底模形是英法德趨先進國，這些國家既然是資產階級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執掌政權，發展資本主義，讓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底下漸漸積累力量，那麼俄國也祇能走這條道路。馬克思又會說：一種社會形式未曾完全耗竭其可能性以前，是不會消滅的。他們也由此推論說：俄國資本主義尚在開始發展，難耗竭其可能性還遠得很，所以現在談不上甚麼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把門雪維克派這個革命觀打得粉碎了。十月革命及其以後建立的國家，在諸先進國歷史中并非前例可尋，而遠未耗竭其可能性的俄國資本主義已非退出舞台不可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馬克思底話說錯了麼？

馬克思並沒有說錯。先進國顯示落後國以未來發展形態的話，是有條件性的，有局限性的。歷史決不重複。落後國雖可在先進國歷史中發現其若干發展形態，但也有自己的特性，為先進國所沒有的。落後愈速，則特性愈多。門雪維克派把馬克思這個有條件性的話轉變為絕對的超歷史的公式了。一種社會形式耗竭其可能性的話，則不應當在一國範圍內來瞭解，而且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來瞭解。俄國

它的金融資本的本質並不因此而改變的。胡先生不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在產業資本家的立場來反對這變態的金融資本家，不但要碰壁，而且是開倒車的。胡先生既未明提到以革命的手段來沒收這部分官僚資本，而且從整篇文章的調子推測，他倒是希望這部分官僚資本能從寄生性的投機資本變為生產性的產業資本。胡先生不了解在整個世界關係中，中國的金融資本已註定了只有走向投機而無法走向生產的運命。這正和中國的政治在全世界的關係中只有走向獨裁而無民主可能是一樣的。中國是全世界的矛盾的集結點之一，只有從世界革命的觀點才能解決中國問題。發展生產力問題也好，和平問題也好，民主問題也好，都必須從世界革命的觀點才能得着真正的解決。

三

我在上面所講的道理本極淺顯，胡繩先生當然不會不懂，可是以頂刮刮的馬克斯主義理論家開名的胡繩先生，為什麼居然會弄出『和平民主』與『生產力』相連，明白主張『勞資協調』，要聯合民族資本家來反對官僚資本家這些笑話來呢？一切的災難都根源於胡繩先生不用自己的頭腦，遇事不深思，只知道追隨斯達林的人民陣線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人民陣線和理論民主主義的罪惡不限於它把革命領導到錯誤路上，使革命日漸失利，他更大的罪惡是在用似是而非的理論欺騙了廣大的革命青年放下了思想上的武器，偏要挂着唯物辯證法的幌子。這一個傾向決不限於胡繩先生一個人，而是領袖追隨者們的一致現象。不過胡繩先生『論發展生產力』那篇文章却為我們供給了在思想上投降的典型例子，所以我特別提出來請自命為馬克斯主義者的人們反省反省。

為保衛我們的思想武器，以下再從方法論方面對胡繩先生的文章重作一番檢討。

戰爭破壞了無數的人力物力，戰爭使許多工業停頓，戰爭使許多生產事業從建設性的生產變為破壞性的生產，戰爭使交通阻塞，農村荒廢……從這些地方想來，『和平』的確似乎是發展『生產力』的必要條件，可是馬克斯為什麼不拿『和平』與『生產力』並提，反倒說只有革命戰爭才能解放生產力呢？難道馬克斯的意見錯了麼？不履高山，不見平地。不把真正馬克斯主義的見解提出，則胡繩先生的『和平』論調確實是最能獲得庸夫俗子們同意的。戰爭能破壞生產而和平能增加生產，的確是合乎眾人直接經驗的說法。可是由經驗得來的真理通常總是隨伴着很小的局限性，一超過這個限度就要失其效用。拿胡繩先生的見解和馬克斯的見解相比，很顯然的是胡繩先生的真理得自一時的表面的經驗，而馬克斯的真理則得自長期歷史的概觀和社會內部的分析。胡繩先生在這時候却完全忘記『唯物辯證法』要求我們在歷史發展中去認識事物，要在內在矛盾中去認識事物。

胡繩先生隨着中共向國民黨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組織聯合政府，主張聯合民族資本家以反對官僚資本家，來發展自由資本主義，他所根據的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並沒有過時，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還沒有真正開始』。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果真沒有過時麼？國民黨果真會開放政權實行民主麼？在我看來，胡先生所希望的都未免要落空。胡先生所以有上面這些主張，不外是把中國從世界

資本主義雖然發展未久，但就世界範圍說，資本主義已經耗竭其可能性了。門雪維克派不懂得這點，所以陷於破產。

門雪維克主義在十月革命之中破產了，但革命以後若干年，隨着官僚反動派抬頭，門雪維克主義復活起來，表現得最明顯的是中國共產黨底理論。胡繩先生說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還沒有真正開始；他反對在中國批評自由資本主義；他規定發展自由資本主義為中國兩大任務之一。這一切表明甚麼呢？豈非表明胡繩先生同當初門雪維克派一般，認為中國資本主義還有很遠大的前途？但他不明白，資本主義既然在歐美已經爛熟了，在中國也就沒有發展前途了。不僅整個資本主義即將為社會主義所代替，而且自由資本主義早已為壟斷資本主義所代替了。在全世界如此，在中國亦然。胡繩先生為甚麼堅持中國非經過長期資本主義發展不可呢？豈非因為諸先進國都經過了長期資本主義發展，所以中國也必須經過長期資本主義發展麼？但他不明白，俄國已有特殊性，無須依照先進國形態去發展，中國更有特殊性，無須依照先進國形態去發展了。

接受了門雪維克派兩個錯誤前提之後，必然要做出門雪維克派結論了。於是『聯合政府』、『勞資協調』、『和平談判』等等就接踵而來了。這一切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整個的革命觀。

中國共產黨稱此革命觀為布爾雪維克的或列甫主義的。可是列甫底俄國革命觀，本質上與此不同。布爾雪維克派和門雪維克派同認俄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質，但布爾雪維克派否認俄國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而提出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來對抗門雪維克派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主張。列甫說：『正因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無產

關係中抽象出來，機械的和若干先進的國家的發展歷史對比而得的結論。中國的資本主義誠然未得着通暢的自由發展，但如果因此就以爲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並未過時，却是非馬克斯主義的看法。從整個世界關係下來看中國，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確已過時了。中國決不會再有什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也不會有什麼和平民主。中國可能有的前途只有兩種：如果革命能夠勝利，則資本主義經濟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必然一開始就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如果革命不能勝利，在國民黨統治下，不管能否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就只會日漸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也不會再有什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法西斯化是資本主義沒落期的一般傾向，何況中國是整個資本主義的矛盾集結點。胡繩先生在這裏又把唯物辯證法的重要定律忘記了，他不在全體關係中去認識部分，而要把中國問題當作中國問題來研究。在列甫時代已經說到少數金融巨頭宰割世界，現在離列甫時代又已二三十年，美國不僅以經濟優越統治世界，甚至在世界各處佈置軍事根據地，準備獨霸全球，而我們的胡先生却仍要夢想中國問題能脫離外國影響讓我們獨自來解決！

總之放棄唯物辯證法而採取經驗論就只好從革命家變成和平主義者，放棄唯物辯證法而採取機械論就只好從革命家變成經驗論者，變成資產階級的尾巴。一切有良心的馬克斯主義信徒們，請看看馬克斯主義被虛偽欺騙家們引得墮落到什麼程度！起來，爲保衛思想鬥爭的武器而戰！猛省，檢合我們自己是否仍緊緊抓住這思想鬥爭的武器！

讀者通信 青年人的兩大問題

編輯先生：
我是新旗的一個經常讀者，我認爲，這雜誌不單是一本政治性的鬥爭刊物，同時也在指導人走上一個全新的人生觀，因爲我正同上期通信裏那位言保貞先生一樣，讀了新旗之後，整個思想都受了影響。

我是鄉鎮小學裏的一個教員，雖然還只十九歲，但開始踏入社會，到今天已是四年了。在這四年中，做了一年典當學徒，六個月印刷生涯，又是一年的錢莊練習生。爲了家貧，我不能進高中讀書，又因爲做錢，找不到一個較合理的職業。環境打擊着我，我一直予以失望。

這時我得到了新旗，帶給了我很大的興奮，鼓勵，我覺得找到一條新路了。但想想這個遠大的

前途，又想想我這個一無所長的人，沒有好好地讀書，沒有任何技能，我能於新社會有什麼貢獻嗎？想到這裏，我又茫然了，失望了。究竟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學些什麼？從事什麼職業才好？願先生有以教我。

宋塵石上 九月七日

醒石先生：

一個有志向的青年人沒有力量升學，本是痛苦的。我本人就受過這樣的痛苦。我當初的家庭情形也沒有力量供給給我讀書的，我勉強讀畢了中學，更勉強地讀了一年大學，終於還是讀不下去了，中間是飽嘗苦痛的。可是後來我覺悟了，求學不一定靠學校的，生活是學校，整個社會就是學校，要讀書不一定進學校，

階級更加要反對資產階級。『列甫從來不主張『聯合政府』，而且竭力反對可以聯合資產階級政府；他從來不提倡『勞資協調』或『勞資合作』，而且從原則上反對『勞資合作』；他從來不撒播能經過和平談判完成革命的幻想，而且努力攻擊這個幻想，努力說明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從來不說甚麼一般的民主，他祇說階級的民主。』

但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布爾雪維克派底革命觀還是不完全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未曾確定工人和農民中間的關係。究竟是誰領導工人呢？工農平等關係呢？工人領導農民呢？三種關係不同，『工農民主專政』底性質和效果也將隨之不同。歷史證明，農民是沒有政治獨立性的。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列甫寫道：『農民不跟着無產階級走，便跟着資產階級走。』農民不能領導工人，工農不是平等關係。『工農專政』若是能實現的話，必然是『工人領導農民的專政』。但如此就等於『無產階級專政』了。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則革命必須走出民主的範圍以外而進入於社會主義的了。所以一九一七年革命當中，列甫看得更加清楚，便拋棄了『工農民主專政』舊公式，而採取『無產階級專政』新公式，因之便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而採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觀了。

胡繩先生也許要說：布爾雪維克派革命觀應用於俄國是對的，但不能應用於中國，因爲俄國不是殖民地，而中國是殖民地。

可是既然俄國革命觀一般不能應用於殖民地；胡繩先生爲甚麼能夠把他的鬥雪維克派革命觀應用於中國呢？

從列甫主義觀點看來，資產階級不撞在俄國帝制之下沒有革命性，她在殖民地帝國主義壓迫之下

從此我就怕然地離開了學校，毫不以失學而痛苦，同時我直到今天還在求學，還在讀書。

我希望你不要因為不能進學校求深造而感痛苦。

其次，是職業問題。我個人從不會找到過一個職業。一來是難找，二來也不願找。一個社會主義者是以謀得較善社會之實現為職業的。做社會主義者這本身就是一個職業。可是幹這個職業不一定就能吃飯。在一個弱小的學術性的或甚至行動性的團體裏，是不能供給很多人生活的，那末這些社會主義者如何生活呢？不得已，只好各人找一個副業幹。對於這個副業的選擇，在我們是極不重要的。所謂高低，無所謂好壞，唯一的標準就是牠不是直接幫助統治的，同時最好，牠能給我們較多時間來幹我們的「正業」。所以職業對於我們祇具有很小意義，祇爲了人不吃飯便不能生活，不

生活便不能談社會主義之故。

其實這樣的職業態度，任何懷有較高理想或較遠情趣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固不但以社會主義者爲然的。大哲學家斯賓諾莎，是盡磨鏡片來維持生活的。

我希望你也能採取這樣的職業態度。如果你能打破庸俗的讀書與職業的見解，我想你一定會大大地樂觀起來，積極起來，勇敢起來。

小學教員這個職業很合於做社會主義者的副業，尤其在小鎮上，小學校教員當是最進步的份子，因爲他們是城市文明與農村羣衆的媒介，是鄙陋的鄉鎮小市民的啓發者，希望你安於這個職業。你們那裏的小教中，有多少像你那樣的愛智者呢？也許很少吧？但也不會沒有「芳草」的吧。

編者

九月十七日

也是沒有革命性的；農民不僅在俄國沒有政治獨立性，在殖民地也是沒有政治獨立性的；勞資合作不僅在俄國是錯誤，在殖民地也是錯誤的；和平談判不僅在俄國不能代替暴力革命或戰爭，在殖民地也是不能代替暴力革命或戰爭的。

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們，請勿以中國是殖民地爲藉口，拿門羅維克主義來代替布爾維克主義。門羅維克主義代替了布爾維克主義以後，理論家們（胡繩先生在內）自然要無視發展生產力上戰爭和專政底作用，而祇見到和平和民主底作用了；他們自然要弄不明白，發展生產力離要和平和民主，但要有真正和平和真正民主，必須先經過革命戰爭和革命專政了；他們自然要向地主和高利貸者「保障交租交息」，要主張「工人也有義務加緊生產以保障資本家的合法利潤」了；他們自然要背誦辯證法公式時頭頭是道，但應用於具體的實際的問題時就笑話連天了。

中國革命悲劇（續）

共產黨黨員是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希望南方工人能接受共產黨主義影響，因爲此時南方工人已經依附於國民黨了。但共產黨提出在一種能獲得羣衆擁護的綱領上改組國民黨的建議，孫文則始終不理。直至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叛亂，孫文被迫又一次亡命之後，才漸漸聽從馬林底意見。孫文親信中最高急進的廖仲愷也支持馬林底意見。孫文還是不信羣衆運動如此有力能成爲政治武器的，但他開始抱持能從俄國得到直接而具體援助之希望。

有多種因素配合起來促成孫文注意於聯俄可能性。他的國際共同開發中國之天真的計劃，遭受所有帝國主義政府之拒絕或推辭。羣衆不會聯合來哄騙綿羊的。狼與狼間祇能互相鬥爭，決定誰來吞噬綿羊。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召集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這個會議又激起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恩惠之希望，但不久這希望就消失了。借汪兆銘底話來說：「華盛頓會議」使中國不致受日本武力獨佔，但祇爲的讓列強去「合作侵佔」。這個會議不是爲

了中國民族解放利益而召集的，而是爲了美國帝國主義利益而召集的。人們明白了這個事實之後，對於列強惡意之幻想就消失無存了。中國國民運動領袖們因此覺悟，蘇維埃新強國，居然擊破世界大戰勝利國聯合的干涉，也許能够做一種有力的積糧，利用來強迫帝國主義對中國讓步。

早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維埃政府就公報準備放棄帝制俄國在中國享受的一切帝國主義特權。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她又重申這個諾言。非正式的蘇維埃政府代表開始在北京努力談判，圖謀訂立一個新約在此基礎之上。懷敵意的列強一向是儘其可能從政治軍事各方面去孤立和破壞布爾維克政制，此時就來抵制蘇維埃代表們底努力，雖然蘇維埃政府是提議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訂約的。這個提議在中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大大地提高了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在中國知識分子羣衆中的威望。

蘇維埃代表們來中國聯絡，其開始的努力就已顯出一種傾向，即把蘇聯直

Harold R. Isaacs 著
唐 威 譯

接的國家利益置於革命利益之上。這雖是一種孤立的事例，却頗令人注目的了。當赤塔政府和共產黨國際在伊爾庫茨克的辦事處第一次派遣非正式的代表來中國時候，北京政府是在奧名洋溢的親日派安福系手裏的。孫文領導的俄國利益運動，並沒有給予那些代表以一種印象，認為可以用來做蘇維埃國家利益的底支點。代表們更多傾向於吳佩孚，一個有強大武力的軍閥，他正想推翻安福系政府。後來，一九二〇年，當吳佩孚在北京取得政權，設立了一個傀儡內閣時候，蘇維埃政府機關報『新聞報』遠東問題『專家』評論道：『吳佩孚已經把他的旗幟掛在北京城頭上了；顯然可見，在此旗幟之下，中國新內閣政治方向一定是有利於蘇維埃俄羅斯的。』（見一九二〇年十月九日莫斯科『新聞報』）但結果證明吳佩孚乃是英國帝國主義底工具，經非布爾喬維克派俄羅斯底朋友。英國簡雷成替日本做北京政府後台老闆罷了。正爲這個原故，一九二一年的談判沒有成功的。

馬林一九二二年春天來到中國，在廣西會見孫文，如此與孫文發生了聯繫。他於是有了印象，認爲中國國民黨運動底主流是追隨孫文領導的國民黨的。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員罷工聲中，他來到廣州，發現國民黨和新興的中國勞動運動最活躍部分之間確有實質的聯繫，於是上述的印象就轉化爲確信了。伊爾庫茨克辦事處，乃是共產國際和遠東之間唯一的樞紐，此時馬林就這反這個辦事處過去的傾向，而來杭州向中國共產黨人提議加入國民黨了。一九二二年八月，孫文被人從廣州驅逐到上海來，馬林又會見他，勸他勿圖謀奪純軍事手段去奪回廣州，而應當做羣衆宣傳工作。華盛頓會議也轉移國民黨領袖們底思想了，馬林發現他的主張得到更多的歡迎，因爲孫文已經確定想得蘇維埃援助了。一個月之後，馬林就回莫斯科報告去。根據他的報告，共產國際遂放棄了『伊爾庫茨克路線』而注意孫文。馬林提出的與中國南方運動合作的意見，公開發表於共產主義出版物上。（見一九二二年九月『共產國際』雜誌馬林寫的『中國南方國民黨革命運動』）蘇維埃政府於是派遣趙飛，牠的第一流外交人才，來中國，同孫文建立正式的聯繫。

趙飛在上海會見孫文，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兩人共同發表宣言，其中越飛同意：『中國還沒有實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條件』，『中國主要的和迫切的任務乃是完成民族統一和民族獨立。』越飛向孫文保證：國民黨運動在完成這些任務途中，是『可以仰賴俄國援助』的。這個外交辭令建立了孫俄協定，孫文終於明白：俄國人是在拿十月革命威權，連同軍火，金錢和顧問，奉獻給他和他的黨。

但同一外交辭令，立即又被人解釋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盡其全力務使國民黨成爲價值的同盟者。同年秋天，鮑羅廷就來做孫文底顧問了。鮑羅廷不是以共產國際代表資格來幫助中國共產黨工作，他是以蘇聯共產黨底政治局派遣的國民黨顧問資格到中國來。這兩種資格決非祇有純粹形式的差別。鮑羅廷底使命是在改組國民黨，將新的生命注入於國民黨。一切的努力，尤其中國共產黨人底努力，從此都應集中在這個使命上面。

共產黨底獨立的政治前途，於是被人置於腦後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已經決議：『當中國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還是很微弱的時候，當中國當前的中心任務還是實行國民革命以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封建走狗的時候，當工人階級還未曾充分分離爲一種絕對獨立力量而又必須解決這個國民革命任務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國民黨和幼稚的共產黨必須互相協同其活動。』無產階級底獨立性被移置於不定的未來去了。但雖如此，中國共產黨仍不可與國民黨『合併』，仍不可『放下自己的旗幟』。在實際上，倘若共產黨人必須爲了與國民黨協同活動這個『中心任務』而放棄了『絕對獨立力量』代表人底資格，那麼結果必然要喪失其自己的獨立性的。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壓抑了黨內反對派（反對加入國民黨）之後，便提出『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口號。大會宣言明說：『國民黨應爲國民革命中心力量，應站在領導地位。』

給共產黨人鋪設這樣一條道路，必然要引導他們走到這個思想，即認爲：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應先於國內階級間的鬥爭，或應暫時延緩國內階級鬥爭。利益相反的階級可以團結在一個政黨裏面，——這個觀念乃是建立在一種意見上面的，即認爲帝國主義應迫能緩和和各階級間利益對立而不會加深這個對立，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僅具有革命作用，而且具有領導作用。這是根本離開了列甫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定下的戰略路線，因爲把國民運動疏導於資產階級民主軌道，而斷送共產黨底政治和組織獨立性了。從一九二三年起，中國共產黨就承認了國民黨『領導地位』。共產國際亦然。共產國際爲了替這個錯誤路線辯護，便發展一種理論，說國民黨并非資產階級底黨，而是各階級爲反對外國侵略者的共同利益而團結起來的黨。這個理論起初成立於實踐中，不久就進入於共產國際底文件而指導其未來全部戰略過程了。

鮑羅廷說服孫文明白：國民黨需要的是『一個有紀律的黨組織，又有強力的黨業組織爲其後盾。當十一月間，陳炯明又來威脅孫文所奪回的廣州時，鮑羅廷給了一個具體的事例，證明如何拿蘇俄幾句諾言就可以使得工人和農民起來

保衛國民黨政權。陳炯明底威威輕輕而更易地撤除了，這事使鮑羅廷底談論得人信任。得到孫文支持，鮑羅廷於是起草一個綱領，以國民黨和蘇維埃中國共產黨合作為基礎，包含反帝國主義鬥爭思想和改善工農地位計劃。鮑羅廷採取了孫文底「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口號，使之具體化，但祇限於規定二五減租和預許勞動法範圍內。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召集第一次全國大會，通過了這個新綱領，而且徹底改組了。大會開那日，列甫死去。這是一種歷史的偶合，其中不乏諷刺意義，因為蘇聯和共產國際，本是列甫領導創立的，現在正在中國拋棄無產階級絕對獨立性的觀念，拋棄列甫這項最有價值的遺產了。*

從此，國民黨模擬了俄國布爾雪維克黨底組織形式，採取了布爾雪維克黨底宣傳鼓動方法。過去國民黨主要弱點之一，是依賴那些封建性的軍閥，為補救這個弱點，俄國人遂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創立黃埔軍官學校，為培養新的國民革命軍官之用。軍校底設備和經費，都是俄國供給的。以前好久，蘇維埃軍火就一船一船裝到廣州來裝備那些依附於新旗幟下的軍隊了，這些軍隊於國民黨表現其力量之後不久就依附過來，而國民黨力量又是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所賦予的。

國民黨現在開始迅速發展了，共產黨人為了符合他們在國民黨內工作的要求，便限制自己於資產階級國民革命底口號和要求，而這些口號和要求自然是受中國資產階級利益所限制的。共產黨底幹部，起初主要是從學生輩中出來的，後來從熱練工人出來的也漸漸增加，他們都是在純粹資產階級國民革命意識下受教育，而非在無產階級革命意識下受教育。這事使得共產黨變成了國民黨底一種左方附屬品。

區別共產黨員和「純粹」國民黨黨員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孫文主義中間其深刻的思想分歧，並不是綱領上甚麼差異，因為整個運動都是在孫文底三民主義旗幟之下進行的。共產黨黨員和上層國民黨黨員間的區別，就在於唯有共產黨員賦予國民黨及國民運動以英勇精神，以自我犧牲，以共產主義的進取心，這是從他們對於工農的熱忱產生出來的，他們自信是替工農利益服務。共產黨員未曾提出任何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未會拿自己的面目和旗幟出現於黨面前。他們是孜孜不倦地拿組織和黨業鐵流灌進國民黨模範去的。可是，在起初幾個階段，這個事實底真正意義部分地被黨業運動底龐大發展所遮掩了。黨業運動并非共產黨底策略或國民黨底要求所製造的，其興起的條件實已存在於中國社會機體中了，如同礦石存在於礦山中一般。

在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及其他大城市，外國人和中國人購辦的工廠中，工人底勞動和生活條件還在同產業革命初期英國工人條件一般。男工，女工和童工，同那時英國工人一般，也是每日勞動十二小時，十四小時，十六小時的，所得工資一天還不到八分美金，他們的勞動又無最初步的保障，他們的醫藥又是最微小的供給。一種可惡的學徒制度供給小廠主和小店主以取之不竭的兒童勞動，學徒們每日勞動至十八小時和二十小時，只換來幾碗飯和一块睡眠的地方。在如此勞動條件之下，雇主，尤其外國雇主，用其優越的技術，自然可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因為勞動者底生命是很不值錢的，中國人底死亡率又後人知道。產業發展之後，工人數量增加了，為反對這些條件，他們就挺身而起。

有組織的勞動運動，大戰之後立即出現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運動以前，就有工人罷工發生；一九二〇年，廣州機器工會發動第一次大規模的罷工；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以其罷工使英國帝國主義屈服，承認工會合法和增加不少工資，這事震動了全中國。從此建立了基礎，而工人紛紛加入工會。一九二二年五月，在海員勝利的領導之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開會於廣州。大會代表代表了二十三萬有組織的工人。在這強大的新力量壓迫之下，孫文底廣東政府就修改刑法，承認工會組織為合法，而替往後的發展清除道路了。（未完）

* 故世的沃塞·蘭參（G. H. W. Ross）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寫的『中國之謎』中，曾將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真確概括為如下的話，即說：『俄國教國民黨』如何將孫文底改良工人生活之綱領轉變為有力的攻守武器。鮑羅廷教了孫文不要信賴自己，而要信賴一個黨以後，一定會教孫文不要信賴個人，而要信賴階級。鮑羅廷一定會說明俄國工人如何實行一九〇五年革命，……而便宜了俄國資產階級，說明法國土地革命如何打擊封建貴族，……而便宜了法國資產階級。……這些是危險的武器，但沒有其他武器能達到所期的效果。實際使用這些武器時，最適宜的工具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中國革命如果到了不需要這些武器時候，共產黨人就要遭受最重大打擊了。』

一九二四年，孫文圖謀調和共產主義和他的學說，便說共產主義便是民主主義。如此說法遂使他的信徒糊塗，遂使他的學說難懂。但他究竟是忠實於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原則的。關於孫文思想發展的研究，請看 H. O. Meyer 著的『廣州莫斯科協定對於孫文政治哲學的影響』，在一九三四年北平出版的『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論』中。

電話公司怠工事件(工廠通信)

覺新

三星期前，我們公司接線部，曾發生了一次怠工潮。起因是由於一個女接線員工作時屁股選坐着二張報紙，給監督發見了，如以下面。女接線員否認有錯過，因為屁股並沒有眼睛可以看報，並且妨礙她的工作。當監督這問報紙來源時候，旁邊另一接線員吳某，吞不過眼，出來辯駁。監督老羞成怒，一紙報告，第二天便把這個搗搗的接線員開除了。於是羣情激奮，認為這點小事不足以任意開除工人。大家起來要求收回成命並以怠工示懲。

這件事情一直拖延到今天還沒有解決。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當怠工發生後，工會立即出來指責工人不應來通酒工會便自行怠工，但為了使羣衆對她有好感起見，願出面與公司交涉，工會的代代表告訴我們：此事可以由他們負責，只要我們立即復工。我們覺得事情亦無需擴大，工會能叫公司恢復被開除者的職務，未嘗不好，我們就先復工。

工會與公司交涉的結果，據說我們的要來已得到美國大英管轄，不過復職後須到另一部門而已。但當我們剛剛認為滿意而要求必須立即實行的時候，這一口頭答應變卦了，五個部長聯名主張非開除吳某不可，否則，他們五人便要總辭職。真奇怪！一個小小的接線員何以會突然使這些大亨如此之重視？這是個什麼的麼？當然不是。我們都明白：雙方現在正企圖向我們進攻，她顯然在計劃怎樣削弱我們的力量。他們必認為被開除者經替工人說過話，是不利於他們，是眼中釘，因此非除掉不可。接線部長所宣佈吳某的罪狀(如「在工作時間唱歌，隨便談話」等)也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

在資方的心目中，最好每個工人都成爲她的忠實奴隸，死心塌地替她賺錢，然而，天下豈有此理，我們同樣要吃飯，穿衣和養家，我們活不下去，就應有權利爭取我們所需要的，我們一年到底爲公司辛苦，出力，賺錢，照理，資方也應該隨時提高我們的待遇，但相反而心坎詭計，藉口任意開除工人，打擊工人，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資方現正以拖的辦法對付我們，在他們看來把時間拖長了，這件事情便可自我們的心中淡忘了，便集不攜一致的熱情爲此事再起來與之爭鬥，然後順利地，照樣一個個把較自覺的工人踢掉，於是得以得心應手了！可以坐獲更大的利潤了！我們必須當心呀！必須團結來對付他們的陰謀詭計。

我們爲了要求被開除者立即復職，爲了我們今後的職業不致毫無保障，爲了反對資方的陰謀進攻，我們應該繼續鬥爭，靠自己的團結力量。工會的主持者，表面似乎同情我們，替我們出力，但誰敢說牠不是敷衍我們，誰敢說牠不在與資方妥協？昨天(四日)，工會開的代表大會，雖然爲了專門討論我們這件事情，但竟草草而不決，叫我們再等待社會局的調解，評判委員會的評判，真是這一點已經證明工會並沒有從工人方面着想，不管牠說得怎樣的漂亮。

我們這次局部的鬥爭，在表面看來似乎只爲了一個人，不爲人們多大注意，其實，並不簡單爲了個人的開除與復職，是有關乎整個工人今後的鬥爭的。倘若我們指出一點值得注意的事：公司當局正以各種可能配合整個資本家對工人的進攻，最好的

新 報 第九期

16

辦法便是首先削弱我們的力量，把他們認爲有害的人排除出去，使我們的團結鬆懈。勞資可以合作麼？這簡直是騙人！這次鬥爭又一次證明：任人們以拍馬屁式的勞資合作說去連迎資本家吧，但資本家討厭地一腳踢開以後，還要去拖工人的咽喉呢！我們必須反對資方的有意拖延不決，否則我們便會中資方的詭計。我們要使我們的要求能夠達到，除了經常保持我們的熱情與團結外，還必須立即取得各部門工友的同情與援助，更重要的，必須立即完全拋棄勞資合作的念頭，而代之以階級鬥爭。

編者底話

本期出版恰逢辛亥革命紀念日。我們不願意寫夜景的文章。我們便以沒有夜景的文章，來紀念他。

再論內戰擴大以後一文中說上海至今未開六日追悼會。此文寫時尚未開，但本期出版前六日開過了，是在雙方「君子協定」之下開的。開後，有人說，此次追悼會堪爲中國未來聯合政府之模範，因爲雙方合作得很好；有人說，一方固然是遺囑死者，他方則是痛哭老鼠。我們追悼的文章在第五期。此時此地何話可說？我們也就不再寫追悼文章了。

『收回港九問題』一文，不會讀的人將以爲我們反對收回港九。好像輿論反對清查團不打老虎，祇打蒼蠅，不會讀的人也將以爲輿論主張勿打蒼蠅。

新旗

第十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大會，二星期後就要閉會了；國民黨軍攻下張家口後，共產黨也將聲明談判全盤破裂了。現在，在所謂「第三方面」調停之下，尚有雙方妥協的一線希望。不過無論妥協與否，無論是和是戰，中國危機仍然是不能解決的。因為如此深刻的危機，非廣大羣衆自己起來解決，任何人都無法解決的。

不幸，這個真理未爲人們所認識。人們寄託解決之希望於廣大羣衆以外。起初，人們寄託於國民黨自身，希望兩黨直接談判可以達到目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親來重慶，與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直接談判一二月，沒有得到結果。以後，人們寄託於美國，希望這位娘舅來調解家務糾紛。五星上將馬歇爾來做公斷人已有十個月，也是沒有得到結果。

現在，人們又寄託於美英蘇三國共同的調解了。正在美國調解顯然失敗的時候，國際間紛紛傳說去年波茨坦會議時三巨頭關於中國有秘密的協定，其中含有「強迫中國政府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而不解散中共原有之軍隊」條文，而且規定由美國負責使中國執行，美國若未能辦到，則蘇聯可以自由行動，單獨負責。美國國務院中國科雖然否認這個傳說，但根據雅爾達協定和莫斯科三強外長會議先例，以及過去一年來談判情形看來，波茨坦三巨頭會議有此秘密協定是很可信的。那麼，人們希望，次一步，也許是美國一國調解讓位於美英蘇三國調解了。

僅僅兩黨直接交涉，已經離開真正的解決方法了；由兩黨直接交涉，到美國一國調解，離開得更遠些；由一國調解，到三國調解，離開得更遠些。所以，無論波茨坦有無秘密協定，無論蘇聯和英

國有無出面干涉之希望，中國危機之不能解決是可以斷言的。

經過無數次打擊以後，我們還不覺悟麼？還不明白過去是愈走愈遠離真正道路麼？

現在在中國危機，不是通常的危機，乃是革命的危機，乃是幾世紀積累下來的歷史矛盾的總爆發，非用革命手段決不能解決的。但既然是革命，那首先是廣大羣衆底事情，尤其是大城市羣衆底事情，決不是國共兩黨或美國一國或美英蘇三國底事情。人們輕視大城市羣衆底力量，人們不去喚起羣衆，而寄託希望於羣衆以外的力量，尤其外國底調解，難怪同理絲一般，愈理愈紛亂了。

根本解決危機的方法，就是停止召集「國民大會」和「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頒佈新的選舉法，選舉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真正的國民大會，同時還給民衆以種種應享的自由。一切問題，連國家

第十期目錄

如何解決中國危機.....	舒 嚴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爾 因
歐洲革命之第一階段(F).....	Ernest Gellner
大戰後的蘇聯.....	唐 盛
我們的真正美國朋友(上).....	劉 默
中國經濟發展走甚麼路線?.....	舒 嚴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Isaacs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憲法制政府組織頗顯複雜，由國民大會去決定。將來即使國民大會仍不能解決這過於深刻的危機，至少也是向着解決前進一大步，不像現在之南轅北轍了。

總之，廣大羣衆，尤其大城市羣衆，如果沒有興起，沒有以自己力量直接干涉國家大政，則無論何種解決方案，都是行不通的或靠不住的。而現在喚起羣衆的比較最適當的手段就是普遍全權的國民大會。

起來，反對一黨指定的，或政黨分配的國民大會，要求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蘭西

作爲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底根本大法，法國新憲法，已於本月十三日由公民表決通過了。現在祇待依照這新憲法成立正式的政制，第四共和國政制。

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於一八七五年，由此憲法正式成立的政治到一九〇九年希特勒政陷巴黎後告終。現在有了第四共和國，但能支持多少年呢？能像第三共和國一般長壽呢？還是像第一共和國（一七九二——一八〇四）和第二共和國（一八四八——一八五二）一般短命呢？或更短命些？

我們試問溯法國「解放」以來，以憲法爲中心的政治鬥爭。

去年十月，法國選出了第一次制憲會議，共產黨佔據第一黨位置，社會黨次之，人民共和運動又次之。臨時總統戴高樂爲了起草憲法問題，與制憲會議中佔多數的黨派發生衝突，憤而辭職，制憲會議選舉社會黨領袖古金代替他。但起草的憲法於今年五月舉行公民表決時，被否決了。戴高樂所屬的黨，人民共和運動，在這半年來努力增長得迅速

，號召公民反對這個憲法。

今年六月，選出了第二次制憲會議，資產階級底人民共和運動從第三黨地位一躍而爲第一黨地位了，他的領袖皮杜爾代古金做臨時總統了，新的制憲會議選就人民共和運動黨要求，重新起草憲法，雖與舊的憲法不同，但仍未能符合戴高樂底願望。戴高樂要求的主要是擴大總統權力和兩院制。新憲法僅採用了兩院制，而未曾擴大總統權力，所以表決以前，戴高樂號召國民投票反對票。但是人民共和運動中皮杜爾一派是贊成新憲法的。此次投票結果，新憲法終於通過了。

法國政治危機從此解決了麼？還早得很！

爲憲法的鬥爭是階級鬥爭一個部分，但并非決定一切的部分。第三共和國憲法所以能施行六十七年之久，是因爲憲法通過以前，法國階級鬥爭已因巴黎公盟失敗而告一段落，憲法不過是反映這已經確定的局勢而已。但是現在，法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鬥爭尚未進入於決勝負的階段。第四共和國憲法，與第三共和國憲法相反，并非階級鬥爭告一段落後的產物，而是當前階級鬥爭底一種插話，不僅不會結束鬥爭，反而要更加推動鬥爭的。大門爭還在前面哩！

第四共和國政制之不能穩定，我們已經可以從此次公民表決看得出來了。首先，贊成票比反對票多得有限，贊成票僅佔全體票數百分之五三·六，反對票也佔到百分之四六·四。反一句話說，法國公民幾乎有一半的人反對新憲法的。其次，棄權的人，此次祇有一千七百十萬人，棄權的上次佔百分之二〇，此次則佔百分之三〇了。在如此情形之下，通過的憲法重加修正，也是可能的。如此，連爲憲法的鬥爭也是未曾終結的。

新旗 第十期

在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之下，法國無產階級大一致是投票贊成新憲法的。但這祇能說明改良主義在法國工人中保有如何大的影響罷了。

有人以爲新憲法中規定工人有加入工會和參加管理生產等權利，總比第三共和國憲法或其他資產階級國家憲法好些，總是值得工人贊成的。這是改良主義的看法。

革命者并不排斥改良，但在政權問題上，在憲法問題上，是沒有改良可言的。沒有甚麼代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同利益的憲法，同樣也沒有甚麼代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同利益的憲法。不僅憲法中參加若干工人權利，沒有改變其資產階級性質，即使把蘇維埃制度合併到議會制度去，如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後改良主義者希爾費丁所擬訂的，其資產階級性質也是沒有改變的。

一八四八年革命起後，大家忙於宣佈共和國時，有個革命報紙說道：「現在是革命問題，不是共和國問題。」這話，不僅對一八四八年的法國說是對的，對現在的法國說也是對的。現在法國無產階級對付的問題，是如何根本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問題，而不是如何在資產階級憲法中增加若干工人權利問題。工人權利，我們是需要，但資產階級憲法，長時期政制所根據的根本大法，則無論其中含有多少工人權利，我們都不能投票贊成，祇能投票反對票。革命的工人投票反對票，與戴高樂派反對分子投票反對票，表面上雖是一樣，但意義是完全不同的。法國即將根據這新憲法，於十一月十日選舉正式的國會，正式總統，並成立正式的政府了。政治的鬥爭不久又要以此選舉爲中心而爆發出來。我們希望法國無產階級在這一選舉中解除改良主義的影響，而走上革命道路。

無產階級填補「真空」

但是黨業底覺悟雖然低於一九一八年，黨業底經驗則高於一九一八年。『戰爭和法西斯所剪斷的線索，黨業於其剪斷之處連接起來。』過去鬥爭之最進步的形式，從此不成爲鬥爭終點了，而成爲現時期黨業行動底出發點了。這點，在意大利表現得最明顯；那裏，鬥爭是從『蘇維埃』和『兵士代表會』之成立及黨業之武裝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四個年頭的革命鬥爭當中尙未能採取這種形式，或僅能零星地採取這種形式。以前黨業是很難明白武裝需要的，以前西歐革命鬥爭底主要障礙，這也是一個；但現在，在客觀條件逼迫之下，這個障礙忽然消失了。此事實也是黨業經驗較高之證明。

主觀因素之缺乏，革命黨之異常無力，當然致使史大林派和改良派領袖們能够加深這個經驗成熟和覺悟不足之間的鴻溝。這些領袖們限制了鬥爭底目標（『驅逐外敵』『國家復興』『政治民主化』等等），以此來壓迫黨業所懷抱的超出資產階級社會框框以外的願望。他們沿着這條道路努力把黨業拉回到更『妥適的』鬥爭形式去，……或純脆說黨業不必鬥爭！

然而這些反革命領袖所以能够施行那種惡毒的影響，那種影響所以能够傳播而具有決定性，祇因事變本身對他們有利。這是主要的因素。我們分析了黨業鬥爭形式，其起源及其社會性質之後，現在回到我們的出發點來，即：鬥爭底規模小，又不互相協調。最後分析起來，正是爲了這個因素，反革命干涉（英美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蘇維埃官僚，工賊領袖）才能得到如此之高之效驗。要明白這中間的作用，我們必須尋出黨業暴動底出發點。這個出發點是不難尋出的。事實上，無論何處，黨業於動盪不多都是開始於德國軍事機構已經撤退或瓦解，而英美軍事機構尙未到來或鞏固這個階段中間。此時『人和事』之治理上留下一個『真空』，而黨業表示一種傾向，要建立自己的機構來自填補這個『真空』。

在捷克和意大利，從德國潰敗到資產階級中央政權建立，共有好多天距離，所以能够形成一種更鞏固的變權政制。在巴黎，則祇有二十四個鐘頭距離，所以祇能形成一種變權政制底核心。一九四四年八月間作戰期內，凡聯合國軍隊連續不停之戰，黨業自治機構維持得最長久，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邱吉爾就是如此繼續鞏固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宣告道：

歐洲革命之第一階段 (下)

Ernest German

『我會請他（羅斯福總統）注意這個事實，即德國政權從雅利安撤退到有組織政府建立於雅典，這中間若是距離得太長久，以『A』和『B』兩端派共產黨人多半要佔領雅典的。……』

這裏說的，不僅是有關於某一事件，而且是有關於資本主義實行社會內的最基本傾向之一。無產階級，不管其覺悟程度如何，爲客觀條件所逼迫，勢不能不努力把社會領導權抓在自己手裏。近三十年的歷史不是別的，正是無產階級努力要負起這個歷史使命而未能成功的後果。這種努力所以未能成功，是因爲沒有合適的革命黨來領導他。那麼，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之下，即在沒有穩固的資產階級政權之下，這個根本的傾向首先表現出來，又有甚麼奇怪的呢？

他方面，各個國家這種『真空』發生於不同的時間，也是不可避免的。很容易預見着，在完全缺乏國際無產階級有力的領導機關條件之下，甚至缺乏一個莊重的領導機關之下，暴動總要帶着孤立的和片段的性質，以此幫助了各種反革命進行其工作。要把運動抬高至普遍的水平，至歐洲的規模，則必須有個普遍化因素。在事以發生以前好久，我們就認爲惟有德國革命才能供給這個普遍化因素。所以歐洲各地變權政制零碎產生，而且比我們所料想的更快些被人撲滅，——其基本的理由正是在於沒有德國革命。

德國無產階級是完全消極的麼？

德國沒有革命，乃是事變沒有依照我們預料般發生之主要的理由。此點，所以必須仔細分析，在事實光輝之下來分析，而非在『國際』內這傾向或那傾向所首先設定的圖式下來分析。

德國沒有革命，即是凡對此問題發言的人都以一種意見爲出發點，而此意見在事實光照之下是不能立足的。這就是說人們一致認爲：當納粹機構瓦解時，德國無產階級『消極地』袖手旁觀。現在，我們還不能給無產階級部分的行動開一筆總帳。但我們所知的事實已經足夠推說那關於德國無產階級完全消極的意見了。人們說，經過法西斯十二年專政之後，德國無產階級底『階級覺悟』已經『耗竭』了，所以消極旁觀。可是我們知道，在俄國佔領區，『及其他地方』，如倫敦『經濟學家』所報告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納粹政權瓦解之後有社會革命精神的示威發生。工人佔領工廠，同納粹或附納粹的經理人員算帳。同類事情也會發生於魯爾區。』

大戰後的蘇聯

唐 威

在歷史提出的各種問題中，關於蘇聯的問題可說是意見最分歧的了。關於其他問題，自然也有分歧的意見，甚至有更多分歧的意見，但這些意見分歧，是直接間接與關於蘇聯問題的意見分歧有關係的。最後分析起來，革命陣營中，對於蘇聯的認識不同往往決定了對於其他問題的認識不同。所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注視蘇聯底發展，時時刻刻檢查我們對於蘇聯的認識。經過了此次大戰，如此重大的事變，以後，蘇聯究竟變成怎麼樣了呢？這是每個人必然要問的。

我們對於蘇聯的認識

我們一向怎樣認識蘇聯呢？

蘇聯并非社會主義的國家，牠未曾建設好社會主義，以一國之力牠而且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

建設社會主義，乃是全世界各國底共同工作，至少若干重疊的先進國家底共同工作。一個國家，無論領土如何廣大，人口如何衆多，資源如何豐富，是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即使有了無產階級專政，即使銀行，工廠，礦山，鐵路及其他交通工具，土地，以及對外貿易權，都收歸國家所有，這個國家仍是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因爲以上那些不過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政治和法律前提罷了，若是缺少經濟的前提，若是沒有有計劃的國際分工（至少若干先進國家間的有計劃的分工）把社會勞動力提高到現在資本主義達到的水準以上，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一個國家革命成功是可以獲得的，但經濟前提則非至少若干先進國家革命成功不能獲得。

以上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見解，乃是蘇聯創造者列甫和托洛次基二人底共同見解，而且是他領袖（連史大林在內）底共同見解。一九二四年春天，史大林講演『列甫主義問題』時，還是這麼說的。『列甫主義問題』初版明白寫着：『非各先進國無產階級共同努力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可是，同年秋天，史大林改變意見了，他提出了新的理論，即『一國社會主義論』，認爲在蘇聯，連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經濟前提也是足夠的。從此以後，關於蘇聯底根本路線，就形成了兩個主要營壘。

一方面，從『一國社會主義論』出發，認爲蘇聯關起門來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了，所以放棄了世界革命危險了。將蘇聯國家利益置於一切之上，結果不僅社會主義建設不成功，連蘇聯國家，連十月革命遺產，也陷於危險了。

他方面，從『世界革命論』出發，認爲十月革命不過是世界革命底發端，俄國無產階級既然奪得了政權，就應當以國家力量發動和促進其他國家底革命，不僅社會主義能够由此建設起來，而且蘇聯國家也祇有如此才能夠維持存在。

我們是屬於後一種主義。

新編 第十期

我們知道，當紅軍快來到時，黠克倫堡的農業工人會奪取了他們幾百年來所想念的土地。我們知道，同時薩克遜邦工人也曾豎起紅旗在他們的工廠屋頂上，而且選出了名副其實的蘇維埃。（比利時托派中有一個人會參加一個工廠委員會，那是當俄國軍隊開入德勒斯登時選出的。此委員會中還有好多左派共產黨人，他們是反對史大林主義的。）我們知道，地方性的國內戰爭差不多到處都有發生，即一邊是另一邊 Yowler 或國防軍之間的戰爭。我們知道，一九四三年，漢堡已有一次暴動被鎮壓下去，最後，而且最重要的，我們知道，當納粹機權崩潰時，帝國主義軍隊和蘇維埃官僚軍隊就於全國各部分設立更鞏固的而且同樣殘酷的警察機構了。在以上種種條件之下說來，我們還要把德國無產階級底勇敢態度稱爲『普遍消極』，那是真正可恥的。

他方面，德國沒有發生多少普遍性的行動，也是很顯然的。人們拿兩種理由來解釋這個事實。一部分人把德國沒有革命，歸咎於主觀的因素，即說經過法西斯十二年專政後，工人完全沒有組織，無產階級『階級意識陷於瓦解』。另一部分人則歸咎於客觀的因素。我們先來檢討這第二種理由，然後才能證明連第一種理由也是錯誤的。

德國沒有革命之客觀的原因

帝國主義戰爭終結時能爆發革命，其客觀的前提約有下列數種：社會矛盾加劇（無產階級集中化，其在全國收入中所佔部分愈來愈多，等等），戰爭影響增加貧困和破壞，後方和前方士氣頹喪，軍事警察，國家機構瓦解等等。這些前提并非突然發生的，而是好多因素所影響的整個過程之產物。這些因素交互影響，結果人心愈來愈絕望了，士氣

戰後蘇聯地位比前強固了麼？

現在蘇聯執政的人，是屬於前一種主張。他們在戰前就宣布：蘇聯一國「社會主義」已經建設成功了，已經開始階進「共產主義」階段了。戰後，蘇聯得到了勝利，擴大了領土和勢力範圍，抬高了國際地位，執政的人及其隨從者更加誇耀其成功了。看哪，無帶世界革命，蘇聯仍舊愈來愈加強大了。

蘇聯果真比前強大了麼？國際地位抬高，領土和勢力範圍底擴大，不是表面現象的麼？事實上，蘇聯不是比前更加削弱，更陷於危險了麼？我們試分內外兩方面來說明。

從外的方面說，蘇聯現在已陷於帝國主義底完全包圍中了。以前國境周圍固然是帝國主義勢力，但那是五六國帝國主義底勢力，他們中間利害衝突非常厲害，不能團結一致來進攻蘇聯，蘇聯反而可以利用他們中間的矛盾，以維持自己存在，而且相當擴充自己力量，但現在則包圍蘇聯的，是美國一國帝國主義了，美國帝國主義做美國帝國主義底助手，但完全聽命於美國。

大戰後期，即德國失敗形勢已定時候起，美國帝國主義政策便以對蘇為中心了，一方面從外面建立基地，包圍蘇聯，一方面設法破壞蘇聯社會基礎。戰後一年多，所有重大的國際問題都直接或間接與美蘇鬥爭有關的，而此鬥爭又都與美國包圍蘇聯有關。

超空堡壘出現之後，北極海已經不是安全防線了。海對邊是格陵蘭，加拿大，阿拉斯加。格陵蘭已從丹麥之手轉入美國之手了，美國在那裏設了軍事基地；加拿大與美國聯防，那裏的軍事基地可供美國使用；阿拉斯加是美國自己的領土，美國在那裏的軍事建設更不遺餘力。

在歐戰，德意二國，英美都駐有重兵。在南歐，希臘問題，特里斯特港問題，紅軍佔領諸國政制問題，屬的甚多，倘若不是為了包圍蘇聯。

在西亞，伊蘭問題，全體阿拉伯國家問題，繞經海峽問題，也是英美為了包圍蘇聯需要而激起來的。在東亞，則美國已經管制了日本，南朝鮮，華北，南滿，中國諸海港，更不必說太平洋所有戰略基地了。

過去蘇聯各方面邊境所遇到的是不同的敵人，現在則處處遇到美英聯軍及其附庸軍隊了。過去二十八年來帝國主義者所念念不忘的大包圍，終於在此次蘇聯戰勝之後實現出來了。過去蘇聯可以在外交上主要手段，聯合這幾個帝國主義反對那幾個帝國主義，或聯合那幾個帝國主義反對這幾個帝國主義，可是從此以後不能再要外交手段了，再沒有他系的帝國主義可以聯合了。從這一點說來，可見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現在是比以前各時代都更重大的。

從內的方面說，戰爭也加強了經濟上那些「親資本主義的」因素，即加強了那些因素，牠們是敵視蘇聯那種從十月革命繼承下來的經濟基礎的。

這種親資本主義的傾向尤其表現在農業方面。在陷陷區，地引機及其他農業機械被德國人搶去了，土地被德國人分了，經濟組織混亂了，以致集體化底物質的和精神的基礎受了損害，至今解放了以後，仍舊流行着個人耕種方式。富農分子拾起頭來。其他未曾陷陷的區域，則為了必需品底缺乏，黑市底猖獗，投

愈來愈強了，聚集愈來愈反對戰爭和政制了。聚集欲得仇人而甘心；他們的仇恨表現在無量數個發事件上；他們試探統治機構底抵抗力，經過一連串的经验之後就將他們的力量集中在直接任務上，即推翻現政府和結束戰爭。

凡是每月不斷地留心德國軍隊和德國無產階級情緒變化的人，一定能夠看出，德國，從史大林格拉失敗以後到意大利革命和諾曼狄登陸以前，確實發生了這個過程。革命思想迅速傳播，兵士和工人熱烈接受革命思想，一家德國工人報紙秘密出版，小抗議運動日益滋生，工廠罷工（大多數為了糧食）愈來愈多，——這一切表明了聚集情緒大體上同一九一六年俄國和一九四二年意國一般。

這許多零碎的運動要能匯合為一個更廣泛的運動，帶有一個補充的因素，朝鋼鐵機構底削弱。但是當各種條件配合起來最有利於一個普遍的革命運動時候，鋼鐵機構並沒有削弱。大多數德國軍隊，無論在歐洲海岸或內地，并未會戰敗。英美空軍轟炸并未能瓦解行政生活。納粹黨仍舊堅固地保持着統制權，蓋世太保仍舊在其權力底頂端，雖然「工作」過重，負担不起了。

但是從此時起，即從聚集情緒「最成熟」能發動革命時起，亦即從一九四二下半年起，過程突然變為其反對的了。從前一切因素，有利於革命底觀點所提之反目的，從此開始破壞這些前提了。空軍轟炸，到某一定程度可以使聚集從麻木狀態醒轉來，使他們脫出其個人願感之狹小圈子，使他們明白種種艱苦具有政治性質，必須求得政治解決。但是過此程度，則空軍轟炸反而要陷聚集於頹喪，使他們脫出社會生活，使他們墜入於最可悲的身心消沉中，使他們變成爲一羣孤立的個人之混合，每人祇爲一己生存去鬥爭。軍事發展和失敗造成的緊張

徹底普通，已經造成了條件，使集體農場內部產生一個新的剝削階層。好多農民居然能博獲了幾十萬以產幾百萬羅布。當農底「獨立」精神跟隨財產增加而增加。許多集體農場不肯生產國家指定的數額，甚至拒絕將生產品交付於國家，這就開始脫離蘇維埃經濟而獨立。

在戰中，國家無法奈何這種獨立精神，既好讓步，甚至修改法律以取悅於富農。例如一九四五年五月蘇聯頒布一個命令修改遺產法。馬克思說過：『遺產乃是生產機關私有制社會底經濟組織之法律的反映』。蘇聯蘇維埃政府成立初年就命令廢除遺產。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的命令宣布廢除遺產，但為了救濟殘廢者則未成年者底生活，暫時允許一萬金羅布以下的財產可以遺留給死者直系親屬，即死者底未成年的人或寡母或孤兒女或曾孫兒女，以及未亡的配偶和殘廢的家庭成員。僅僅上舉的人有資格接受遺產。超過一萬金羅布以上的財產則屬於國家所有。採取新經濟政策以後，以上的暫時手段遂變為長久的法律了。（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命令。）官俸當政以後，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有命令取消一萬金羅布之限制，但仍以遺留給上述直系親屬為限。到了此次，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則廢除「未成年的」之限制了，凡直系親屬都能接受遺產，若無直系親屬，死者底兄弟姊妹亦能接受遺產。此外，死者又能預立遺囑，於無親屬時，將其財產遺贈於「任何人」，即不僅僅親屬，凡不相干的人都能接受遺產了。這已經同資本主義國家遺產法一樣了。遺產底合法化自然要加強資本主義傾向。

不僅農業如此，工業亦然。在戰爭期中，工業沒有一個預先定好的計劃。在重工業方面，結果是那些國家既蘇斯意來愈加獨立，愈來愈傾向於不徵詢中央機關而私自訂立契約。在輕工業方面，則是愈來愈減少集中化，地方當局指揮輕工業生產當地需要的消費品。在銀行方面，為了強迫儲蓄政策（減少通貨膨脹），也愈來愈加強獨立了。銀行傾向於實行「自己的政策」，即依照自己一家營業底虧盈來規定利率，而非向以前那樣全國利率一律了。如此下去必然在投資政策上發生差等，更進一步去瓦解蘇維埃經濟。

經濟上親資本主義傾向加強，政治上反對傾向自然跟着抬頭了。戰爭初起時，史大林已不得不對軍官們讓步。政治委員廢除了，指揮統一了，軍官權利擴大了（就地槍斃逃兵的權在內）。以後，軍隊中愈來愈不平等。軍官和士兵食宿分開，餉額之差異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戰爭中，教堂重開了，而且受政府保護了。流亡國外的白黨取得蘇維埃公民資格了。沙文主義宣傳代替社會主義宣傳了，俄國歷史上的皇帝和將軍，過去被斥為民衆劊子手的，現在被尊奉為英雄了。至於第三國際解散，『國際歌』為『蘇聯國歌』所代替，以及最近『紅軍』改稱『蘇軍』，更不必說。

蘇聯國內這種親資本主義的傾向，自然足能够與國外包圍的帝國主義相呼應的。帝國主義者也熱烈希望蘇聯國內這種傾向能迅速長成，根本破壞十月革命遺下的經濟基礎。從國內而向外看來，現在我們明白，蘇聯表面上雖然抬高國際地位，雖然擴大領土和勢力範圍，但比較前更加削弱，更加陷於危險境地，更加需要保衛了。

史大林怎樣保衛蘇聯？

史大林領導的官僚層也已看出了蘇聯內外的危險，但其應付的方法是沒有根本效力的。

情緒，也有同樣的作用。同樣的因素，起初激起了怨望，激起了反抗意志，過了某一點就造成麻木和麻木了。我們也可以拿同樣的話應用於其他因素，他們起初是加速「民族團結」之瓦解過程的，結果則不僅瓦解了帝國主義國家，而且瓦解了社會生活和階級凝聚。

還有一個很重要因素，即對德戰爭之延長遠成的客觀影響。城市中心被重大毀壞了，勞動人口分散了（當德國投降時，大多數城市人口不及戰前百分之五〇），甚至不及百分之三〇，例如柏林人口只剩一百五十萬或二百萬，弗蘭克人口只剩二十五萬等等），大多數工人被動員而加入軍隊了，工廠工人成分變複雜了（大多數是外國人，戰俘，女人和小資產階級分子。）

最後還必須算入帝國主義宣傳和史大林主義宣傳之有害的影響。這些宣傳，雖然不像一般人所說的，有使德國工人與希特勒「團結」之影響，但確實置德國工人於鋼鐵和煙火之間，讓他們除了「無盡的恐怖」之外望不見甚麼前途。

試把以上所說總結一下：當爆發革命運動之客觀的前提大多數已在戰爭過程中產生出來時候，卻有一個因素缺乏：主要的因素，即鋼鐵機構之削弱。鋼鐵機構沒有削弱，於是，戰爭發展下去，其他的前提就不是促進成熟過程，而是促進瓦解過程了。達到完全成熟的革命運動，其一切客觀的前提集中於某一個點，如此才能發生爆炸，不管有無主觀因素（革命黨）存在，——這個集中，正是德國所缺乏的呀。

意國和德國：一個有意義的對照

我們是說那些主觀條件（十二年納粹恐怖之結果）僅有次要的意義麼？不是的！在革命運動爆發

他們應付外來的危險，自然不用蘇聯初期的世界革命政策了，也不用後期的聯合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反對那些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了；他們用的是一種新政策：設立外國地帶。這就是說，在蘇聯邊境和美英帝國主義根據地中間各方面設立一個地帶，由紅軍佔領着。蘇聯底外交政策首先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在德黑蘭會議上，史大林提出這個要求，想以「和平的」方法得到他，即想取得他的帝國主義「盟友」底同意。羅斯福和邱吉爾明知戰爭結果，紅軍將受更大的損傷，蘇聯將漸漸削弱，那時將更容易對付，於是就同意史大林底要求，允許給他很廣闊的「勢力範圍」：波蘭，德國東部，多瑙河階國，希臘以外的巴爾幹諸國，滿洲，以及內蒙。

紅軍起初開入這些外國地帶時，革命運動起來迎接他；工人佔領工廠，成立工廠委員會，農民佔領土地，但是蘇維埃官僚害怕革命，正不減於帝國主義者。官僚們不但不支持羣衆底革命行動，反而幫助富地的資本家去恢復法律和秩序，或用武力（如在波蘭），或用欺騙（如在捷克）。此外，官僚們又把這些地帶底物資搬運到蘇聯去，使受了職工的民衆更加陷於困乏。於是當初歡迎紅軍來的工人，都失望了。

紅軍并非來解放這些國家，并非來發動革命，來建立新的蘇維埃政權，不過是從純粹軍事的意思來建立外國地帶罷了。但這個政策是無用而又有害的。他是無用的，因爲在航空發達，原子彈出現的時代，外國地帶是不能保衛蘇聯的。蘇聯外國地帶來抵禦原子彈，正如拿大刀來抵禦坦克一般。他是有罪的，因爲他使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衆對於蘇聯感覺失望，把蘇聯看做同帝國主義國家一般。如此說來，他不僅不能減輕外來的危險，反而增加外來的危險了。

官僚們應付國內的危險，便是用新的五年計劃（第四次）來阻止親資本主義傾向獨立傾向，又用新的「肅清」來制裁這個傾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表現。

大家知道，第三次五年計劃未曾完成，德蘇戰爭就爆發了，而第四次五年計劃至今年春天才提出來，這中間是斷了好多年的。上面已經說過，計劃斷絕期間，獨立傾向如何發展，工業，金礦諸方面漸漸加強，將陷蘇維埃經濟於瓦解了的。現在新的五年計劃實行了。可是我們檢查一下，也可以看出蘇聯經濟經過此次戰爭是如何削弱的了。下面是上次計劃和此次計劃所定五種重要生產之比較：

生 鐵	鋼	煤	油
一九四〇年實際生產	一一五,〇〇〇	一八,三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九四二年預定生產	二二二,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一九五〇年預定生產	一九五,〇〇〇	二五,四〇〇	一七,八〇〇
	二二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二四八,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三五,四〇〇

單位：百萬噸

時候（即在革命之第三階段），主觀因素是沒有如在第二階段那麼決定意義的。但她仍有很大的作用，即仍能使革命過程加速，或使之普通化。她可以代替許多缺少了的客觀前提，而致使第一個革命潮早點勝利，即使沒有其他一切前提，亦能勝利。無疑，德國若有一個強大的革命黨存在，則德國工人和外國工人必會形成一個整體，而差不多因一切大工廠糧食問題而爆發的罷工亦必能因此迅速展開。兵士之中若有一個革命組織存在，即使比較小些，也是更重要的。這樣一個組織必能於七月二日流產的更變時候，激起國防軍大暴動。主觀的因素能輸入新生活於客觀的前提之內，革命運動，即使在上述的轉捩點之後，亦能够勝利的。

他方面，若是主要地拿沒有主觀因素來說明德國沒有革命，那也就是絕對錯誤的。我們試拿意國來同德國對比罷，就可以看出，即使法西斯統治了二十年，即使「社會主義傳統」更多「消失」，即使革命組織乃至全國性的反法西斯秘密組織雖然無存，也是不能夠阻止客觀前提所決定的革命運動之爆發的。

不錯，德國和意國有好多差異點，是我們理解這兩國事變發展不同過程時所必須注意的。納粹政制完全摧毁了一切反對中心，連資產階級內部的反對中心也不能存在。莫索里尼政制則未曾到如此恐怖後果。納粹政制嚴密統制了全部國家軍事的，警察的和行政的機構。在意大利，則軍隊高級幹部，貴族，密切聯繫於薩伏依王朝，高級教士密切聯繫於梵蒂岡，二者以同等程度免除了德國法西斯制。在德國，納粹組織許多方面都超過了意國組織（在糧食，教育，宣傳等方面）。但所有這些都是量的差別，并未能改變這兩國局勢底基本共同性：羣衆沒有自己的組織，就不能對抗恐怖政制；這些差別

上表中，一九四〇年實際生產數字是根據官方統計的，一九四二年為第三次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因戰爭未實行，數字是計劃訂時預定的；一九五〇年則為第四次五年計劃最後一年，數字則是現在預定的。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即使五年以後完全依照計劃實行了，除煤炭之外其餘四種的生產，與戰爭前實際生產相較，增加得有限。五年之後拚命增產結果，也不過趕上戰前水平罷了。於此可見，現在，今年，蘇維埃經濟是如何遠落於戰前水平下面了。但五年計劃之恢復至少能阻止經濟上親資本主義的獨立傾向麼？我們還不說。

政治上的制敵已轟動世界了。首先，以史大林為中心的官僚機構更加強大起來，表現「左傾」，即打擊少壯派軍官及愛國主義思想。上面已經說過，戰爭初起，史大林對於軍官的種種讓步了。戰爭中，黨對於軍的統制，似乎大大鬆懈。可是戰後，黨又恢復其對於軍的優越地位了。新改組的蘇維埃政府中，沒有一個少壯軍官，僅有的兩個軍官，伏洛希洛夫和布登尼都是革命和內戰時期留下的老頭子，至於那些「戰爭英雄」，則都被派往外省去，不使之影響政治生活了。進攻柏林的總司令朱可夫元帥被免職，派去奧德薩當小軍區副司令。空軍司令諾維可夫元帥也被免職了。

這個制敵反映到思想上的，就是愛國主義宣傳突然停止，而恢復了史大林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許多報紙雜誌被勒令停刊，為了過分歌頌帝制時代的史蹟和英雄。黨中央委員會通過特別的議決案，「斥責這種惡劣傾向。」藝術方面，歌舞，音樂，戲劇，繪畫，電影，建築，也受了斥責。極好的電影，「可怕的伊凡」，被禁止放映了。跟着斥責來的是「肅清」。若干政府機關，以及若干生產部門，都有負責人具被免職，逮捕或處刑。現在還在進行中，不知將來到甚麼地步為止。

但「肅清」運動，不但是對付右派，那些親資本主義的分子，而且是對付左派，對付那開始覺醒的羣衆。史大林每次加強其壓迫機噐時總是左右同時打擊的。

關於蘇聯羣衆開始覺醒的消息，自然難得透露出來，但我們從散佈過的消息也可看出端倪。例如有一事件未被檢査掉的瑣事是很富於意義的。

「是某次加里甫到一個羣衆會場演說，有個女人站起來問他道：『我們赤腳走路，或穿蘇維埃編的鞋子，你爲甚麼有那麼光亮的皮鞋穿？』」

一是雅洛斯拉夫汽車廠開全廠大會選舉工廠委員會主席時，副主席落選了，雖然有官僚工會替他撐腰。新選的主席立即被官僚工會免職，而且受了極嚴厲的批評。但重選時，工人還是選舉他，不選舉工會提出的舊主席。

羣衆覺醒是不足爲怪的。戰時，有幾百萬蘇維埃公民第一次來到工廠，看見了資本主義世界。他們發現別國人民生活得比他們更好些，別國勞動生產力比蘇聯更高些，於是明白落後的俄國是不能單獨建立社會主義的，必須得到諸先進國家援助。蘇聯領導者必須擴大世界革命於其他的國家，「一國社會主義論」則是對閉世界革命道路的。同時，又有幾百萬人在國內忍受種種痛苦和犧牲，現在戰爭停止了，蘇聯勝利了，他們以爲從此可以改善自己的命運，享受勝利底果實。對這兩部分人，史大林就有給與失望。他們將爲失望而起來鬥爭。

也許可以解釋巴多里奧政變爲甚麼能成功，而史陶芬堡政變爲甚麼會失敗，卻決不能解釋意國羣衆爲甚麼能於莫索里尼倒台以前幾個月舉行大規模罷工，而德國罷工運動則未曾超過孤立而參差的行動階段。

因客觀前提漸漸消耗而致德國沒有革命；其他歐洲國家祇有參差的，散碎的，原質性的革命運動；但許多中心仍能剝立變機制核心，雖然爲了其孤立的性質，很快就被他人撲滅了；——以上便是歐洲革命第一階段底特性。（完）

唐盛譯自比利時出版的「工人鬥爭」

中國經濟發展走甚麼路線？

上月底，經濟團體聯誼會，十餘位經濟專家，以「如何建設國民經濟」爲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連久未發言的馬寅初博士也說話了。馬寅初博士是中國經濟問題第一個權威，其他發言的幾位也是有名的專家，他們的意見自然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們在文匯報讀了他們的演說底記載以後，覺得這日討論的雖以「如何建設國民經濟」爲題，但其實是討論着中國經濟前途，或如土良仲先生所說的，是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究竟走甚麼路線」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究竟走甚麼路線呢？首先發言的兩位專家伍啓元 and 陶大鏞（此次聯誼會是爲歡迎遠道兩位專家出國而開的）就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伍啓元先生認爲中國決不能走十九世紀西洋資本主義路線，即不能走自由的私人的資本主義路線。爲甚麼呢？因爲現在客觀的國際環境不同了，如果放任私人資本，慢慢地自由發展，必定跟不上他國，甚至跟不上麥克沃茨扶持下的日本，甚至落在印度後面。中國全國國民收入現在經

對外，採取「外國地帶」政策，對內採取左右夾攻的「肅清」政策，這不是保衛蘇聯的有效方法。

蘇聯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究竟是建立在十月革命遺產上面的。重要的生產機關已經收歸國有了，無產階級專政身上雖然生了官僚毒瘤，這毒瘤雖然有致命危險，但直到現在，毒瘤所寄生的母體還是活著。我們仍當盡力保衛牠。我們要保衛的是十月革命底遺產，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毒瘤。

現在比在任何時候都更明顯，祇有世界革命才能阻止美國帝國主義對於蘇聯的進攻了。為此，蘇聯必須重新舉起國際主義旗幟，必須回到列甫去，必須恢復蘇維埃民主制度。

托洛茨基很早說過如下的話：

「保衛蘇聯，在原則上是與準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相一致的。我們堅決拒絕「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個無知的反動的史大林主義幻想。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救護蘇聯去建立社會主義。但世界革命同時也必然要把克羅溫宮寡頭政制掃蕩了去的。」

我們的真正美國朋友(上)

劉默

從一個起碼的真理說起

「友乎？敵乎？」這個十年前流行一時的對日問題，現在又對美國提出來了。對這問題，中國的特色人等，有各色各樣的回答：大人先生們說，美國「頂好」，她是我們的知己；但另一些人說，美國「頂壞」，她是一個假冒為善者，實際上是我們的死敵；有一部分人說，羅斯福才是真正的中國之友，杜魯門這庸才够不上交情；再有一些人說，華萊士是中國的朋友，貝爾納斯是我們的敵人。

衆說紛紛，莫衷一是，究竟是誰友誰敵呢？

我們覺得，這些說法都不對。因為說這些話的人，除了少數別有用心以外，統統忘記了一個起碼真理：美國不是一個個體的整體，同時也不是些單獨的個人。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是由利益敵對的幾個階級構成的。美國的政治家，也正如其他國家的政治家一樣，不「各憑」自由意志「行事，而是從屬於階級，替他所屬的階級說話的。因此，我們不能說整個的美國是我們的朋友或敵人，而祇能說，美國的那一階級是中國的朋友，那一階級是我們的敵人。同樣，我們不能說同屬於美國統治階級的政治家中，某幾個當權要實行帝國主義政策，某幾個却根本違反這個階級的利益。

說美國是「頂好」的，那倒很少由於腦筋不清，而大多因為利益使然，原來他們，即那些位高多金的中國統治者，其存在，及其大部分力量，是依靠着美國統治者的。說得更清楚些，他們的地位權勢，是依靠着他們推行美帝的對華政策，從而獲得存在與發展的。如此，能不說人家「頂好」嗎？此種華爾街巨賈

有幾十萬萬美金，以此來發展私人的自由的資本主義，也是不行的。所以他主張發展國家資本，但他聲明國家資本並非現在人們反對的官僚資本。

陶大鏞先生則認為必須走自由資本主義路線。為甚麼呢？因為他認為必須先將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介紹到中國來，等到中國生產力充實時候，才能走向社會主義。

章乃器先生附和陶大鏞先生這個意見，他於陶大鏞先生所舉理由以外再補充一個理由，即是說：「歷史是有階段的向前發展；假如我們要想跳過資本主義階段走上社會主義，那是不可能的。」章乃器先生如此偏愛自由資本主義，以至提議修改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他說：「我們應多研究平均地權，少談點節制資本。」因為「對民間放任比較屬官僚統制好。」

吳清友先生起來反駁章乃器先生底「不可跳過階段」說。他認為跳過歷史階段是有先例的，他舉蘇聯境內落後小民族經濟發展做例。但說到中國經濟問題，他的結論仍舊是主張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因為中國現在仍然是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但他補充說：中國要發展的是「新資本主義」。

最後，施復亮先生提出兩條道路，一條是改良，一條是革命。他認為協商會議底五項決議是改良道路。「我一點也看不出社會主義來。」他認為中國是能走這條改良道路的，因之也能發展資本主義的。

其他發言的幾位經濟專家，關於這問題，並未會超出以上諸人所說的範圍。

專家們相互間雖然有論爭，但總的結論是一致的，即都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祇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陶大鏞和章乃器兩先生明白主張私人的自由的資本主義不必說；吳清友和施復亮兩先生也是主張資本

和我們中國的「買好」交誼，不表我們論述之列。

說美國「壞」，看怎樣講法。如果演說說，那是錯的；但若將「美」的意義了解成獨占資本家們操縱的美國政府，那當然有理。問題是要指出當政的美國和被統治的美來。有些人看到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在華的行所為，憤怒了，罵牠「壞」，稱牠「敵人」，意思中包括整個的美國與全體的美國人。那是大大地了。這是僵硬的民族主義的毒，是無益而有毒的。因為我知道，美國除了少數當權的獨占資本家及代表們之外，還有最大多數勤的美國人，他們非但不有意張帝國主義，而且因為地位使然，利益對，是根本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的。我們如要反對帝國主義，正需要和他們攜手，不，但此也，甚至非等不可，因為，如果得不到他們的聯絡，中國的一切真正其革命性的運動都定着要失敗的。

至於羅斯和杜魯門之間，華萊士和貝爾斯之間，那不該勉强分出誰誰誰來。不錯，論手段，論才能，尤其是規模，羅斯福與杜魯門的差異可以道里計；華萊士和貝爾斯之間，也確實有許多政見上的不同，表看，這些不同竟是很根本的，是，誰假使以為那些差別和同竟是大到這個地步；竟可以拿「民主」「非民主」，「帝國主義的與」「非帝國主義的」名稱來加區別，那就錯到不知那裏去了。我們得認楚：就美帝欲使中國淪為殖民地——根本上說，美國資階級政治家無論那一位上台，都不會有毫變動的。

因此，站中國最大多數的工農勞苦大群的利益上，亦即站在中國民族立利益上，獨立金融資產階級的美國是不能成爲我們的朋友的（自然他們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朋友）這一階級中的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做我們的友，唯一地與真正地能成爲由之友的，乃是美國的工人階。我們祇能在這一階級身上找到我們鬥爭幫手，我們不能寄託任何希於美國的統治階級，或這一階中的任何一個政治家。

美的工人階級

如此說來，中國革命前途既然和美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有着這樣密切的聯，那末中國革命分子，尤其是中國的工人命家，自然必須明白美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誰都知道，美國是自然世界上最富強國家。富強的主業基礎是空前遠的工業生產。這基礎造成了最強大的美資產階級，同時也造成了最哭的工人階級。就目前說，美一切經濟部門中的工資勞動者，共約六千人，占全體人口的三分之一，僅僅這個數字，就已說明了工工人階級能起如何決定性的作用了。

不過由數上表示出來的力，如果沒有組織起來，或者覺醒過來，那末只是潛在的，因之不能發生積極作用。用哲學上的話來說，一個階級的力量，祇有通過了鬥爭與組織後，才能從「自在」的地位轉變到「自爲」的地位。祇有明白地懂得了自階級的利益，積極爲這些利鬥爭，這個階級才算是有力量。光是數上的龐大不能就此發揮出力果。

因此，我擬從組織與鬥爭方面來看美工人階級。請到工人階級的組織，一個是經濟的：工會；另

主義的，雖不一定是自由的個人的資本主義；似乎當時有人誤認伍啓元先生去社會主義，但這是冤枉了他。不錯，他提出了「社會革命」口號。他說：「無論說世界潮流着，或國內情勢着，經濟建設必須包括社會革命的內容。」又說：「經濟建設需要朝社會革命走。」以後，陶大鏞，馬寅初，章乃器，吳清之諸先生，都提「社會革命」，而且都表示同意了。但這裏所謂「社會革命」是甚麼呢？是指社會主義的革命麼？是指「十月革命」式的沒收資本家所有的生產機器社會公有的麼？決不是的。因為伍啓元先生稱十月革命「基礎上建立的蘇俄亂濟制度爲「共產主義」。他不選共產主義。他說：「必須在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選擇一條路。」他說國現在也要走上這條道路。這條道路不是別的，是他所憧憬的「國家資本」，亦即是壟斷資本主義（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乎？」之最高的表現。

把英國工黨政府下的經濟和蘇聯的經濟視爲一類，是錯誤的。把這兩個國家底「國有化」視爲祇有量的差異，是錯誤的。即英國底「國有化」比現在更普遍些，更完全些，政權若未曾轉移於無產階級之手，那些國有化的業仍舊是屬於資產階級所有的。英國工黨主席拉基不久以前自己才說：英國祇有政治的民主，蘇聯才有經濟的民主。沒有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的「國有資本」，仍舊是資本主義，而且是壟斷的統制的資本主義。

可見，專家們爭論的是自由資本主義或統制資本主義的問題，決不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問題。沒有一個人主張中國經濟發展應走社會主義的路線。

然而中國經濟不發展則，要發展祇能走社會主義的路線，亦即伍啓元先生所謂紅色的急進的共產主義的路線。

一個是政治的：政黨。現在讓我們先說工會。

從 A.F.L. 到 C.I.O.

我們不想做詳盡的歷史研究。下面的祇是一幅素描：跟着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美國工人階級中形成了一個工會組織，就是報章上常能看見的所謂「A.F.L.」，即「美國勞動聯盟」。這是一個依行業為基礎而組織起來的工會。所謂行業工會，就是依工人中之各種技術不同，如機匠，伙夫，各自組織在一個會裏，那是老式的，帶有甚深的手工業行會遺跡的。這組織天然僅限於一些上層的，熟練的，有技術的高級工人，而且性質上天然是保守的。這樣的工會組織在美國存在了數十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俄羅斯的工人階級首先奪取了政權，各國工人都去傾軋起來，甚至革命了。但是美國，因為大大地發了戰爭財，美國的資本主義達到了空前發展的高度，正走過了黃金時代，她賺得的錢太多了，足夠拿出一小部分來分給工人，所以大戰後的美國工人，就一般說，非但不革命，而且更加右傾了。好些工人自備了汽車，也抽起了上品雪茄，也居然有資格吃二元一餐的晚餐。他們隔着大洋，遙看歐亞二洲的動盪，遠觀那邊階級間的狼鬥殘殺，簡直有點不甚可信的。他們相信美國式的勞資合作是最理想。於是大多數工人不參加組織，小部分工人——特種的或前進步的——則以古老的「A.F.L.」為滿足了。一九二〇年代的初期，甚至美國盛行着一種所謂「Company Union」，可譯作「公司聯合會」。這會是如此組織的：資方與勞方共同參加在一個組織裏，以協議方式解決一切問題。階級合作精神是發揮到了極點。

可惜好景不常。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使這「例外的」美利堅資本主義也知道了困難。生產停滯，物品過剩，信用破產，事業停歇，工人失業；一切一切，像瘟疫般前後相繼地來了，而且一日嚴重似一日，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美國全部銀行關門，整個國家經濟陷於混亂。

這時候，美國工人階級如果本來有健全的組織，又假如有正確的革命領導，那簡直是能夠進行革命，根本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起工農政府來的。可惜如我們上面所說，那時候美國工人階級的情形不是如此。因為從來透過階級合作的思想，既無戰鬥組織，又無戰鬥精神；且從相當高的生活標準上倒跌下來，只是迷惑了，因循了，竟弄得不知所措。工人階級感染着資產階級的驚慌，也走進了癱瘓與消極的狀態。因之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這六個不景氣的年頭中，美國工人階級非但不會進行鬥爭，而且不斷地後退并陷於沮喪之中。新的組織沒有產生出來，舊的組織更加是懶惰無生氣了。

趁這機會，資產階級中出來了一個有遠見有手腕的政治家——羅斯福，他用大規模的改良方法克服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使美國的資本制度從一九三五年起又走上了恢復之路。工人階級也從危機的打擊之下清醒過來了，恢復了自信。不過六年痛苦畢竟不是白過的，工人們這一次的自信，跟危機以前的却大大不同了。以前，他們相信美國的繁榮，以及附在這繁榮身上的階級合作制度是無窮極的；現在，他們可沒有這個夢想了，他們見過了危機，嘗到了危機的痛苦，看見了資方在危機中「破壞合作」的情形，他們於是懂得：要想保障工人生活的水準以及更謀改善之通，必須自己組織起來。這個覺醒使成千成

產主義的階級。

主張自由資本主義的陶大燾和章乃器兩先生一定反對這個路線。章先生一定要說：「跳過資本主義階段，是不可能的。」陶先生也一定要說：「資本主義生產力尚未充實，中國怎麼能夠走向社會主義？」

我們可以同吳清友先生一般舉出實例來證明。從前資本主義階段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跳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蘇聯既然能夠幫助他境內的小共和國做這跳躍，為甚麼不能夠幫助中國這個大共和國做這跳躍呢？但我們無須借助這個論據，因為中國畢竟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畢竟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即使現在走上社會主義也已經不能算「跳過階段」了。難道章先生以為中國現在還未會到資本主義階段麼？難道官僚資本支配一切的國家還是在前資本主義階段麼？

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力尚未充實，——這話自然是對的。論生產力，中國不僅不如美國遠甚，而且不如日本，要趕上日本不知道還需多少年。但問題乃在於資本主義路線並不能發展生產力。僅僅拿中國一國來看，拿中國從世界歷史割裂出來看，資本主義固然尚未耗竭其發展能力，可是在世界範圍來看，資本主義已經耗竭其發展能力了，中國是不能如此割裂的，因此世界資本主義病症也傳染到中國來，使中國資本主義未老先衰，在孩童時代就停止發育。否則不會有如此猖獗的官僚資本，如此難於解決的內戰了。中國要能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即必須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實行專政，將重要的生產機關收歸國有，以此來發展生產力。這就是俄國走的路線。

主張「新資本主義」的吳清友先生和主張「國家資本」的伍啓元先生也一定反對這個路線。吳先

萬的工人參加了「美國勞動聯盟」，使垂垂欲死的唯一的勞工組織突然復活，使這古老的職業工會內部紛紛成立產業性的工會支部。

產業工會是以整個產業中的全體工人為組織單位的，沒有行業的限制，因之沒有階層，沒有特權，所以是羣衆性的，不保守的，遠較戰鬥的。自從一九三五年起，產業工會的組織相傍着舊有的職業工會發生出來，共處在「美國勞動聯盟」之中。二者進行激烈鬥爭，互爭這個組織的領導。美國那個最保守的閉關的階層性的勞工組織，於是發生沸騰的內部生活，充滿着活潑了。鬥爭結果，美國勞動運動史上揭開了新的一章：一個純粹依產業區別而組織的工會產生了，這就是所謂「CIO」，就是「產業組織大會」。這是以前本隸屬於「美國勞動聯盟」的一些產業工會為基礎而組織的。

這個新的組織，在一九三五—三七年短促兩年間，獲得了與「美國勞動聯盟」相等的聲勢，而後者却是經過了數十年的長成，才達到這個地步的。產業工會運動發展得如此之快，那是經過了許多次激烈鬥爭的，牠一方面要反對保守的工會官僚，另一方面又得反對頑固廠主們的彈壓。不懂得工人運動史的人是不會明白的，為什麼美國工人從職業工會的形式走到產業工會的形式要用如此大的力氣。美國工人，不僅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就是在在一九三四年，一切組織產業工會的企圖都是失敗了的。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職業工會實質上是少數貴族工人的集團，是資方控制工人羣衆的工具，而產業工會却是羣衆性的，較多獨立性的，所以是十分不利於資方的。如果職業工會的大部分作用在於促進勞資合作，那末產業工會則主要是階級鬥爭的組織。美國的資本家與工官們十分懂得這一點。所以多方壓制後一形式工會的發生。

但是美國工人們畢竟衝破了一切難關。龐大的產業工會組織終於成立了。不但這一點，他們還在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間，採行了靜坐罷工的方法，開始在鬥爭中否定資本家對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從那時起，這個「CIO」，不但在美國產業中，甚至在政治上，也成爲一個重要因素了。一九三六年羅斯福總統的二屆連任，大大地得力於「CIO」的支持的。數量上占着極大優勢的美國工人階級，這時因爲一個較有戰鬥性的組織之產生，開始積極地發展出力量來了。這力量不但使他們能在經濟轉機時期爭取勝利，而且能使他們在重大義落的時期保證這些勝利。我們知道，美國的經濟危機在一九三四年以後略有轉機，三五，三六及三七的上半年是相當景氣的年頭；但因整個的世界資本主義在走着下坡路，美國雖擁有巨大的國富可資調度，也感能緩和這趨勢於一時而已。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工業生產又陡然下降了。這時資本家想用壓榨工人之強來彌補這個損失，但是遇到了堅強抵抗，不得不適可而止了，工人階級仍然保持他們在兩年爭得來的成果。這大部分是要歸功於「CIO」的力量。

不過這時候的「美國勞動聯盟」經過了鬥爭與分裂之後，也大大地年青化，羣衆化，因而左傾了。牠內部也包含了許多的產業工會。

除了上面所說的兩大組織之外，還有十一個單獨存在的極其保守的「鐵路員工聯誼社」，包含着數十萬工人。

這便是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工人階級的組織情形，在一九四〇年，上面所說的三個工人組織，包括了一千多萬會員。這些人是美國無產階級的骨幹，因爲他們都是產業工人，是被僱於獨占資本所

生一定要說：「中國目前仍然需要資本主義階段，因爲中國現在仍然是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伍先生也一定要說：「國有化」就夠了，何必無產階級專政呢？

即使我們承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爲甚麼需要資本主義階段呢？吳先生自己說過歷史發展有跳過階段之可能，但要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怎樣。那麼中國有甚麼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使牠不能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呢？吳先生那日沒有說，至少記錄上沒有寫下他的話，我們無從知道。我們要說的，就是不僅自由資本主義已在中國耗竭其可能性，一般資本主義，以及甚麼「新資本主義」也已在中國耗竭其可能性了。如果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社會仍舊「拖」下去，那麼唯一「可能的」資本主義，就是那日請專家所指責的「官僚資本主義」，決不是「自由資本主義」，也不是「新資本主義」。

至於政權沒有轉入無產階級之手的「國有化」，仍然是資產階級所有，——這話上面已經說過了。我們姑不說英國以及其他若干歐洲國家現在所行的「國有化」不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祇要說這種「國有化」在中國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現在官僚資本底擴大。官僚資本下的「國有化」，就是美國獨佔的殖民地經濟。

其實，在中國經濟問題上，僅僅討論「走甚麼路線」問題，是不夠的，必須討論「誰」來發展中國經濟？「甚麼階級」來發展中國經濟？在「甚麼政權」之下發展中國經濟？

中國如果不經過革命，政權仍舊操在資產階級之手，則無論如何不能擺脫殖民地地位。在此情形下，即使經濟有發展，那也是爲了美國帝國主義利益，而不是爲了中國獨立的資本主義利益，更不

屬的一切大企業中的。所以就表面看，他們雖佔了全部工人的六分之一，但就地位重要說，他們的行動不僅決定着全體工人，而且影響着全國人民的經濟活動。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時候已經完全組織起來了，他們已從「自在」的階級，最後與完全地轉變為「自為」的階級了。

美國工會主義的驅動力

那末為什麼還不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呢？那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因為這些工會，連最進步的「C I O」在內，都仍受着狹隘的工會主義的束縛；第二因為美國工人階級，雖然已感覺到以組織力量從事生活鬥爭的需要，但是尚未覺悟到經濟鬥爭之最後勝利，需要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勝利來保障。工人階級本身的此種覺醒程度，又決定了工人政黨的成熟程度；美國至今還不會有一個決心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黨派的黨。

這裏還是先談工會方面。「美國勞動聯盟」與「鐵路工人聯盟會」是不必說，這兩個傳統的工會，嚴格地限於經濟立場，他們絕對地不談政治，更不願意談革命的或社會主義的政治。經過了數十年的演化，他們本質上已成了美國整個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機構。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人們有很大理由說，他們的存在是爲了個清楚地推進資本主義，爲了促成勞資雙方的「忠誠合作」。更說得清楚一點，祇爲了把一些高級的與熱練的工人組織起來，分取資本家的超額利潤，藉此防止廣大工人羣衆的不滿與反抗。所以這些組織與其說代表工人利益的，毋寧說是經過他們來收買小部分上層工人，由此可以蔑視多數下級工人利益的。這樣的工會既然與資本主義的利益相一致，自然希望這個制度能够永遠存在下去，自然不歡喜一切以根本推翻資本制度爲目的的政治理想與活動了。

不必說，這種情形是以美國資本主義的上昇期與繁榮期爲背景的。要有這樣的工會，美國的資產階級必須有驚人的利潤可賺，以致不惜拿出一部分來分給一部分工人。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而在大恐慌發生以後，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爲止的五年不景氣中，「美國勞動聯盟」之驟起則窮萎縮，也正

是因爲暫時開去了這個背景。

「產業組織大會」發生於美國資本主義遭逢了空前大變之後，正是這個大變的產物，按理他應該一反乎美國工會的傳統精神，能衝破改良與合作的桎梏，大踏步走向政治鬥爭乃至革命道路了；可是不然，他雖然在基礎上羣衆化了，組織上產業性了，同時在精神上，也確實具有很大的戰鬥意味，但主要因爲美帝國主義的「有生力量」太大了，他雖然經歷了嚴重危機，却仍有餘力從事於極大規模的改良，羅斯福的新政便是美帝改良政綱的實施。根據這個政綱，政府動用了美國資本主義數十年積聚下來的龐大財富，舉辦公共工程，解決失業危機，改善勞工生活，提高大眾的購買力，藉此重振了國內市場；相當恢復了生產，緩和了羣衆的方傾，同時又網羅了勞工領袖，使他們與政府發生密切關係，使工會成了半官機關，結果，羅斯福便以「勞工之友」的姿態控制了整個的美國工人階級。

如此，美國工人運動的主流，雖然藉「恐慌」之助，衝出了保守與特權的職業工會的藩籬，向前走了

（未完）

是爲了中國工農羣衆利益。試看日本在台灣，在北，在其餘各省的投資，都由中國接收了，中國經濟基礎突然豐厚了，但甚麼人得到了好處呢？

中國即使經過革命，但如果政權操在所謂「民主階級」（從工人，經過農民，小資產階級，以至民族資產階級）之手，則經濟仍是不會發展的，因爲這種政權不能穩定下來，不能給經濟發展以一致的方向。惟有無產階級領導貧農的專政，才能構成一個穩定的政權，才能解除中國經濟發展上種種障礙，才能使中國經濟有利於工農羣衆。

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中國經濟，不啻生產力是否充實，不管「國有化」到甚麼地步，總是走上社會主義路綫了。

由此可見，「誰」來發展中國經濟問題解決，則「走甚麼路綫」問題也跟着解決了。經濟專家們固然好多人知道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不能分開，但至今祇能泛論一般「民主化」問題，而不能提出甚麼階級來主持這「民主化」問題，所以他們祇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兜圈子，祇限於爭論自由資本主義和統制資本主義孰優孰劣問題，而看不見唯一可能的發展路綫，即社會主義路綫了。

羅斯福底兒子回憶開羅會議時一件軼事。他會見了蔣夫人宋美齡以後，有了一種印象。當他拿這印象告訴他的父親時候，老羅斯福回答他道：「我想，我不會同你一樣用那些分量重的字眼。她是一位機會主義者，那是毫無問題的。我當然不願在她的國內談人以為我是她的敵人。中國必須能繼續作戰，牽掣住日本的軍隊。誰還代替蔣氏夫婦呢？不管他們有多少短處，我們仍得依靠蔣氏夫婦。」由此可見我們的盟友比我們自身更加需要我們對日本繼續抗戰哩。

中國革命悲劇

第十期

Harold R. Isaacs 著
唐 威 譯

在中國中部和北部，要求增加工資，組織工會和集體契約的鬥爭，也開始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京漢路工人底鬥爭，結果造成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鄭州的屠殺。北方軍閥首領吳佩孚命令他的兵士武力解散工會會議。六十個工人被屠殺了。但這個壓迫不過暫時抑止鐵路工人成立全國組織的努力。差不多一年之後，全國鐵路總工會仍舊成立了，舉出一個委員會來指揮鬥爭，『以改善我們的條件，敬重我們的地位，教育我們自己和兒女，要求組織個別工會的權利，團結一切鐵路工人。』

在上海，一九二三年初已經有四萬工人組織在二十四個工會裏面了。戰線很迅速展開了。一九一八年祇有二十五次罷工見於紀錄，參加者不到一萬工人。一九二二年，祇有九十一次罷工，參加者全國共有十五萬工人了。運動員速率和戰鬥性發展得都很驚人。一九二四年勞動節，上海街上有十萬工人示威，廣州街上有二十萬工人示威。當時的報告說，武昌，漢陽，漢口，雖然有嚴厲的戒嚴令，工人區域仍有紅旗飄揚。勞動節傳統的口號，『八小時工作制』，激動了那些工人，他們剛在開始夢想十四小時代替十六小時，十二小時代替十四小時，十小時代替十二小時哩。

那日的傳單說：『八小時作工，八小時讀書和娛樂，八小時休息，——是何等合理呀！工人階級爲了實現這個要求，已經流了四十年的血。工人做老闆奴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老闆非革命不肯讓步麼？好，革命就會到來的！』

『工友們，今天要記得我們也是人，同老闆一個樣。我們要求老闆拿我們當做人看待。組織起來！人多就有力量！各地同志將給我們援助！』

工人在街上示威唱着新歌：『將來做上是快樂，是我們對於人類的貢獻。自由鐘召喚我們去工作。手攏着手，來唱『工人萬歲！』』（譯者按：這歌以及傳單的文字，都無法找到原文，祇好從英文譯出了。以前及以後好多地方，凡引用原文之處，我們無法找到原文的，都祇能從英文譯譯。）

顯而易見，當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時，中國無產階級已經編織起了，已經在鬥爭之中組織起來了，而此鬥爭也已表現英勇犧牲精神了。無產階級也已經具有健全的精神，對於資產階級『同盟者』抱持懷疑和不信任，不幸，這個精神很快被共同盟底要求所壓制了。一九二四年勞動節，孫文告訴廣州工人說：

：『中國工人和外國工人不同的，就在於外國人僅僅受本國資本家所壓迫，而不是受外國資本家所壓迫。……中國工人則向來未曾受中國資本家所壓迫。……他們不受外國資本家所壓迫。……』

次月在廣州開的太平洋運輸工人第一次大會上，國民黨演說家也說了類似的話。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G. V. Kinski）即伍廷康（關於此次大會寫過）：『中國鐵路工人代表秘密跋涉幾千里來開會，他們還新記記得京漢路罷工流血事件和本年勞動節工人代表被槍殺事件，他們以及爪哇同志構成了大會底左翼。他們以冷淡和懷疑迎接國民黨負責代表底演說，因爲這位代表號召工人與農民及知識分子聯合戰線，但非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爪哇同志也曾在去年五月間實行一次嚴重的鐵路大罷工，而且於泛回教團體（泛回教）中形成一個強大的左翼，他們在這次大會上也參加號召一個反軍閥的聯合戰線，但須在真正的革命組織領導底下，其中，有充分的共產黨影響。』魏金斯基在未來約束中國勞動運動使受資產階級被領導的工作上將有很大的作用，他和他的朋友不久之後就要教中國工人怎樣迎接國民黨負責代表才算合適了。

農民也已開始鍛鍊其自己的組織武器了。現代中國農民運動是彭湃在廣東東江海豐縣所發起的。彭湃是中國革命中最顯著的和最勇敢的人物之一，他本是海豐大地主底兒子，在本縣小學當教員，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有他在內，不久他就圖謀拿共產主義思想在農民中開闢道路。爲了一九二一年勞動節領導他的學生舉行示威原故，彭湃被當局革職了，於是到鄉下去，進行組織農民工作。這裏，他起初遭遇到挫折，挫折後的成功，以及海豐農民協會初期的鬥爭，種種故事，他曾以個人日記和回憶形式寫成一本極有價值的書。農民起初懷疑他，不信任他，——他不是大地主底兒子麼？——最後，有幾個青年農民被他鼓勵起來了。彭湃和他的小團體，拿一個留聲機，幾篇演說（關於如何從地主壓迫底下獲得自由的演說）和若干詭計之幫助，居然獲得了農民底信任。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以後，就迅速發展，但立刻得到砲火洗禮，因爲陳炯明部下的兵士就來進攻。

海豐農民如此組織起來，很快就將運動擴展於鄰近諸縣。一九二三年夏天以前，廣東省農民協會概設已建立了。這個新團體有一篇宣言說道：『地主底土地并非真是拿錢買來的。現在地主底父親或祖父是用暴力從農民搶來土地的

。即使土地是買來的，地主不遇付一次錢，但他每年收租，他可以收幾百年，幾千年的租。……地主沒有做甚麼工，但取去了每年收租底最大部分。我們和我們的祖先在這塊土地上費去了多少金錢和汗血呀！……這些是簡單的話，但說出了那種狀況，那種被人視為一成不變的，上天所定的狀況。當農民協會宣傳可以由自己努力來改變那種狀況，而且用事實證明的確可以改變那種狀況時候，世界好像換了另一副面目。上天好像拿同一笑面對待農民和地主。這些思想如此迅速透達鄉村，正如雨水浸透泥土一般。這些思想也很快結了果實。農民起來鬥爭，反對地主，反對官府，警察和軍隊；鬥爭普遍於東江各縣，而且蔓延到西江和北江去。減少田租的要求幾乎立即就達到完全取消田租的要求。一九二三年，高要縣，已經「有些加入農民協會的佃農拒絕交租給地主了，地主不得不請求軍隊和警察協助收租。」每次收租都有武力衝突發生。農民運動發動了。一九二四年，當國民黨改組時候，農民運動已在大大踏步前進了。

共產黨帶到工廠和農村來的國民黨綱領，在工人和農民看來，總是一種機會，可以經過戰鬥的組織來改善生活條件的。工人和農民很自然地將國民黨底敵人當做自己的敵人。這種敵人還很多，必須打擊和剷除之後，國民黨才能成爲一種真正的統治力量，不僅在廣東全省，而且在全國。一九二四年夏天，國民黨在廣州的統治遭遇「商團」挑戰，「商團」底經費和軍火是英國帝國主義者以及粵港兩地股富買辦所供給的。英國在遠東的最大金融機關匯豐銀行底大買辦陳廉伯，就是「商團」組織人。八月十日，孫文扣留了陳廉伯一船軍火，經過了幾次動搖和拖延之後終於決心要剷除這威脅其統治的武裝團體了。八月二十六日，英國駐廣州的總領事給孫文一個褒獎美書，說：「如果攻擊『商團』，英國海軍就要干涉。孫文向當時工黨首相麥克唐納提出抗議，麥克唐納不回答，——這就證明工黨所預計的改良是不適用於英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孫文又打電報給國際聯盟，可是這個世界和各組織不懂得這件事情與牠有甚麼關係，所以也沒有回答。最後，十月間，黃埔軍官學生和工農武裝隊伍組成的一種軍隊向「商團」進攻，經過短時而激烈的戰鬥之後打敗了「商團」而解除其武裝了。珠江上的英國砲艦并未會實行其威嚇的話。

四個月之後，一九二五年二月，陳炯明又要進攻廣州了，當時廣東省內還有很大部分在他的武力支配之下。國民黨軍隊於是打進東江陳炯明巢穴去。爲了復漢，陸豐，惠陽，五華諸縣農民底活動，陳炯明束手無策；他的後方被農民攻擊了，他的交通線被農民截斷了，他的軍需品被農民劫奪了。東莞，龍門及鄰近諸縣的農民，與國民黨軍隊並肩作戰或充當嚮導，間諜，運糧隊員

。陳炯明無法抵禦這種攻擊，他不得不縮回來而放棄了進攻廣州的計劃。一九二五年勞動節，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第一次廣東省農民協會同時在廣州開會，表現了工農運動底龐大發展。勞動大會代表共有二百三十人，代表中國各大城市五十七萬有組織的工人。農民協會，則僅二十二縣有組織，但已有代表一百七十七人，代表了十八萬有組織的農民。工農兩會代表，連同幾千萬州工人以及郊外來的農民，這一天在掛滿國旗的街上舉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農團結的大示威。他們帶着鮮紅的手足和棕楊的面龐，走入廣州某幾個中小學校佈置的會場內去，那是給他們十日會議用的。學生和政治工作者來他們的會議上演說。他們第一次聽說有新式的機器能減輕他們的勞動。他們參觀了課室和圖書館。他們第一次瞥見了那個世界，幾百年出力和流汗，把他們無情地從那個世界隔離了。

幾個星期之後，廣州街上又有槍砲聲了。那時廣州還是在滇桂軍楊希閔和劉震寰軍事統治之下，這兩個將軍，同其他好多軍閥一般，希望同國民黨合作能得到利益。可是他們和羣衆運動之間的鴻溝太深了，無法妥協。黃埔軍官學生和武裝工人又一次並肩作戰。結果是預先注定了的。滇桂軍被擊潰了，將軍們退出廣州了，西江農民又起來解決收斃隊伍，經過江門一次短時而激烈的戰鬥之後，楊劉勢力就完全消失了。恰在此時，新的雷聲又從上海發出來。羣衆運動高潮剛在開始哩。

上海工人發動了鬥爭，反對當地奴隸般的勞動條件，尤其紗廠裏的條件。一九二五年年初幾個月，一連串的罷工是爲了要求增加工資和反對工頭打人的，尤其日本廠裏的工頭。青島罷工工人被槍殺以及上海一個工人被日本工頭所打死，遂使羣衆氣憤爆發出來。學生和工人在上海街上聯合示威，抗議。好多人被捕，示威者於是羣到巡捕房來，要求釋放。一個英國捕頭驚惶失措，下令閉槍，示威者中槍死了十二人。這是五月三十日下午的事情。

這件事情發生了迅雷一閃的影響。上海，這個帝國主義根據地，連同其中的外國銀行和外國工廠，都因大罷工而癱瘓了，外國人家中的男女僕役也加入了罷工。同巨人覺醒來一般，中國工人站立起來，使得國家主們（中國的和外國的）心中感覺恐怖，而且震動了海外帝國主義政府公事房。傲慢的外國人，幾十年來習慣於將中國工人看做污穢而馴良的畜牲的，現在眼見羣衆崛起，伸出有力的拳頭在他們面前時候，不禁面容失色了。罷工如此普遍，以致「外國人除了加入商團服務之外，沒有別的事情好做。」

罷工是普遍全國的。根據某研究者搜集的不完全的統計，接看五月三十日

……之後，南至廣州警務，北至北平，共有三十五件警務，參加的將近四
……英艦隊，向香港工人開槍，殺死八人，受傷十二人。在廣州，英國輪船
……的中國海員，六月十八日實行罷工，三日之後，香港和沙面（即廣州的外
……以及黃埔軍官學生，在廣州實行罷工，六月二十三日，學生
……租界那邊英法德俄槍手便向示威者開火，殺死了五十二人，殺傷了一百十
……七人。外國人事後辯護說是示威者先向他開火槍的。他們很難證明，因為開火
……時正在通橋的畢業完全是沒有武裝的學生和工人，此外，外國人祇死了二人，
……而死於機關槍下的中國人則有五十二人。

人們立即宣布大罷工，抵制英國貨。香港，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要塞，
束手無策。沒有一個輪子轉動。沒有一包貨物被動。沒有一隻輪船啓碇。十萬
以香港工人實行一種空前的舉動，退出香港，搬到廣州去。這個使外國所有
工商業活動為之驟然停止的大罷工，從香港和沙面重要的工商業中吸引了二十
五萬工人出來。在廣州，工人肅清了賭場和烟館，拿這些房屋做罷工者的食堂
和宿舍。二千工人組織成了糾察隊，在香港和沙面周圍佈置一條不可逾越的封鎖
線。運動極有組織。每五十個罷工者推舉一代表參加「罷工工人代表大會」
大會又推舉十三人為一種執行委員會。在這個工人階級組織，中國第一個蘇
維埃試驗廠之下，設立了一所醫院和十七所學校，替男工及其兒女服務。
又有幾個特別的委員會，處理基金和捐款，拍賣沒收來的貨物，掌管文書等
等。此外還有一個罷工者法庭，審判那些破壞罷工或擾亂公安的罪。

警察和司法職權，交付給糾察隊，糾察隊以無產階級特有的迅速和謹慎行
使了這兩個職權。糾察隊封鎖鐵廠密得如同銅牆鐵壁。一個外國觀察者寫道：
「廣州抵制英國貨的運動，是一個罷工委員會主持的，委員會指揮糾察隊去阻
止偷漏。……廣東全省，凡貨物運輸道路，都有糾察隊把守，經過的貨色都要
打開，往來的人都要搜查。……外國人和中國人一樣要搜查。……罷工工人禁
止一切物品運來在內，進入沙面或在沙面出來。……違犯此禁令的人，則
由罷工法庭判罪。……這個抵制運動是做到十分完全的。……我們應當把這個
抵制看做對香港和英國的一種戰爭，把糾察隊看做實行此戰爭的兵士。此外就
沒理由解釋如此完全如此無情的抵制了。」廣東沿岸以及一切港口交通線防
守工作，是得到國民協會合作的。農民糾察隊巡視河頭，海豐，平山及其鐵路
被破壞者，所以才能對付得如此妥善。

……而及其中慘憤憤的外國人，完全完全與廣州其他部分隔離。糾察隊
把守這個小租界底一切港口。租界中最必需的生活品祇能依靠香港來的船
供給，大部分是軍艦或由外國志願水手駕駛的高船。其他繞行的英國商民也
於同類命運。汕頭某英僑寫信給「字林西報」訴苦道：「香港海運參差斷食
來，……此地沒有鮮牛奶。俱樂部是空虛的，僕役都走了。」
罷工工人眼見那些飢餓的外國人，自己餓飯，自己洗衣服。在罷工條件
下，垃圾雖然不能完全消除的，所以罷工工人改名「香港」為「吳港」；到了
封鎖完全時候，又改名為「死港」了。

香港總督叫喊道：「我們，代表文明的人，受了無政府暴徒所攻擊！」
無政府暴徒「害得這些文明代表人每日損失二十五萬鎊，即中國銀元二萬萬元。
英國商會一個負責人報告道：「一九二四年八月至十二月，每月開入廣州碼
頭的英國輪船在一百六十艘和二百四十艘中間。一九二五年同一期間，則在二
艘和二十七艘之間。」香港紳士們大聲叫喊，要求用武力去捍衛「文明」。否
則「廣東反赤運動是沒有成功希望的。……迅速的軍事行動可以「促成友好的
中國人在廣州佔得政權。」

但是倫敦政府比香港紳士們更聰明些，認為無須直接使用英國武力就可得
到「友好的中國人」來協助的。廣東全省此時似乎沒有一個軍閥或土匪頭子不
會接受英國金錢，不會破壞糾察隊封鎖線或進行軍事行動反對廣州政府。
然而罷工和抵制仍繼續下去。國民黨仍能在黨業運動力量之上鞏固其政權
，而且於六月底成立一個「國民政府」。九月間，國民黨軍人，得到戰線內外
農民協會協助，終於肅清東江陳炯明勢力了，無論香港給陳炯明多少金錢和物
質援助。從此至一九二五年底，廣東南方殘餘的敵對軍閥也被肅清。國民黨在
廣東省內握得最高權力了。

如此，不到兩年，一個強大的黨業運動將國民黨從政治無力的地位抬高至
具有那種權力和威望的地位，敢於向一切阻礙他的道路的力量挑戰。統一了廣
東省以後，國民黨就能放眼北望去估量中國中部和北部敵人勢力了。那些敵人
正在驚心動魄地觀察國民黨勢力增長。國民黨所以能够成此這一切，是全憑
工人和農民底黨業運動而軍事運動所以能够發展其力量，又是全憑中
國共產黨人底勇敢和創意。一個有力的武器鑄造成功，如何使中國社會一切障
礙，……這些問題被提到……新起點其距離。一般的階級鬥爭……屬於……
(第三章完)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新旗

第六十期

實售國幣一千二百元

五四『五卅』結合 起來

鳳岡

今年的『五四』過得相當熱鬧，尤其在北平上海，各學校各文化團體都有了紀念。舊的口號聯繫着新的運動，青年人表現了新的生氣，悶死人的局面逼他們走上戰鬥的路。

青年人自己喊着，中年與老年的過來人也這樣說着：新的『五四』在來了！

對的，他在來；好的，我們歡迎牠來。不過我們必須馬上指出，正在來的不會是『五四』的重演，而將是『五四』與『五卅』的結合。

『五四』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來是作為一個『民主』與『科學』的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是中國的『啟蒙運動』，總之，牠是一次充分表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精神的運動，牠是幾乎純粹以小資產階級為主力的。

六年以後有了『五卅』，這運動中仍然有着廣大學生的參加；但主力已經不再是學生，而是新興的與更堅實的無產階級了。戰鬥的口號也不再是『民主』與『科學』而是『反帝』與『生活』了，罷工的狂潮掩蓋了學生的罷課呼號。

『五卅』給中國直接引入了一個革命時代，這革命本可以完成『五四』與『五卅』所提出的任務的；但因為史大林一系的破產領導，羣衆的血換得了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凱旋。因此，不但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與保證中國工農大眾的生活，而且連民主與科學的實現都變成泡影了。

因此中國還有新『五四』的客觀需要。但是歷史是能重演而不能重演的。中國新『五四』與新『五卅』之間不但不會有六年距離，甚至連任何時距也不會有哩。今後，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以主力資格踏進政治舞台，則學生的嚷嚷終於不過是嚷嚷而已，連舊『五四』的規模都不會有。前進與清醒的學生領袖必須正視着這一點。

新的『五四』不能與新的『五卅』分開，前者祇能因後者之到來而到來。爲要促成新的『五卅』，預備做新的『五四』運動主力的學生們，必須將自己的全部心力從『文藝』的狹隘的圈子中跳出來，跑向工人，接近他們，喚呼他們，同時向他們學習，同他們鍛鍊，共同奮鬥，以便大踏步走向社會主義性的大革命。

中國現在正走向一個新的『五卅』，僅僅在這中間包含着新的『五四』。

學生應該和工人首先攜起手來！

第十六期目錄

- 『五四』『五卅』結合起來……………鳳岡
- 工人自給生活指數，工資不打折扣！振聲
- 蘇聯有反動的設施，我們也要反對！木君
- 我們的政治主張……………本
- 時局與革命黨……………蘭
- 我們要『制憲會議』……………穆
- 『聯合政府』問題答客問（下）……………蘭
- 是誰殺死了托洛茨基？……………蘭
- 國際門爭
- 托洛茨基派在朝鮮……………盛
- 駐防東歐的蘇聯軍隊逃亡了很多……………盛
- 日本戰俘不肯被利用去破壞罷工……………盛
- 印度托派爲印度共產黨受迫害事向政府抗議……………盛
- 美國托派統一進行順利……………盛
- 越南政府感謝美國托派援助……………盛

發行者 新 香 港 西 灣 河 廣 社
通訊處 太古船塢李振聲

工人自編生活指數

資不折扣！

振聲

生活比任何東西更有力量，牠很快而且很容易，打破了統治者及其走狗們的一切牢籠。

自從去年七月以來，國民黨的工運特務全面控制了上海的工人階級。這事實使國民黨當局安了心，放手從事反動事業，實施種種壓迫措施。其中最無恥與最公開的一項，就是凍結生活指數。

實施以來，工人階級雖是敢怒而不敢言，於是內戰的全部負擔落在工資階級與薪給階級的肩上了。國民黨滿想說此可以解救『國家』的經濟危機。但目前情形是這樣：即使工人統統變成了無報償的奴隸，或不吃飯的機器，國民黨的經濟還是沒有辦法的。因此，四月份起，由糧食領導，一次新的狂瀾風起來了，一下子打擊到勞動者的肚皮。工資凍不住了。羣衆情緒十分緊張，控制工人的工官也沒有辦法。結果是用欺騙來代替高壓。在『五一』遊行中，『解凍生活指數』的口號居然也被正式提出來了，以此來企圖保持羣衆對工官們的幻想。

最初，工官們祇和譁羣衆喊，發洩發洩他們的怨氣；但甚囑口氣，光發洩解決不了問題，又衆要認真解決生活指數哩。於是他們又不得不玩花槍，施詭計。

經過了多少反動專家的設計，辦法來了，解凍生活指數，但逐級須打折扣。這裏有一個最大的陰謀，就是分化工人階級。三十元以下的覺得可以滿足了，他們退出戰鬥，而三十元以上的人，數逐層減少，而且逐層保守，這下手讓你們再也鬧不起事來。

此外，當然還有一張王牌拿在政府手裏：指數

由我編，誰也管不了我！結果，自然，解凍跟不解凍沒有兩樣。

這法兒要得固然妙呀！但牠能不能消再生活指數鬥爭於無形呢？不，不，決計不。

因爲生活比任何東西更有力量，牠很快而且很容易，會揭穿統治者及其走狗們的一切欺騙。

『解凍了』生活指數仍舊不能讓工人吃飽肚皮，鬥爭還要繼續的。我們已經聽見聲音了，那是：『自編指數，不折扣！』『反對有條件解凍生活指數！』

我們堅決擁護這些個口號。

蘇聯有反動的設施，我們也要反對

木君

中國與蘇聯不好比，是十分不同的兩種國家。中國是受資產階級軍事野蠻統治的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蘇聯呢，雖然也是在一個極端野蠻的官僚統治之下，却總是由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立下了基礎的，所以在根本的財產關係上，總還是比較進步些，他不但比中國，甚至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要得進步。

但我們與史大林主義者不同，我們決不盲目地歌頌蘇聯的一切，尤其不歌頌牠的野蠻與墮落的官僚，以及他們的一切政策設施；我們非但不歌頌，而且竭力反對，竭力要打倒，我們認爲替這些官僚的反動措施辯護，就是反對蘇聯。

可是史大林主義者及其一切同情者不然。在他們，蘇聯就是史大林官僚，擁護蘇聯就應擁護史大林，所以他們以爲史大林官僚的所行所爲，無一不是好的。

蘇聯要實行男女分校了，『好的』，他們曲意

辯護；可是國民黨也想實行這個辦法，那是壞的，他們懂得了。

他們決不肯說蘇聯這辦法也是反動的。

現在，全國大學生爲公費的增加與擴大而罷課，這當然是對的，好的，史大林主義者都贊成，我們也贊成。

但是自從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蘇聯公佈了一個法令，『技術學校學生每年須付一百五十五至二百盧布的學費，大學學生應付三百至五百個盧布的學費』，因此法令之故，六十萬貧苦學生失了學。這辦法，我們說壞的，反動的，她表示着史大林官僚的更加墮落，可是我們的史大林主義者及其同情者，對此將作何辯解呢？當然說這是好的囉，因爲在他們，史大林的一切辦法都沒有講錯。

一切爲公費在奮鬥的中國學生，應該想一想蘇聯取消公費這個事實，復由此小事去認識史大林黨的墮落與欺騙。

中國統治者的壞事應該反對，可是蘇聯統治者的壞事也不應該贊成呀！

老手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工人被屠殺，劊子們說，是爲了工人內訌，軍隊去維持秩序，才把糾察隊繳械的，其實是一些便衣份子先向工人進攻，正處軍隊隨後跟了來。這件事，劊子手們以後並不隱諱。今天，雖然經過二十年了，但我們在上海各學校罷課中，還看見這老手法在應用着。人們要毆打學生，要逮捕學生，但還不敢彰明較著地做，還是先製造學生『內訌』，再來施行壓迫。這手段是更卑鄙些！

我們的政治主張

(一)立即停止內戰：——反對國民黨勾結美國帝國主義時代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武裝隊，反對徵糧，徵稅，徵兵！

(二)徹底改善與保障工人生活：——按生活指數十足發給工資；罷工代表自編生活指數；八小時工作制；工會領導機關民主化；反對國民黨黨棍控制工會；工人管理前敵的工廠；工人監督「國家銀行」與「國營事業」；救濟失業；確保罷工權；取消一切反對勞動者的法律！

(三)沒收土地歸農：——切實沒收地主與富農土地，由全體自耕農，貧農與佃農組織土地委員會加以管理，由各成員分種或集體耕種；打倒高利貸；取消一切苛捐雜稅！

(四)軍隊民主化：——一切軍隊（不分國共）立即成立兵士委員會；徹底改善兵士生活；廢止一切等級，特權，壓迫與侮辱；革斥全體反動軍官；兵士自選指揮員；授退伍兵士以土地；廢止常備軍；由工會編練農民軍！

(五)保障貧民生活：——成立各類消費者代表會，規定日用品價格，監督一切經濟活動，剝削投機囤積，成立住戶聯合會，分配一切房屋；由國庫廣建房屋，交工會與住戶聯合會支配；清算並沒收大官僚，一切發國難財，勝利財與內戰財者的財產，用以整理幣制，安定物價，興辦工廠，由工人管理，以此切實救濟貧民；以單一

時局與革命黨 鳳崗

幾個世紀遺傳下來的社會矛盾，尤其從內戰及其後果經濟恐慌所激起的社會不安，很顯然地表示出，中國當前的局勢是十分嚴重了。這局勢能導引出什麼「大事」？將如何發展？能否引起新的中國革命？現在還不能預言。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就是這些社會不安決不會毫無影響地過去，不會在當局者幾句威嚇之前消滅，她們會發展，會繼續，即使停頓而其影響仍將擴大，雖趨平靜而其潛力仍會奔流的。

總之，現在是處在一大動亂的前夕，雖然這動亂之突發，持續，規模與影響是難於預言。在大約一年之前，我們就指出過，就客觀的或潛在的形勢說，中國簡直和一九一七年前俄國相差無幾。人們迫切地需要「土地」，成了最大多數人的最迫切要求。一年來，情形更嚴重了，而方向仍是一樣的。人們迫切地需要「和平」，糧食與土地，只是其迫切性已比一年前增大至無限倍了。全國戰亂，遍地飢荒，使一九一七年俄國的老口號成了一九四七年中國民眾最現實的要求。跟過去一切時代的來臨一樣，學生首先代表了全體民眾，將他們不取不取或不能取的要求喊出來了。現在學生們所喊的雖然還不是「和平，糧食與土地」，但是本質上是反映著的。在政治覺醒較高的北平學生們，「反內戰」口號已經公然喊出來，而各地學生的「增加副食費」運動，則不過是「糧食與土地」要求之表現於學生生活罷了。

「和平，糧食與土地」這口號，曾經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引起了世界歷史上一次頂頂偉大的革命，造成了第一個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故事。如今在中國，這同樣的要求能否造成同樣的故事呢？我們在前年提出過這個問題，現在又要提出這個問題。

從事變的客觀進展說，現在，我們可以比一年前更加確定地回答這問題：能夠的，能夠的，能夠造成的。不錯，目前的「不交」還主要由學生發動着。廣大的民衆懷着同情，彷彿站在這鬥爭之外。但我們切莫忽略了，工人階級為生活指數解凍的鬥爭，雖然一時受着欺騙而略趨平靜，但仍將隨時勃發為怒潮的；至於貧苦農民的鬥爭，那末在史大林黨的領導（正確說，應該「控制」）之下，正發展成生死的搏鬥。此種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與工人的鬥爭，勢將連在一起。而且連結，這便是革命了。

現在爲什麼還不連結呢？客觀上說，由於國民黨反動的壓迫機構還沒有瓦解，而這個機構之所以尚未趨向瓦解，則主要因爲兵士還受着紀律束縛，還沒有能對學生，貧農與工人的要求公開同情。可是學生的叫喊，工人的罷工，與貧農的鬥爭，却遲早能使被強迫穿上軍服的農民們，也在「和平，糧食與土地」的口號之下行動起來。兵士們一旦也公開反對內戰，一旦也要求增加「副食費」，一旦也要求土地，那便是暴動的局勢了。便是「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二月局勢」。

所以從客觀的事件進展說，中國目前的「和平，糧食，土地」的運動，一定也能够造成俄國式革命的。自然，沒有一個人會斷定，以爲中國行將亦步趨重走一九一七年俄國道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大影響，會延遲，推緩以改變此類事變的過程。不過我們毋須過分憂慮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阻礙作

的財產累進稅代替一切捐稅；革斥一切貪官污吏，官吏民選！

(六) 保障青年的求學與就業：——增加教育經費；大中學生一律公費；實施普及的義務教育；反對黨化教育；保障教師生活與學生營養；反對男女分校；畢業學生有充分就業機會！

(七)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罷工，罷工，糾察完全自由：——立即取消一切特務組織；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立即廢除保甲制和警管區制；切實保障各種自由！

(八) 保護中國民族之對外獨立與對內自治：——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中國政；反對美軍駐華；取消中美新不平等條約；否認一切外債；實行自主的保護關稅；接收外商在華產業；讓台灣人民自治；保護國內諸小民族的完全平等與自治！

(九) 保衛蘇聯，打倒史大林官僚政策：——反對作美國帝國主義貓爪進攻蘇聯；反對恢復沙俄特權的「中蘇條約」！

(十) 與全世界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撤退一切佔領軍；反對鎮壓殖民地獨立運動！

(十一) 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取消一黨專制的憲法；取消一黨政府；反對各黨派上層談判改組政府；反對領袖協商的「聯合政府」；主張由全體人民以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產生工農政府，實行上列政綱。

一九四七年五月

用，不必過分担心的，因為美國自己也正隱藏着深刻的革命危機。太多的因素將造成俄國現今最強大國家的內部「社會不安」，我們中國能起革命，也將是一個有力因素，去促成美國革命的。而美國這個十分現體的革命危機，將有力地幫助着中國走上「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道路」，而幫助我們黨固革命勝利。

由此可知，目前正在開展着的中國局勢，在客觀上，頗有勝利地走上革命的可能。那末主觀方面怎樣呢？換句話說，如果革命真像我們所預料地來到了，那末現在中國的既存政權中，可有一個能出來領導他，使他走上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之路，而建立社會主義性的無產階級政權嗎？不幸，我們不得不坦白地說：現在還沒有這樣一個政黨！

我們知道，如果沒有布爾雪維克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雖有十分順利的革命局勢，也絕對不會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為既有布爾雪維克黨，他堅決地站在工人階級的利益與現實利益上，堅決地實行階級政策，堅決地反對「聯合政府」，堅決地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綱，堅決地為無產階級的專政而鬥爭，才能够完成了革命，才能够建立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工人國家。

現在中國有這樣的黨嗎？沒有，沒有。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全民的」，他主張「階級合作」，主張「聯合政府」，反對徹底土地革命，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一個黨，相等於俄國革命中的社會革命黨，即克倫斯基的黨，他祇能斷送革命，絕不能完成革命。

「青年黨」，「民社黨」，「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等等怎麼樣呢？那更不必說起了，這些都不過是些資產階級的政客集團，他們大多是革命的對象，根本談不到領導革命的。

餘下來，只有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托派），即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了，這個團體，在理論與政綱上說，確乎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黨，確乎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雪維克黨的傳統繼承者。他在政治上是沒有資格領導這末來革命的。但同時我們必須指明，這個唯一革命的黨，至今還不會有廣大的工人羣衆的基礎。沒有廣大羣衆，即使是最正確的革命黨，也不能發生決定作用的呀。

因之，中國目前乃至今後局勢的一個主觀上的大開鑼，就是要賦中國托派政黨以廣大的羣衆基礎。一切願意為未來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的人們，應該快快加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藉以保證今後局勢的順利開展！

五月十八日

新書出版

中國革命問題

托洛次基著
凡西校譯

新旗叢書之一 春燕出版社印行 售價二萬五千元

本書包括托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之全部論文，書信與談話。起自一九二七年二月，迄於一九四〇年七月。舉凡中國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政治鬥爭，以及中國之前途等等，均有精詳分析與正確指示。不僅為一革命的共產主義者所必備，抑且為留心中國近代史之人士所應讀。譯者為便利中國讀者起見，對於重要名詞及史實均加有詳細註釋。卷首復出一序文，概括介紹托氏思想特點及其發展。全書共五十萬字。

我們要「制憲會議」

穆德

今年秋天，國民黨調改政府，就國民三黨共同訓政政府，要在中國舉行一次「普選」，來選舉國民會議代表了。這「普選」是否能夠舉行，即使舉行，選出的代表是否開成國民會議，現在都不能確說。那是須看從今開始的一個時期內的事變如何，來決定的，而從今開始的一個時期將是富於大事變的時期。但雖如此，革命的工農大眾及其領導的黨，對於準備選舉的國民會議，不能不有一個確定的立場，現在就應當有一個確定的立場。

據政府說，未來的國民會議是依照去年通過的憲法規定而選舉的，他將依照此憲法規定去實行他的職權。換一句話說，他將是「行憲的」國民會議，以別於去年召集的那個「制憲的」國民會議。

整個問題就在於：去年那個制憲的國民會議能代表全國民意麼？他制成的憲法得到全國人民公認了麼？依照這個憲法規定能夠解決中國問題麼？

大家知道，去年那個國民會議不能代表全國民意，因為大多數代表是在一黨專政之下產生的，而且產生於十年以前，即戰爭尚未爆發以前；臨開會時雖然增加了若干屬於青年黨和民社黨的代表，但這些代表仍然不能代表民意，仍然是由那兩個黨提出而非民衆選出的。如此產生的國民會議，即使制成了一部十全十美的憲法，全國人民仍不能認爲是自己的憲法，何況制成的以五五草案爲底本，再採取若干政協通過的原則呢？五五草案固然不能解決中國問題，政協原則即使全部採取在憲法之內，也仍舊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憲法頒佈時，民衆態度冷淡，憲法頒佈後，內戰更加劇烈，經濟更加混亂，政治更加無出路，以至現在，民衆幾乎忘記了有去年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憲法那一回事，——這一切就是明白指示：中國現在需要的，還不是甚麼行憲的國民會議，而仍是一個制憲的國民會議。

中國一切根本問題，一切最難根本的問題，需要拿出來，讓全國民衆，尤其佔全人口最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直接選舉代表組成國民會議來解決。中國應當採取甚麼社會制度，應當實行甚麼政治形式，祇有這樣一個國民會議才能決定。一切現存的權力機關，都需服從這樣一個國民會議，都需經過這樣一個國民會議重新認可才能享有權力。這是享有最高權的國民會議，這是名副其實的「制憲會議」。

「制憲會議」是資產階級革命中新創的武器，當初資產階級曾經使用這個

武器推翻了中古封建制度，而建立近代資本主義制度。

現在，歷史發展已經達到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了，可是「制憲會議」，這個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使用的武器，仍然保有其革命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惟落後的國家，如印度，在召開「制憲會議」來表示全國民衆民意，而且先進的國家，如法意諸國，民衆意志也仍存借「制憲會議」形式表達出來。

在中國，我們現在也仍舊經過「制憲會議」來表達全國民衆意志。

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甚麼行憲的國民會議，不是甚麼一般空泛的，意義含糊的國民會議或國民大會，而是「制憲會議」。

現在，當國民黨御用的國民會議召開而又頒佈了憲法以後，當共產黨和民主同盟聲明否認此國民會議和此憲法的時候，當廣大民衆對此亦表示厭惡和冷淡的時候，當制憲的國民會議糾纏不滑的時候，我們拿「制憲會議」口號來代替過去的「國民會議」口號，是有革命意義的，因爲這個口號意義是明白而確定的，而且是現在世界諸重要國家所通用的。

可是，無論用「制憲會議」口號，或「國民會議」口號，我們都不要忘記：最後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這「會議」自身，並不是這「會議」以內的人物和議案，而是這「會議」以外的羣衆行動。不僅現在，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是這樣；以前，在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也是這樣。歷史上最民主的「制憲會議」，即法國一七八九和一七九三年兩次召集的「會議」，仍須接受外面羣衆行動底鞭撻，才能走上革命道路。所以，我們爲「制憲會議」而鬥爭時，更需及羣衆運動底加強和擴大，更需要議會外的行動來影響議會內的決定。我們要「制憲會議」，要用直接、記名投票普選出來的擁有全國最高權的「制憲會議」，一切現存的權力機關都服從「制憲會議」。我們不要甚麼行憲的國民會議。

我們不要一黨專政所制成的憲法，我們也不要黨派協商所制成的憲法，我們不要「制憲會議」召開以前任何人所起草的憲法。我們來「制憲會議」不受一切舊拘束而新制憲法，我們要「制憲會議」特設憲法委員會來重新起草憲法！最先的和最重要的，我們要一部民主的選舉法來選舉「制憲會議」，在此選舉當中必須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完全的自由權！

「聯合政府」問題答客問(下)

三男

問：關於「聯合政府」，上次經你解答以後，已經杜除了我許多成見與誤會，我相信，就理論說，你們在這問題上是站得穩的。不過我想了幾天總覺得，你們的意見是太歪了，太理論了，事實上並不一定像你所說的。「聯合政府」並不一定像你指出的那樣要不得。首先，還是讓我們談中國吧，目前的中共，比你前次講的武漢時代的中共，力量上是大大不同了。牠現在擁有這麼多與這強盛的軍隊，難道不能保證牠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難道不能保證牠的政綱一一實現出來，難道不能保證這個「聯合政府」逐漸走到革命的工農政府嗎？

答：這裏我第一要指出你的一個錯誤見解，其實不僅是你的，而是一般人的一個錯誤見解。這見解把「理論」與「事實」對立起來，完全分離開來。結果是否定了理論，僅僅看到事實。這是不對的，而用以談革命則是危險的，致命口。中國人講革命，普通總祇了解成「招兵買馬」，或「揭竿起義」，是無所謂理論的。其實論，在一般人腦子裏只是讀書，或書本知識，而讀書的人就是書獃子，就是「秀才」；書本知識是與「事實」不符的，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是老話，也是中國人的成見，這成見一直傳下來，竟還牢牢地捉住了大多數前進份子們的思想。這是十分不幸的。

其實時代完全不同了。現在，當這階級鬥爭十分劇烈，十分複雜的時候，要想在這混亂局勢中找到一條出路，要想使被壓迫的人羣與被剝削的階級革命成功，非首先了解客觀環境

，明瞭主觀任務，並接受與溶化至少一兩百年來革命經驗不可。要做到這一步，則非學習理論不可。簡單的說，「招兵買馬」，這祇能在封建社會中資產階級起來推銷貴族時候可以辦到。因為他們畢竟是相通的階級，而那些「古典」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也比較的小，同時起來革命的資產階級，早在社會的各方面成爲半統治階級了。這時候，革命還不需要成爲「職業」，即是說，爲了革命尚不需要好多終生從事於革命的人，革命尚未變成極複雜的課題，也因之沒有產生專門的革命理論的必要。但一到十九世紀中葉，歷史提出了一個新的革命要求，要水那愚闇，不文，最受壓迫的無產階級「翻身起來」，推翻那個有教養的與文明的統治階級——貴族與資產階級。不僅要在政治上推翻牠，而且要在整個社會制度上來一個根本變革。爲了完成這個革命，我們不能不使那個愚闇不文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整個而自發地行動起來呢？顯然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就客觀的歷史條件分析，就牠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地位說，固然是最革命的，是「歷史使命的負担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主力。但這一切，決不能叫我們忽略一個事實，就是這個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知識或文明的程度講，始終是落後的。絕大多數的工人都不能自覺到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此種革命的必要。更不必說此種革命的步驟與做法了。於是乎需要更有先鋒隊，需要有一小部分工人乃至非工人份子，窮畢生之力，以

革命爲業，研究革命之道。這裏的所謂「革命之道」，就是理論。如果沒有這個理論，沒有依據這個理論而團集一部革命家來從事革命，讓他們在平時，在各種艱苦的環境之下，依據於正確而明瞭的理論而行動，由此準備革命，並爲革命而準備，那末，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是水遠不能成功的。

一百年來，所貴乎有馬克思以及一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家者，原因即在於此。同時，在一百年來的工人革命運動史中，凡忠實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革命者必看重理論，而一切墮落成資產階級政客的社會主義者，則總是從輕視理論開始，從理論與事實的根本對立開始，其故亦在於此。列寧是最能行動，最懂得「事實」的人，但他恰恰是最看重理論的。在列寧看來，「理論乃是行動的指導」。

現在我要說回來了。對於托派，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曾經有過一個流行的批評，那就是：「托派祇會談理論」。這話假使指的是托派祇談理論不舉行動，那我們不屑同他辯論，因爲這不是事實。假使這話也像你前說一樣，即：理論站得穩而事實不穩，那末我必須告訴你：凡是理論正確而，決不會在事實上錯誤。反之，一個正確的行動，決不會在理論上站不穩的。如果你承認中共的「聯合政府」政策在理論上站不穩，你便無法說牠在事實上正確了。

問：我的一句話引出了你一篇大道理。我承認，理論與事實，或理論與行動無法對立。也許我上面的話有點語病。不過這且不談，你還是接下去，答覆我，中共的武力能否給牠的「聯合政府」以一個有利的，或革命的保證？

：上面說了這許多話，就爲了要答覆你這個問題，因爲我現在仍只能在理論上答覆你提出的『事實』問題。現在你假使真已承認理論不能與事實對立，那末我希望我解答了你的事實問題之後，如果你在理論上認爲正確，便不應該再在『事實』上找過辭了。

首先我承認，武力自然是革命政黨的一個力量。但你得知道，武力本身只是一個工具。他不是萬能的，不是基本的。一個革命政黨的主要力量乃是他的正確的政綱，即符合於無產階級及其革命利益的政綱。武力，祇當他替一個革命政綱服務的時候，才能發揮出革命力量來。否則，縱使他不替反動服務，至少也是沒有出路的。中國歷史上充滿了『招兵買馬』式的『革命』，也充滿了『以暴易暴』式的朝代變革，這在一方面固然說明着中國數千年來祇有走馬燈式的循環；另一方面也將一個思想深深地印進了中國人的腦子：祇叫有了武力就能『革命』。這思想不但擒住了孫中山，而且也沒有放過毛澤東。『有了兵就有一切』，這成了中國一切『有大志者』的信條，其實這是錯的，至少已犯了時代錯誤了。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武力首先是政治性的與階級性的。換句話說，一支武力的造成，必須以明確的政綱爲基礎，且以革命階級的分分子爲骨幹。如果離開了政治，離開了階級，那末武力總歸是統治階級與有產階級的工具，因之是反動階級的工具。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中共的武力了。他是以什麼政綱作基礎，以什麼階級作骨幹而組成的？很明顯，他是以階級合作綱領做基礎，主要以農民分子組成的。中共的領袖們自己不隱諱，

公開地對他們的軍隊說：你們是爲一個包括『自由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等等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而戰，你們應該爲這個『共同要求』而戰，如果工農與『資產階級及紳士』利益發生衝突之時，你們決『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四十一頁）試問，在這樣的綱領上形成起來的軍隊，同時這軍隊中差不多所有的成員都是小有產者的農民，你能希望他在『聯合政府』實現之後，『保證這政府逐漸走到革命的工農政府』嗎？

誠然，中共目前並不要拿自己的武力來保證『走向工農政府』，這在他們是認爲未來的與遙遠的事。他們現在需要保證的，正是你說過的前面兩種：即共產黨人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民主政綱』的實現。現在就讓我們來談這兩個『保證』吧。照目前的『事實』看來，中共的武力甚至連領袖們在『聯合政府』中的部長地位都沒有給他們。不過當然，這是條件問題。即中共的要求未能爲國民黨所接受之故。所以僅僅談『聯合政府』中的地位，那末當然能够保證到的。而且我們不妨假定，國民黨終於接受了中共的要求，成立了『聯合政府』，在那政府中，中共自然與現在的青年黨與民社黨不同，占了更多與更重要的席次。但到了那個時候，因爲政府已經『民主化』，已經根據於一個『統一的施政綱領』，軍隊自然也要『國家化』了。共產黨軍隊由於其據以組成的政綱使然，也確實沒有足以與國民黨立異的地方了。這些軍隊於是被迫或自願地改編爲『國家軍隊』。這時候，中共的農民軍隊，當然把『聯合政府』看作自己的政

府，雖然事實上這還是資本家與地主的政府。他們對政府的敵視心沒有了，軍隊上層呢？因爲愈加接近政府機構，愈加過着特權階級的豪華生活，也就愈加與『自由資產階級』及『開明紳士』妥協了，變成一家人了。久而久之，甚至在不長的時期內，共產黨武力，如果不被消滅，就會徹底墮落的，而共產黨人的部長們，如果不完全屈服，就會被踢出路的。如此說來，中共共產黨的『聯合政府』路線，使他的武力不但不不能保證『民主政綱』之實現，甚至不能保證共產黨人長期留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當然，共產黨人如果完全投降，則又當別論。

問：你未免將前途設想得太簡單了。共產黨不會這樣愚蠢的，他們不會在『聯合政府』初初成立『施政綱領』未曾兌現之時，就讓自己的軍隊被『整編』的。他們一定要緊緊牽住這個力量，迫使政府將『民主政綱』實現。

答：事實證明，中共武力不被『整編』，國民黨決不肯接受『聯合政府』。同時國民黨爲了叫共產黨軍隊『國家化』，某些民主黨一定會做出來，至少在一個短期間，甚至做一些類似實現『民主綱領』的事情也很可能。這一切都爲了叫中共交出兵權。這時候中共交出軍隊呢？交出吧，這個『聯合政府』的『民主黨態』顯然是靠不住的；不交出吧，那末一方面因爲操縱着『國家』的名與實的國民黨的壓力，另一方面因爲中共自己所標榜的『聯合政府』綱領，很不容易辦到。結果，多半當然要爲了這個『聯合政府』的造成或延緩而交出來的。不過在這裏我還可以退一步，假定國民黨答應中共保持武力而參加『聯合政府』，甚至更假定

這支軍隊仍歸由中共單獨控制與訓練，這樣是否給了中共以必需的保證呢？仍舊不，因為祇叫中國共產黨的政綱是爲了「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爲了「調節中國各階級的利益」，那末這支農民軍隊（即使將來參加進一些工人分了也還是一樣）必然要變成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反動工具。你必須知道，一個以發展資本主義自任的黨決不能成爲真正共產黨，同時一個以調和階級利益爲目的的黨也決不能造成或維持一支爲工農階級利益而戰的軍隊。軍隊是政治性的，是階級性的，什麼政綱造成什麼軍隊，什麼階級造成什麼軍隊，這中間絲毫假借不得。在這裏，理論是勝過事實的，理論一定會給你證明出事實來。

中國，因爲「聯合政府」沒有成功，所以上面所說的只是理論，只是揣測；不過在法國，這些都是事實……

問：且慢，我還要談中國。依你之見，中共不是應該放棄「聯合政府」要求，憑着武力，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嗎？憑着武力，一心一意繼續內戰，去爲工農政府鬥爭呢？

答：也不盡然。中共假使能够拋棄與資產階級國民黨合組政府的幻想，自然是很好的。倘能揭起旗幟，爲中國的工農政府之成立而鬥爭，那更是好的。但爲了這些，僅僅農民的武力完全不够。農民不是一個階級，他是好多階級組成的一羣，其中包含着資產階級的富農，小資產階級的中農與貧農，以及半無產階級佃農。所以農民是不能起一個獨立的政治作用的，不能先天地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農民的鬥爭，從來不是爲了社會主義，而是爲了自己想私有土地。因之，農民的武力，如果沒

有城市工人堅強的政治鬥爭所領導，終於墮落而爲資產階級所利用的。換句話說，農民的武力，祇能是工人階級可能的同盟軍，而絕不能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力，不能爲工農政府之建立而鬥爭。所以照我們托洛次基主義者的意思，中共目前應該放棄的但不是「聯合政府」的政策，而且是單靠農民武力的幻想。他們如果真想完成中國革命，那末他們應該在不放棄目前這點武力的條件之下，努力把主要的活動轉移到城市，將基礎建築在無產階級身上，配合着工農的鬥爭，爲一個普遍全權代辦國

民黨獨裁的制憲會議而作戰。

問：那末中共爲什麼不像你所述地做呢？

答：這問題說來話長，此地不能詳細回答。不過有一點必須在此地指出的，就是：有些人以爲一個政黨的政策，在任何時與任何條件下，都可以隨少數領袖的意思而任意更換，那是錯的。我說這話，自然並不否認領袖的作用。我承認，在有些時候，領袖的賢明領導乃是一個革命黨能採取正確政策的重要條件。但這祇當某些時候，正確些說，祇當某些條件之下，才是如此的。什麼條件之下呢？即在有革命階級的羣衆基礎，健全的黨制，以及有獨立思想的革命幹部的時候。如果這個黨，曾經是革命的，但經過了一個深刻的墮落過程，以致第一，失去了原來代表的革命階級的羣衆，其次，爲少數官僚集團所把持，以致最後，幹部分子都換成了些諂上驕下與唯命是從的墮官發財主義者了，那末這個黨，再也不可能回到真正革命的道路上。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本來是革命的工人黨，但從一九二三年後，因爲種種原因（這些原因我們也不能在此地講，如果你到牠

們有興趣，你可以找托洛次基寫的「自傳」，「蘇聯的現狀與前途」等書來讀），最早是蘇聯共產黨，後來上了右傾的路，而石佛的政策，回過來又選擇了保守的幹部，決定了非革命的羣衆基礎。收策選擇人，人又選擇政策，如此往復，繼續了二十餘年，以致全世界的共產黨，都確定地爲極右的官僚化的保守分子所把持，確定地執行着極右的與資產階級相妥協的政策。現在你如果希望這樣的黨，能有一天忽然又回到革命的正確路上去，那就等於相信奇跡。現在全世界的共產黨都走着「聯合政府」的路，這不是一時任意決定的策略，可以隨便更變的，不，他乃是二十餘年來共產黨右傾與墮落的結果，是放去了成千萬革命者的頭顱，出賣了十月革命傳統，並斷送了好多次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自然結果，這樣的結果是不能爲現在共產黨的任何一個領袖願意撇開的。

問：你這個解釋使我滿意。牠解決了我很久以來存在心中的一個觀念。我從來覺得共產黨即使有錯，他一定會改變的，至少是可以改變的；現在經你一說，我彷彿對共產黨有了個新看法了。不過有許多現象仍使我不能理解。好比你提起過的法國，尤其是東歐許多國家，在此次戰爭之後，先後成立了「聯合政府」，結果，在或多或少程度的內，都實行了土地改革。你能說這些政府是反動的，那實地不會逐漸變成工農政府嗎？還有法國，「聯合政府」不也是起着明顯的進步作用嗎？因爲，如果法國共產黨不贊成「聯合政府」，中間派就要同戴高樂派攜手了，不是更壞嗎？

答：讓我們從東歐談起。不過東歐問題太大，也太

新；要把這些『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作一個多方面的研究，顯然不是我們這個談話所能做到的，同時也不必做到，因為我們現在所關心的是『聯合政府』，所以重要的是要看『聯合政府』在這些國家中所起的作用。我們知道，當紅軍乘戰勝之威，長驅直入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國的時機，這些國家裏的舊的統治機構差不多都已經瓦解了。工農大眾蜂擁起來。許多大工業家與大地主逃跑了。工人佔領了工廠，武裝的民軍逮捕着警官與合作分子，以直接行動肅清法西斯主義。工人委員會在許多地方發生，形成了蘇維埃政權的雛形。在好些地方，農民暴動起來，自己分取土地。這時候，進入這些國家的蘇聯當局只要能够採取一個放任態度，工人便能成爲這些國家的真正主人的。可是史大林主義者並沒有放任，非但不放任，而且積極採行了壓制政策，更壞的，採取了搶劫政策。這些頭上繞着十月革命光圈的紅色元帥們，蘇維埃的黨政警人員們，一到了這些地方，便急不及待地和當地舊統治的垂危的代表人勾結，以無情的手段鎮壓工人，解散他們的委員會，繳除他們的武裝，逼令他們放棄一切直接行動得來的東西，好讓各國史大林黨與小地主們的，資本家的及『農民』的政黨組織『聯合政府』。你看，所有這些政府都是撲滅了羣衆革命的結果，或者，他們是爲撲滅羣衆暴動而組成的，難道我們還能說這些政府是爲了革命的利益的嗎？當這些『聯合政府』成立之後，不錯，史大林黨把一些搶剩下來工廠『國有化』了，但是十分虛偽的，其實質和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差不多。（關於這，我們預備在『新旗』上文作詳論，這裏僅限於如此指出。）

此外，這些政府又實行了某種程度的土地改革。然而我們只要稍稍考察一下，就不難看出『聯合政府』如何限制了這些改革之深度與廣度了。第一，沒收標準是要有土地所有者是否與納粹合作；第二，地主拿出他『多餘的』土地（例如依匈牙利標準，超過三百畝者爲多餘），能够收回去代價；第三，富農的土地，祇叫他不是個出賣的，仍不在沒收之列。這樣的改革充分表明了牠的有利於資產階級，甚至也不十分損害了牠的『愛國』地主們的利益。如此說來，由史大林黨做骨幹的『聯合政府』對工人既如彼，對農民又如此，無怪東歐諸國的工農，在一年以來，逐漸對共產黨冷淡，同時資產階級的與『農民的』政黨，則愈來愈採取攻勢，愈占據優勢了；這在好幾國（如匈牙利，波蘭等）選舉中，都可以看得出來。所以東歐這些國家的『聯合政府』，就存在至今的作用說，也是反革命的，因為他們用了改良的面貌，將工農的革命行爲欺騙下來，使驚愕而胆怯的資產階級壯了胆，穩住了統治，以便日後更進一步，靠了西方國家的力量來破壞『聯合』，實行反工農與反蘇聯的法西斯統治。

我覺得你這樣觀察與事實不盡相符合。你知道，現在克里姆林宮是這些國家的全權統治者，各該國的『聯合政府』的主力是共產黨，其他黨派是邀請進去做花瓶的，有如我們中國的青年黨與民社黨一樣。東歐國家究竟採取什麼制度，完全取決於克里姆林宮裏的巨頭們。史大林要他們長就長，要他們短就短。現在史大林沒有使這些國家變成『蘇維埃』制，並非不能夠，而是不願意；史大林要請這些資本家來『合作』並非因爲他們有力量，而是因爲他們可利用。那末爲什麼不建立蘇維埃，爲什麼要用舊統治者呢？照我看，那祇是爲了要敷衍英美帝國主義，不要過分刺激他們，藉以取得時間，建設自己，等到將來攤牌。到那時，時機一旦成熟，那末史大林可以在任何一分鐘把這些『花瓶』丟開，有如摔乾了的檸檬一樣。所以我想，東歐這些『聯合政府』，不是反革命的，他們對於各該國革命利益與蘇聯利益都有好處。

答：你這個論據提出得很好，因爲這些論據，乃是史大林主義者及其同情者爲『聯合政府』辯護的主要理由。就是說，當時機沒有成熟的時候，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利用資產階級，摔他們的汗水。史大林曾經把這個政策，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間，大規模地應用於中國，於國民黨，於蔣介石，於汪精衛，乃至目前，應用於什麼『民族資產階級』。他正是拿檸檬來打比的，他要『摔乾』蔣介石這只『檸檬』然後丟掉他。但是用不著我說，你知道，那時候做了檸檬而被丟掉的不是蔣介石，也不是汪精衛，而是中國的共產黨，中國的工農大眾。

關於這個利用資產階級的破產政策，我不想在此多說，現在我介紹你一本書，即托洛茨基著的『中國革命問題』，在那裏你可以看到這些政策的整個作用與全部真相。此地我祇想告訴你一句話：凡是損害工農利益作代價，企圖和資產階級聯合，由此『利用他』，『摔乾他』，則結果總是被利用，被摔乾，因之斷送了革命的利益。關於這個簡單的道理，不但馬克思和列寧等革命導師充分地教訓了我們，並且百年來的真實革命鬥爭，也如此教訓了我們。史大林們的主要錯誤與罪惡，就在於他們

「蘇聯」這個政團。

此外我還要指出你幾個似是而非的事實與理由。第一，史大林的軍警勢力控制了東歐諸國是事實，但由此你若以為史大林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在那裏造成一些蘇維埃制的國家，却不盡然。首先我要問，什麼叫做蘇維埃國家呢？簡單的管治國家嗎？或者土地，工廠都收歸國有，推翻私人資本主義，但權力完全操在一些特權者手裏的國家嗎？或者，工人階級成爲經濟與政治二者的真實主人的一種國家嗎？若是第一種，當然，史大林現在就已在那些國家中造成了。若是第二種，那末，即使不在所有東歐國家，至少在某幾個，例如波蘭等，確實，可以限日造成的。在波羅的海三小國中，史大林已經這樣做過了。不過，你的意思如果指的是第三類，那末史大林們既不能限日造成，也決不敢造成的。爲什麼？因爲要造成一個國家，其中由工人階級經過民主的蘇維埃機關，掌握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全權，那就非先經過一次從下而上的廣大羣衆的工農革命不可。這樣的革命，勢將發生無比的熱力，影響到各國，尤其影響到鄰國的蘇聯，使那裏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工農大眾興起，起來推翻舊革命政權的史大林官僚。因此我說，史大林是不能也不願造成這樣一些蘇維埃的東歐國家的。史大林所以要在東歐各國鎮壓工農的羣衆鬥爭，請回資本家來組織『聯合政府』，首先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第二，我自然承認，對英美的顧慮，也使史大林採取了目前的策略；但若不爲這顧慮，史大林能採取什麼策略呢？至多不過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樣子吧了，即用純粹的警察手段取

消了私人資本的所有制。這辦法，在經濟的觀點上看我們即使可以承認是進步，但從蘇聯民主制的復興，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看，却並不是什麼進步的。還有，第三點，你說這些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派始終只是『花瓶』，等到時機成熟，要同英美帝國主義攤牌的時候，史大林可以一脚踢開，也是不對的。無論在這些國家中，克里姆林宮的力量是多麼地強，多麼地直接，但這些資產階級在國內的社會關係中，以及國外的國際聯繫中，却是有力量的，而且因爲『聯合政府』之故，他們將愈趨愈有力量。所以時間愈過去，蘇聯的官僚主義隨着愈深刻，這些國家的羣衆愈消極，這些國家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依賴愈密切，則這些資產階級的力量將日益強大，終於會很容易丟棄那些『共產主義的』合作者，有如丟棄一只『揀乾了的檸檬』一樣。

問：如此說來，史大林黨在東歐的政策確有問題。不過我想法國與東歐國家不同，那裏右派力量大，要組織單獨的工人政府，甚至清一色的共產黨政府都談不到，聯合政府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對不對？

答：也不對。我覺得恰恰在法國，史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犯了最大罪惡，其破產也最爲明顯。這幾天法國共產黨人正被『聯合政府』逐了出來，我們來談法國倒過得其時。戰後法國有許多地方與中國相似，只是他們組織了『聯合政府』，我們則失敗於將成之際。我們沒有組成，使許多人對『聯合政府』懷了更多的憧憬，更多的幻想，同時我們反對這政策的，也只得在純粹的論據上打圈子，得不到事實證明，這對於大多數人是不夠去認識『聯合政府

」這個政策之錯誤的，在這方面，法國的成功經驗則能够幫助我們不少的忙。法國經驗能够告訴中國那些『聯合政府』的主張者：中國如果成立了『聯合政府』，結果最好也不過法國那樣。我們正可以從法國這面鏡子裏照自己。這次戰爭結束後，你知道，法國共產黨也是一個『武裝政黨』，牠背後跟着不少『抵抗派軍隊』。爲了對希特勒的仇恨，對維希派的厭惡，法國工人很自然地傾向了史大林黨，因爲『共產主義』，『蘇聯』，『十月革命』，這些名稱在一般勞苦羣衆看來，是由史大林主義者代表着的。他們把共產黨看成了戰士，法西斯主義以及整個資本制度的反對物，解毒劑。他們在史大林主義者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得救，人類與社會的前途。這是難得的，對於初初覺醒，初初踏進到政治生活中來的勞苦羣衆，史大林主義的造成過程及其反動本質，是不能了解的。他們不能從思想與理論上研習此種複雜道理。他們祇能從實生活中，憑着經驗，逐漸認識清史大林主義的口是心非，牠的言行不符，名實乖離。歷史上從來如此的，在羣衆左傾的初期，一些傳統的但已墮落的革命黨，往往能成爲廣大羣衆的趨附之所。此次法國的史大林黨也是如此。這時候，如果法國共產黨真是列寧主義的，採取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列寧的態度：與資產階級派法蘭西不調和，公然走上奪取政權的路線，那末法國情形是極有利的。可惜法國史大林主義者早已不是這樣的黨了，牠早已深深中了妥協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毒，牠絕不能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了。所以，不管當時法國資產階級如何的虛弱無力，不管工人階級之傾向共產主義，以及小資產階

級的跟隨無產階級，是如何的激進，總之，不管這些進行堅決革命的順利條件存在；法共還是提出了『聯合政府』，希望和『抗戰』的資產階級共同統治國家。爲要取得這可能，竟致自動將『抵抗軍隊』解散，合併於『國軍』機構；竟致壓抑羣衆鬥爭，教工人們束緊肚皮，爲『國家的復興』而努力。這樣子，『聯合政府』成立了，『國家』(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的離開渡過了，資產階級政權給保存了，牠相當穩定下來了。自從希特勒崩潰到現在已經兩年，這中間，法國除了最初一個極短時期外，差不多全在『聯合政府』的統治之下，確切些說，全在共產黨，改良派的社會黨與資產階級的人民共和黨的聯合統治之下。在此時期中，法國社會諸階級的相互力量關係主要表現於這個聯絡內部，牠們是怎樣改變的呢？隨着時間的經過，人民共和黨的力量逐漸增強，改良派的社會黨迅速衰弱，而共產黨的力量則雖然增加了絕對數，但是減弱了相對量。這樣的趨勢一直發展到現在，終於資產階級經過了人民共和黨，復由牠經過了社會黨，將共產黨人從『聯合政府』中一脚踢出了。如此完結了(至少暫時中斷了)包含着共產黨人的『聯合政府』。

最近法國的風潮表示了什麼呢？首先牠表示出法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相當恢復了，牠不再需要『聯合政府』。資產階級在不穩的時候接受了『聯合政府』，分幾席部長位置給『共產主義者』(事實上是从工人政黨手裏接受幾席部長位置)，以此換得了『軍隊國家化』，換得了工人階級的効忠於『復興』，換得了資本制度的繼續生存；這個時候，他們在國內國

外，幕前幕後，着着準備力量，積極佈置行動，等候到了現在，時機相當成熟了，他們配合了杜魯門的攻勢，戴高樂的活動，第一次開刀了。他們利用工資問題請『共產黨』人滾蛋。一切都符合於馬克思主義者的預斷，一切都重演了『一八四八年以來』關於『聯合政府』的老把戲！只是法國的『共產黨』，乃至全世界的『共產黨』，至今仍不能從此得出教訓，仍執迷地留在『聯合政府』的陷阱裏。

問：照你這樣說，法國共產黨的『聯合政府』政策，其錯誤與罪惡都是極顯然的，史大林乃至法共的領袖們何至於見不及此？如果見到，爲什麼明知故犯？這一點我還是不明白。

答：你這兩個問題，其實我在上面已經解答過了。歸根結蒂，不外乎兩點：(一)史大林爲了他的『一國社會主義』，其實是爲了他的那一個特權階層的利益，是寧願以任何方法與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妥協，不惜犧牲世界革命的；(二)二十年來走着階級合作道路，深刻地陷進了改良主義泥潭的一個政黨，即使在羣衆激刺方傾的時候，也不能改弦易轍，重回到革命道路上了。史大林害怕帝國主義固然是事實，但他更害怕世界革命。史大林不是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之自覺的服務者，不是的，他還要打倒帝國主義，在可能時候，也還要推翻資產階級。但由於蘇聯官僚階層的特殊地位，特殊處境，養成了特殊作風與特殊心理。他們只相信從上而下的指揮，他們不相信羣衆革命的力量。這是因爲他們自己和農工大眾處於絕對相反的地位，害怕任何羣衆的直接行動。此外，官僚們的眼光短視的，『現實的』，他們只着眼於今天可以聯合某一統治者去反對另一

些統治者，他們決不敢『冒一下險』。羣衆革命的被統治者聯合，在今天或明天推翻所有的統治者。

問：我不十分滿意你的解釋。我認爲史大林所以要在法國做出『聯合政府』這個明知故犯的錯誤，不是爲了害怕世界革命，而是爲了害怕帝國主義，害怕美國帝國主義的借故實行軍事干涉，實行進攻蘇聯，所以我想，這主要還是爲了避免在目前這個不利時期與美國作戰，爲了不願冒險。

答：爲要證明出你這個設想的對，我祇要指出下面這幾點就够了：(一)美帝何時進行反蘇戰爭，主要係由牠國內因素：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佈置來決定，決不能因蘇聯的某一政策，或歐洲某一國的內政而隨時宣佈了；(二)一次戰爭剛剛結束，總是最不適宜於發動另一次大規模戰爭的，所以蘇聯即使採取革命路線，亦不會立即引起第三次大戰，恰恰相反，如果革命蔓延，會使帝國主義無法發動戰爭；(三)真正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要引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可是這個干涉力量，將來總比現在爲強；(四)如果史大林準備在蘇聯力量一經恢復，可以幫助別國革命之時，纔讓法國工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末，這時候，法國工人不會響應的，因爲革命乃是一個國家內部矛盾的自發生長，不能隨時喚起。史大林目前以『聯合政府』斷送法國革命，將來也決不能在願意時候以『革命政策』來抵償的。

問：你這四點指出得很重要。不過我不相信法國共產黨人被人如此無禮地踢了出來，會仍舊迷信『聯合政府』辦法。事變也許會逼得他們革

命的。

答：至少照目前情形看，法共還沒有『覺悟』的樣子。在共產黨影響下的數百萬工人沒有起來為工資的提高鬥爭，共產黨人在國內外都表示『繼續擁護政府』，一切都為了不要『刺激』人民共和黨與社會黨右派，一切都為了準備加入新的『聯合政府』。將來，法國政局如果更加右傾，人民共和黨，聯絡了社會黨右派，與戴高樂派合作來打擊共產黨的時候，法共『不會』『革命』起來呢？我以為不會的。法國可能發生分裂，甚至發生內戰，共產黨可能被迫拿起武器來對抗右派，但即使到那時候，他們的政治還不會是革命的，還一定要組織一個與『民主資產階級』相聯合的『聯合政府』。你不要以為我這話說得武斷，你應該回憶一下我們剛才談過的，各國史大林黨之走到今日地步，乃是一個長期流血過渡的後果呀！這後果是不能隨便改變的。所以我可以斷定，今後法國共產黨無論採取什麼口號，也無論是什麼級，而在本質上，牠的作用總只能拉住工人階級，阻遏他們的政勢，鎮壓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以此至少在客觀上幫助戴高樂派或其他的獨裁者上台；自然法國能有另一前途的，即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途，但要走上這條路，法國無產階級必須及時看清法共的欺騙，首先跳出『聯合政府』的陷阱，衝出他們的控制，在第四國際黨的領導之下，走向無產階級專政。這時候，法共多半會分裂，下層的多數參加革命，上層的少數依附反動。

問：你的話我無法反駁，但有一點我仍舊懷疑。如果法共再不能走革命的路，那末這次開潮的成因正為了法共擁護工人增加工資要求，這將如

何解釋呢？

答：自然，法共現在這是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牠不能不多少反映一點羣衆的要求。法共從來反對工資凍凍，現在忽然改變態度，這自然是法國工人更加左傾的表示。但這問題不在我們討論之內。我現在要說的，就是，一個政黨能多少反映其層要求是一回事，基層的左傾能否使一個徹底墮落的政黨重新革命則又是一回事。前者可能，而後者則不可能。就拿這次法國開潮來說吧，法共絕不會想要為工資問題與資產階級破裂。『聯合政府』，牠是要既不失職於工人，而又維持『聯合政府』於不破的。結果，出乎牠始料之外，『聯合政府』破了，共產黨人於是妥協了，按捺住工人，『繼續』支持『剩餘的』『聯合政府』。法共的『左傾』僅僅為要拉住工人階級的更左傾，使工人階級繼續信任『聯合政府』。

不過這些話是相當難了題的。從法國這次開潮中，我們首先應該得出來的教訓是：『聯合政府』這路綫，即使當作一個策略看，也是錯的。牠不能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走上政權，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替資產階級硬取一個喘息時機，使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癱瘓，因而使資產階級逐漸過渡到反動勝利。這次政潮又給了列寧關於『聯合政府』見解以一個新的例證。中國至今還迷戀於『聯合政府』辦法的人，應該從法國教訓中學得一些了。

問：關於『聯合政府』，我們從原則說到事實，從中國說到外國雖然不算怎麼詳盡，至少對於像我這樣的人，總已經足够了。經過了這次談話，我承認，我已經懂得了這個問題，明白了正統馬克思主義派對這問題所持態度。我承認史

新旗 第十六期 12

大林黨在這問題上的立場是錯的，而你們第四國際派，在這問題上的見解確實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傳統。

答：我很歡喜，我這粗疏的談話竟使你滿意。不過摸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倒使我想起一件事來了。關於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應否參加資產階級政府，應否和資產階級合組政府，這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派中確實是有傳統的。當革命時期，社會主義者參加了資產階級代表合組的『革命政府』，正如列寧所說，自從一八四八年以來，就有好多次了，結果都是壞的。至於在和平時期，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去當部長，則以一九〇〇年法國一個社會主義者，名叫亞歷山大·米勒朗的為第一次。因為是新現象，所以立刻引起了當時整個第二國際的內部爭論。那時候，第二國際所屬的各國社會黨，業已經歷了深刻的機會主義墮落，所以討論結果，主張入閣的竟占了多數，保持着傳統革命見解的倒成了少數。所以從那時起，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中，不斷有社會主義者參加進去。等到第一次大戰後，此風更甚，麥唐納，契迪文等都做起首相來了。不過真正的革命者，那些第二國際的左派，後來成為第三國際創立人，再後來成為第四國際派的，這個一脈相承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却始終忠於一九〇〇年巴黎大會的少數派決議，堅決反對『米勒朗主義』。為了使我們這次反對『聯合政府』的談話更加充實起見，我想，把巴黎大會上的反『聯合政府』決議給你聽聽如何？

問：好極了，請你找出來給我看看：
答：反正文字不多，我索性將全文給你譯出來吧：
『巴黎大會關於『奪取社會政權』問題

少數派決議：

『召開於巴黎之第五次國際大會，願提醒大家，奪取政權之意，應了解為對資本家階級在政治上之和平的或強制的剝奪。』

『如此了解的奪取政權，祇能讓我們占據那些由選舉產生的職位，黨應該利用自己的力量，即利用工人的力量，這些人組織在黨內，而黨則是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的。因此，大會不得不禁止社會主義者對資產階級政府的任何參加，社會主義者對於此種政府，應處於不斷的反對地位。』

問：這議案寫得很簡明，不過我覺得與你上次所談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仍有出入。他雖然也提及以強制方式對資本家階級進行政治剝奪，但第二段意思很清楚，社會主義者要想奪取政權祇有靠選舉，而且，倘選舉給社會主義者保證了部分政權，他們還可以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府』的。這

答：你真好眼力。這議案確實有你所說的兩個漏洞。而且這兩個漏洞，給了後來變節的社會主義者以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餘地。所以這個議案，反對公開變節的米勒主義（即完全不憑黨衆直接行動的力量，就此接受資產階級政府的邀請而入閣的這個行爲），雖然有其革命意義，但由其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這議案仍有其深刻的妥協性。歷史證明得太好了。議案的起草人，即當時的國際左派領袖尤爾·格德，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戰之時，竟會自己加入資產階級內閣的，他步了米勒的後塵。他之所以會這樣做，自然還有其他理由，不過根本上，他對資產階級政府未能採取徹頭徹尾的革命立場，犯着議案上所指出的那兩個漏

洞，却也大有關係。惟有列寧一系，在『聯合政府』問題上採取了絕不調和的立場，在國家學說上完全信守着馬克思的革命傳統的，機能免於墮落，並且完成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對資本家階級的政治剝奪』。這裏你看，革命理論與原則的力量，對於革命家的行動有多麼大的影響呀！同時你又可以看到，一個革命者，或一個革命黨，不管他或牠在今天或過去的行爲如何好，祇叫在政權問題上對資產階級有了妥

是誰殺死了托洛次基？

蘭因

托洛次基，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在墨西哥，被一個名叫『傑克孫』的人所謀殺死了。本社出版的『托洛次基自傳』中附錄了『週難始末』一文，對此謀殺事有詳細的記載。托洛次基被刺以後，未死以前，曾說：『傑克孫是格別烏人員或法西斯，多分是格別烏。』他死後，根據法庭調查的證據，以及整個謀殺事件底分析，已可斷定傑克孫是格別烏人員，即史大林派遣的兇手了。殺死托洛次基的，不是別人，正是史大林！

不僅全世界托洛次基主義者如此斷定，凡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是這樣說的，連好多史大林主義者心裏也是這樣想的，雖然說的見另外一套的話。

史大林主義者對於托洛次基之死是怎麼說的呢？他們說：這事與史大林，與格別烏，毫不相干；傑克孫本是第四國際黨員，本是托洛次基自己的信徒，祇因覺悟了受托洛次基欺騙，又不願執行托洛次基派他去蘇聯進行怠工和暗殺之命令，所以殺死托洛次基。史大林主義者這裏說的話，正是兇手衣袋中預藏的『供狀』內說的話。直到現在，將近七年，史大林主義者仍是這樣說的。例如去年出版的『反蘇大陰謀』，這本格別烏的書中，竟是有此論調。

史大林主義者不願格別烏起事的那個『供狀』如何自相矛盾，如何違反事實，仍舊堅持此論調。他們自恃沒有直接證據，便抹煞一切從分析案情做出的結論了。

可是，正如紐倫堡審判之摧毀莫斯科審判全部証官一般，現在已經出現了直接證據，把史大林主義者對謀殺托洛次基一事所虛構的全部機關都推毀無餘了。

這就是路易·布登斯（Louis Budenz）新著『這是我的故事』（紐約 Whittney House 出版）一書暴露出來的關於托洛次基被謀殺之真相。

布登斯是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又是美國共產黨機關報『每日工人』底經理，在黨內地位是很高的。

但戰後，美國共產黨內部發生了派別鬥爭，或事可說，史大林要撤換前任書記布勞德，而代以現任書記羅勃斯特，以便把戰時政策錯誤歸罪於布勞德。布勞德是布勞德威左右手，他也跟着布勞德被史大林開除了黨籍。被開除後，布勞德便投入天主教會內，向上帝懺悔，而且寫了這一部『這是我的故事』來暴露美國共產黨底秘密，亦即史大林底格別烏底秘密。謀殺托洛茨基事，就是這些秘密當中的一件。

這件墨西哥城謀殺案原來是在美國紐約城準備起來的，美國共產黨領袖，連布登斯本人亦在內，都會幫助這件謀殺案之準備。據布登斯說，準備開始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即是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後和第二次莫斯科審判即將舉行以前。此時，史大林向挪威威渡托洛茨基，未能成功，托洛茨基得到墨西哥允許寄居，正從那裏乘船到墨西哥來。格別烏於托洛茨基未曾在美洲登陸以前，就決定在美洲謀殺他了。

首先需要同美國托派接近，以便以後能夠接近托洛茨基本人。布登斯是美國共產黨內的『反托專家』，而且熟悉美國托派狀況，因為他曾是美國一個進步的團體『進步勞工行動會』領袖之一，一九三四年這團體和托派『美國共產主義同盟』合併，他反對這個合併，他在新黨之內與托派鬥爭，不久就退出新黨而加入美國共產黨了。一九三六年，這個新黨又加入美國社會黨內，為其中黨之左翼。格別烏既然決定謀殺托洛茨基，便選中了布登斯，要他合作。布登斯書中說，共產黨另一個領袖史塔雷爾 (Starr) 介紹他去見格別烏為『反托』責任的領袖，一個四十多歲的人，見面時除史塔雷爾外還有黨監察委員會一個委員，他們稱這個格別烏領袖叫做『朋友里却』，而且吩咐布登斯聽從他的命令，『凡他命令做的事，應比其他一切事情都先做的。』甚麼命令呢？布登斯說『里却』叫他搜集關於美國社會黨左派，即托派，底消息，搜集他們的照片，文件，住址，私人生活，尤其注意甚麼人會去國外旅行。布登斯很熱心地執行這些命令，因為他本是反托的，他現在還是反托的，他確信人家評議托派一切的話。如此工作了幾個月長久。格別烏負責人調換了，『朋友里却』來代替了『朋友里却』，布登斯照樣工作下去。人家同他商議派甚麼人混入托派去做奸細，人家免去他的其餘職務，以便專心替格別烏做這工作。他每星期至少與格別烏領袖見面一次。

格別烏看中了一個托派女同志，雪爾維亞·阿哲洛夫 (Sylvia Agoloff)，因為她常在托洛茨基家裏進出。布登斯說，一九三七年，有一天，『朋友里却』拿她的照片給他看，問他關於她的種種情形，同他商議如何去聯絡她。結果

，布登斯推着他的女朋友『Y.小姐』來做這個聯絡工作。

『Y.小姐』是誰，我們早就知道了。她的真名是羅比·魏爾 (Betty Weir)。她與布登斯同屬於『進步勞工行動會』，又與布登斯同時退黨而加入美國共產黨，但她仍保持着與雪爾維亞·阿哲洛夫之友誼。布登斯介紹羅比，說同『朋友里却』見面。這個格別烏領袖叫羅比同雪爾維亞親近。於是這兩個女人成了好朋友，一同到巴黎去旅行。在巴黎，羅比介紹了一個男子，名叫『佛郎克·傑克孫』的，同雪爾維亞認識。『傑克孫』『鐘鐺』於雪爾維亞，後來訂了婚，以此資格，這個鬼手才能混進托洛茨基屋內。羅比本人似乎事先不知道格別烏要撮合『傑克孫』和雪爾維亞之婚事，是為了甚麼目的。因為，據布登斯說，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一年，羅比帶病回到美國來，找到他，把全部故事都告訴他，而且說他本不認識『傑克孫』，是到巴黎時一個格別烏人員，一個女人，介紹給她的，並且要她承認他本是她的朋友。布登斯說他當初不敢相信羅比底話。但無論如何，布登斯六年前就已知道這件謀殺案底真相了，他不肯說出來，今天他還有許多知道的事情不肯說，但他的書所已說出的也已足夠向我們證實一九四〇年謀殺案是格別烏一個領袖『羅勃』於一九三七年準備好基礎了的。

鬼手『傑克孫』是格別烏人員，是史大林派遺的，——這一件事，現在已有直接而無可否認的事實來證明了。

『這是我的故事』書中，除了暴露托洛茨基謀殺案真相之外，還暴露格別烏其他的罪惡。

一九三七年，伊拿士·萊斯 (Ignace Reiss)，脫離了格別烏，而走到第四國際方面來，遂於瑞士被格別烏謀殺了；瑞士警察獲得了格別烏謀殺之確實證據，要求法國引渡兇手。至世界史大林主義報紙對此事件都保持沉默。布登斯書中說：這是格別烏命令。

一九三七年，美國共產黨一個領袖普印茨女士 (Pearls) 在紐約城自己家裏很神秘地失蹤了。警察發現不到她蹤跡。無政府黨領袖嘉樂·特勒斯加 (Carlo Tressca) 向紐約大陪審法庭控告，說普印茨女士是格別烏綁去殺死的。布登斯書中說，美國共產黨政治局一個委員田同志告訴他：她(普印茨)已經被蘇聯秘密警察所『贖濟』了。

一九四三年，上面說的無政府黨領袖特勒斯加，也在紐約街上被人開槍打死。兇手至今未曾捕獲。布登斯這部書是今年三月間出版的，出版以後引起了震動，各黨派及

三月十七日，老約瑟夫約翰·杜威，文學作家華勒爾，美國社會黨領袖曼·托馬士，紐約大學教授胡克，著名律師芬內西，以及其他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共四十七人，簽名發火一篇宣言，并推舉四個代表，要求紐約法院檢

赫布芬斯這本美，特勒斯加諸謀殺案的關係。檢。不久之前中國若干報紙登載四月二十九日法國新聞社從芝加哥發來的電報，說托洛茨基夫人委託律師要求法庭傳訊史大林和布勞德，——這一定是布登斯新書引起的風潮之擴大。

國際鬥爭

托洛次基派在朝鮮

不久之前，有一個外國水手到朝鮮去，在那裏會見了『朝鮮國際主義共產黨』黨員。據說，這個黨是六年前從朝鮮共產黨分裂出來的。朝鮮現在一共有四個黨，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綱的，其中三個黨都是從共產黨分裂出來的，其餘一個就是朝鮮共產黨，但牠的路線并不符合於克盧靈宮底政策。

這個水手是托洛次基派，是第四國際黨員，發現談話對方意見和自己很接近，於是雙方都很發活。朝鮮人引了水手到一個地方去，那裏約有三十幾個青年工人，其中有幾個能說英語。人們問水手好多問題，而且把水手說的話翻譯給不懂英語的人聽。從問話中知道，朝鮮托派僅得第四國際的存，卻不曉得近年來關於第四國際的各種消息。

第二日，朝鮮人又引水手到漢城郊外一個空貨棧去，那裏有許多工人和學生都有，在等待着。他們持有武器，而且在附近區域放步哨。貨棧內掛着紅旗，還掛一幅列寧像。人們都是坐在地

上，沙發上鋪着鋼板做主席台。這日，羣衆提出了如下幾個問題：蘇聯狀況怎樣？蒂托做什麼事情？第四國際贊助英國工黨政府麼？日本有我們的同志麼？『美國勞工聯盟』和『產業組織大會』有什麼不同？美國兵為什麼這樣各後等等。

羣衆同意水手關於蘇聯的分析。據他們說，除了他們這一黨以外，朝鮮還有其他黨派或團體同意第四國際底主張，好多黨派或團體現在還是以領袖為中心或以地方為單位組織起來的，相互間的聯絡很困難，但并非不可能。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把這些同意第四國際的黨派，在第四國際綱領之下組織起來。

有幾個人是從北緯三十八度以北的蘇軍佔領區逃到美國佔領區來的，他們說了俄國人許多搶劫和謀殺的可怕故事。常常有幾個鄉村整個城市底物資都被俄國人搬光了。

駐防軍歐的蘇聯軍隊逃亡了很多

美國軍隊在朝鮮也常常逮捕工會領袖，破壞工人罷工。朝鮮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運動，則擁護美國軍隊。金九公然號召朝鮮人擁護美國軍隊反對俄國軍隊。他的信託者有好多個人離開了他，而參加馬克思主義運動。除了共產黨以外，工人黨派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都不參加美國人所佈置的『選舉』。

漢城工人會經示威反對共產黨候選人，這些人恭維此次選舉，說這是『霍奇將軍底真正民主措施』。工人強迫共產黨候選人退出選舉，而且強迫若干當選的民族主義者放棄所獲的位置。議會中祇有三

十個人是選舉的，其他三十個人則是霍奇將軍所任命的。霍奇將軍還任命一個總督或總統，這個『政府領袖』還享有完全的否決權，對於一切問題。據朝鮮托派告訴水手，在朝鮮，祇有大地主和工廠主及若干商人擁護這個政府。（慶）

蘇聯軍隊中逃亡的風氣非常盛行。據三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訪員克拉克所估計，逃兵數量竟佔據全軍隊百分之十。德國默克倫堡邦東部有個集中營，其中就監禁了七千被捕獲的逃兵，未捕獲的逃兵人數更多，他們流浪在德國東部，波蘭，巴爾幹一帶，有一部分人上山做土匪。克拉克寫道：『據說，俄國佔領軍換防時間，現在比以前更短促了，兵士們常常在德國服務三四個月，就須調回俄國去。佔領軍如此勤於換防，一般人認為是蘇聯當局不願當兵士太過於長久受外國外生活所誘惑，以致有可能傳染了非共產主義的思想。去年十一月底，俄國軍隊有一次大換防，大部分兵士調回國去，鐵路和公路忙於運輸兵士，但此時逃亡得也最多，因為他們不願回到俄國去過艱苦的生活。』

蘇聯法律懲罰逃兵是很嚴厲的，逃兵捕回來的，要被判派到西比利亞荒涼區域去做苦工。現在蘇聯軍隊駐防的地方，德國東部，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等等，一般生活本不好，經過戰爭破壞之

更加不堪。但現在竟有許許多多兵士，不怕嚴厲的懲罰，而留戀於這些國家底生活，不肯回蘇聯去了。於此可見史大林統治的蘇聯生活是如何艱苦的了。(盛)

日本戰俘不肯被人利用去破壞罷工

今年初，馬來羣島巴都阿蘭地方煤礦工人罷了工，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資方家拒絕了工人要求，政府幫資方工作條件，說要派日本戰俘代替工人做工。工人不肯屈服，於是政府實行他的恐嚇了。但是日本戰俘在礦山工作故意做得慢，表示他們並非自願來這裏破壞工人罷工。由此，工人對於日本戰俘發生了好感。馬來『早晨論壇』報二月十五日社論指出：『這是戰後第一次，馬來人民和日本戰俘中間表示了利害一致，後者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是被前者視為最可惡的壓迫者的。』英國政府看見這個情形，恐慌起來了。政府發言人湯浦生趕快提醒馬來工人，不要忘記那些『野蠻的敵兵』。(盛)

印度托派為印度共產黨受迫害

向政府抗議

今年一月間，印度警察同時搜查印度共產黨各地黨部。要分子住宅，而且捕去了好多人。據說，這是因為六個月以前印度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時代』曾有一篇文章洩露了印度政府某些秘密的軍事計劃。(盛)

所以先求共產黨

擁護戰爭，而且反對一九四二年八月間羣衆反帝國主義的暴動。

『印度布爾雪維克列寧黨』，第四國際支部，特爲此事發表了一篇宣言，其中表明他們雖然在政見上與共產黨有不可和解的歧異，但仍舊站在共產黨方面抗議此次搜查和拘捕。宣言警告印度民衆，說此次警察行為不僅有關於共產黨一黨，而且有關於全印民衆，因爲這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分子三方面聯合向公民自由和羣衆運動進政之第一步。宣言又號召一切左傾組織結成聯合戰線來保衛公民自由和羣衆運動。

政府領袖尼赫魯聲明，此次搜查和拘捕并未曾得到政府諸閣員底允准，諸閣員事先還不知道。托派宣言指出尼赫魯這話是無人肯信的。此次事件應由他及其他閣員負責。但即使退一步說，尼赫魯說的是實話，那麼托派底分析和預言更加證明是正確的，因爲托派曾經說：在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中的國民大會黨諸閣員，不過替英國帝國主義裝門面罷了，英國帝國主義者在這個門面背後做着他們以前做的事情。

印度托派很活動，若干重要工會是他們領導的，有幾次示威遊行也在他們主持之下。

在錫蘭島上，有兩個托派組織，一個就是『印度布爾雪維克列寧黨』底錫蘭支部，另一個是當地的『蘭加撒馬散馬雅黨』(Lanka Samana Samaja Party)。

現在這兩個組織已經統一起來了。最近這個統一的錫蘭島組織參加了錫蘭島行將舉行的議會選舉，提出了三十名候選人，以撒馬拉科狄(Samarakody)同志爲首。這人曾因對戰爭被捕關在牢內，曾從監獄中逃出，仍留在錫蘭

美國托派統一進行順利

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和工人黨，自從決定統一以來，雙方組織開了好幾次聯合會議，三月十一日的會議通過了一篇聯合宣言，由社會主義工黨總書記加農和工人黨總書記沙克曼兩人簽字發表。宣言開始說：『一九四〇年社會主義工黨發生了一次內部鬥爭，結果造成了分裂。少數派組織了一個獨立的工人黨。這分裂一直繼續到現在。』接着說起戰後恢復統一之嘗試未能成功的經過。以後就說此次變方的統一基礎：工人黨答應參加今年秋天召開的『非常大會』，願意接受這個大會底一切決議，社會主義工黨則答應工人黨有權參加大會前的討論，並依照人數比例派遣代表參加大會。現在兩黨已共同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爲了計劃雙方合作，領導共同的對外鬥爭，並準備正式統一之實現。(盛)

越南政府感謝美國托派幫助

一月二十五日，美國托派兩個組織，『社會主義工黨』和『工人黨』，會於紐約法國領事館門前舉行示威，要求法國退出越南，要求美國勿以軍火供給法國。此事，本刊上期已有記載了。二月十五日，越南政府致函向那爾黨申請。函中說：『你們在紐約舉行的大示威，贊助越南獨立鬥爭，我們知道了深深的感動。現在，我代表胡志明總統和越南共和國政府向你們和你們的團體深致謝意。他方面，越南總工會也請我向你們和你們的團體致最熱烈的敬意和感謝。』這是一封，美國民衆公同贊助的。